

秀丽的山城——乳源瑶族自治县县城概貌

-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大发展服务
- 为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研究服务
- 为广东社会科学的繁荣服务

学术研究



- 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超前性
-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农联盟
- 投资不足：被掩盖的现实
- 一代学人论得失

敞开山门，诚望合作

乳源瑶族自治县位于广东北部。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置县，因县北有钟乳穴，穴中有水南流，故名乳源。1963年成立瑶族自治县。全县现有人口17万多，其中瑶族1.6 万多人。全县面积2100多平方公里，分设九个乡七个镇，县政府驻乳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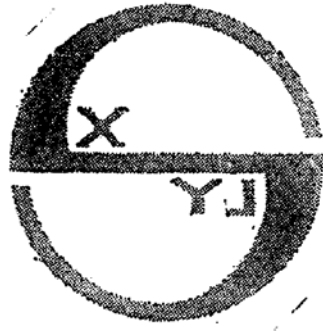
本县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目前正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本县发展经济具有三大优势：一是交通便利。东接曲江，西连阳山，南与英德为邻，北和乐昌、湖南相交，距韶关市仅38公里，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内河航运十分便利，京广铁路于境内通过，民航班机可直飞广州。二是资源丰富。本县山地面积广阔，森林面积210多万亩，木材蓄积量达200多万立方米，是广东省林业基地之一。由于地处中亚热带，雨量充沛，加之地形独特，河流峡谷众多，因而水力资源可开发利用的达30 万千瓦以上，目前已建起大中小型水电站数十座，装机14万千瓦，其中县属中小电站装机6万多千瓦，年发电量逾2.5亿度，为发展经济提供了充足的电能。我县矿产资源相当丰富，不但种类繁多，且储量十分可观，堪称有色金属之乡。目前已采的有稀土、锑、锡、钨、铁、煤、硅砂、大理石、高岭土等矿产，并建起了锑冶炼、锡冶炼等一批矿产加工企业。与冶金部包头稀土研究院联合兴建的岭南稀土材料厂即将建成投产，该厂技术力量雄厚，将采用国内外最先进之技术生产单一稀土氧化物和单一稀土金属。众多的野生植物资源为发展食品、造纸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我县新办的食品饮料总厂生产的矿泉雪碧和金银花、猕猴桃系列饮料、软糖，获省、市优质产品称号，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千年古刹云门寺、广东最高峰石坑坳、奇特的地下森林、省内罕见的埕头大瀑布、江南第一家狩猎场、风光旖旎的南水湖、民风古朴的高山瑶寨，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良好条件。三是政策优惠。我县是民族自治县，享有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许多优惠照顾，县里还制定了开展“三来一补”和鼓励外商投资等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

我们将本着热诚相待、平等互利的原则，敞开山门，热烈欢迎国内外朋友前来合作，兴办实业！

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电话：二七〇
地址：中国广东乳源
乳源县食品饮料总厂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者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510050

出 版 者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广 州 市 邮 局

订 阅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所)

国 外 总 发 行 中 国 国 际 图 书 贸 易 总 公 司

国外代号：BM268

北京2820信箱

代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0.50元

国内统一书号：CN44—1070

ISSN 1000—732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穗工商广字207号

本刊每逢双月25日出版

学术研究

双月刊

1988年第五期

· 文史 ·

论人的近代化与梁启超的「新民」理论……………陈中凡

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对康有为早期思想的影响……………何志慧

汉代中西交往与社会开放……………丘进

论严羽的审美理想与时代的关系……………韩湖初

· 哲学 ·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科学基础的思考……………傅诗济

文化的人本能动性与其结构规律性……………(香港)鲁凡之

· 学人与学说 ·

我们如何借鉴陈先生……………王季思

· 书评 ·

读史使人明智

——《简明广东史》读后……………张磊

· 小品 ·

一二三四……………老烈

杂感二题……………石成

闲话「人之初」……………岑桑

· 文摘 ·

地主制经济不是自然经济(14) 现存金融体制对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四个障碍(22)
货币供应量过多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88) 能否「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91)

· 学术动态 ·

广东九月召开大型「综合改革试验区理论与对策」研讨会……………石成

总校对……………黄荣显

目 录

ISSN1000—7326

总第九十期

· 综合改革试验区研究 ·	
综合改革试验区人民内部矛盾初探 ·····	秋 田 6
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超前性 ·····	高齐云 10
辩证地理解「用足政策」 ·····	马中柱 15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农联盟 ·····	彭佩璜 18
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平等关系 ·····	宋开祥 23
· 经济学 ·	
投资不足：被掩盖的现实 ·····	吴 强 王雍君 28
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问题和抉择 ·····	廖建祥 35
关于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 ·····	张太增 郭利平 杨晓明 39
· 国情·省情·县(市)情研究 ·	
走技工贸结合的道路改变民族自治县面貌 ·····	龚洪永 41
扬长补短抓重点 ·····	李贤锋 43
山区劣势中的优势 ·····	欧世有 46
· 答记者问 ·	
波兰经济学家谈社会主义	
国家改革进程中的「风险」与对策 ·····	本刊记者 张硕城 49
· 微型调查 ·	
我省乡镇外向型企业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	欧阳知 52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 bimonthly)

(No. 5, 1988)

CONTENTS

-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in
the Experimental Zone of Comprehensive ReformQiu Tian (6)
- A Discussion on the "Lead" Feature of the Experimental Zone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Gao Qiyun (10)
- Gaining a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Motto, "Making Full Use
of Policies".....Ma Zhongzhu (15)
- On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 Peng Peihuang (18)
-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Equality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Song Kaixiang (23)
-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 A Reality that Has Been Covered Up
.....Wu Qiang and Wang Yongjun (28)
-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 Economy of the "Expo-
rt-Oriented Type" and the Choice to be Made in the Special Ec-
onomic ZoneLiao Jianxiang (35)
-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Sources of Surplus Value
..... Zhang Taizeng, Guo Liping and Yang Xiaoming (39)
- Changing the Features of an Autonomous County of a Minority Nat-
ionality by Taking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TradeGong Hongyong (41)
- Bringing Advantages into Full Play, Making Up Deficiencies, and
Grasping the Key Points.....Li Xianfeng (43)

The Advantages Presenting Themselves ami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Mountainous Areas.....	Ou Shiyou (46)
Polish Economists Talk about "Risks" in the Course of Reform as Conducted in Socialist Countries and the Tactics against Such Risks.....	Zhang Shuocheng, correspondent of this Journal (49)
The Conditioning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s Township Enterprises of the "Export-Oriented Type"	Ouyang Zhi (52)
The Modernization of Man and Liang Qichao's Theory of "New Man".....	Chen Zhongfan (55)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Applying Confucian Classics to Practi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Premature Th- inking of Kang Youwei.....	He Zhihui (60)
The Contact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Han Dy- nasty and the Opening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Qiu Jin (65)
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 Yu's Aesthetic Ideal and His Times.....	Han Huchu (71)
Thoughts on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in Dialectic Materialism.....	Fu Shi (75)
The Humanistic Dynamic Role of Culture and Its Regularity of Str- ucture.....	(Hong Kong) Lu Fanzhi (79)
What Can We Learn from Mr Chen Yinque	Wang Jisi (84)
Book Review: <i>A Concise History of Guangdong</i>	Zhang Lei (89)
Comments on "Uniformity of Public Opinions", "the Use of Restri- ctive Quantifiers", "the Grading of Grumblings and Complaints", and "Literary Hacks and Accessories".....	Lao Lie (92)
Two Topics of Random Thoughts.....	Shi Cheng (94)
A Casual Talk about "Prodigies"	Cen Sang (95)

编者按：今年4月，本刊曾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问题，邀请了广东理论界部分学者进行座谈。下面一组文章，均是在这次座谈会发言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旨在促进进一步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希望广东及全国热心探讨这个问题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惠赐大作，以便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综合改革试验区人民内部矛盾初探

秋 田

得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已被确定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试验区的超前改革，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充分发挥社会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为此，就要协调好试验区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关系，特别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试验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同样存在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其中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最为突出，而且比以前更普遍、更复杂，覆盖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在整个社会主义矛盾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三：

一、随着全面改革的展开，社会结构的变化，人民的内涵也起了变化，使人民内部矛盾较之从前更普遍、更复杂、更突出。现在省内的社会阶级结构，除了未改造好的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和新的社会渣滓以外，有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有过渡性阶层，即在乡镇企业就业但未同农业完全脱钩的职工，他们正由农民向工人过渡；有既是独立的阶层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有人称之为交叉阶层；有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社会集团，如同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着的个体劳动者；有承包、租赁经营者；有独立经营的国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家；有“三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三贷”（贷物还物的补偿贸易、贷物还款的租赁贸易、贷款还款的国际信贷）企业的经营者（其中有一部分是港澳爱国同胞）；还有各种经纪人；等等。在这样

的社会结构中，人民的内涵扩大了，已经不仅仅包括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而是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体劳动者、拥护改革开放和赞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爱国者以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范围空前广泛，成份相当复杂。由于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群体）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城乡的差别，由于劳动者、爱国者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以及思想水平、社会分工的差别，就必然产生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引起摩擦和冲突。如果不加以妥善处理 and 解决，就会造成社会生机的内耗，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基于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完善、上层建筑不成熟，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有待开展和深化，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经济方式并用，计划与市场共调节，多元分配方式同实行，新旧体制的转换和并存，思想观念的碰撞和更新，在人民内部必然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

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价值规律作用的扩大，竞争机制的引入，社会矛盾也自然增多。

在如此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思想认识上不同的矛盾，包括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民主与非民主的矛盾，科学与迷信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思想解放与思想僵化的矛盾；另一种是根本利益相同但具体利益不同而产生的矛盾。这是因为，社会利益是多侧面、多层次、多集团的，所以在改革进程中必然出现社会利益的变动、转移和调整；而伴随着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价值规律开始调节社会经济的运行，也在某种程度上调节着社会成员的许多利益关系；加上分配方式的变化，各方面利益关系也会急剧地变动着，形成新的利益集团。此外，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劳动者之间各自所处的环境、条件、岗位、收入的不同，产生的矛盾也呈多样化、复杂化、表面化，诸如长远、根本利益与当前、现实利益的矛盾，国家、集体（集团、群体）、个人责、权、利的矛盾，先富后富的矛盾，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人民的矛盾，省内外之间的矛盾，乡镇之间、县市之间的矛盾，企业内部企业领导人与党组织领导人的矛盾，中标者与落标者的矛盾，固定工与合同工的矛盾，等等。总之，因具体利益不同特别是因收益分配不同而产生的矛盾，成为当前试验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觉得，在试验区内部，当前特别要处理好如下几对矛盾：

一是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报酬倒挂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全国普遍存在的，又是广东日渐突出的问题（因为广东个体户多、“三资”企业多，其中的体力劳动者比一般脑力劳动者的收入，至少高出好几倍），更是享有优惠政策待遇，担负着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重任的试验区，应当率先逐步解决的大问题。这一客观存在着的矛盾，从理论上说就是否定了复杂劳动、脑力劳动与简单劳动、体力劳动的差别。“万般皆

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无疑是错误的。但“体力劳动创造物质财富，脑力劳动不创造财富”的说法同样也是不正确的。复杂劳动、脑力劳动的报酬应当高于简单劳动、体力劳动的报酬，因为脑力劳动的价值包涵着从过去到现在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积累，它是价值规律在分配领域里的反映。所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报酬的倒挂，表明分配关系被扭曲了。其结果直接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造成人才外流（指往国外流）、人才“内耗”，使新的“读书无用论”再度泛起，影响新一代脑力劳动者的成长，仅广州城区中学的“流失生”1986年和1987年就有7000多人。现在一些大学生甚至某些研究生（有的是研究古典文学、古代汉语的），对搞学术研究、做学问没有多大兴趣，不是迷恋于当官，出国，就是向往着去大公司、外贸部门搵钱，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所以，不解决这个倒挂问题，就很难真正稳定知识分子队伍，也很难提高我省广大劳动者的思想科学文化素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二是乡镇企业、个体户的经营者与基层某些“官”员、管理部门的某些工作人员的矛盾。在试验区内，个体户的广泛兴起，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可是，他们都是在很困难的境遇中冲杀出来的，他们生产经营销售上的许多环节，某种程度上攥在基层政权某些“官”员、管理部门某些人员的手心里，要看他们的脸色，要求他们开放“绿灯”，否则，就要受到刁难。以权谋私由此引发，腐败之风由此发生。处理好这一矛盾，既关系到为政清廉，又关系到乡镇企业、个体户的合法经营和健康发展。

三是“三来一补”、“三资”、“三贷”企业与国营企业职工之间的矛盾。广东由于改革开放最早，“三资”一类企业开办得也最多，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试验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三资”一类企业正方兴未艾。“三资”一类企业中的职工收入比普通企业职工的收入高得多，这就增加了普通企业的职工的“跳槽”现象，并且影响到国营企业难于招到新工人。如不恰当处理，将影响企业劳动力的配置。

四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广大山区人民之间的矛盾。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四小虎”，是试验区人民引为自豪的，但这仅仅是试验区的核心部分，而粤北、粤东、粤西众多的山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甚至有的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一矛盾不解决，是会阻滞试验区的发展速度的。

五是试验区与邻省的矛盾。广东经济的起飞和进一步开放，可以带动邻省商品经济较快地发展，可以使邻省加快致富过程，可以给邻省一种压力，推动他们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与此同时，广东的需求，必将影响邻省的物价上涨的幅度，必然影响邻省收购任务、出口任务的完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邻省的外汇收入。这就形成矛盾。这种矛盾大都是由物价引起的，波及面较大。今后试验区的超前改革，大多与物价有关。因此，在任何改革措施出台前，既要从试验区内部情况出发，又要照顾到试验区的外部条件（邻省以及全国）及其承受力，注意兴利除弊，力求做到相互联合、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六是民主意识与“官本位”意识的矛盾。在试验区内，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有相当程

度的发育，可是干部中“官本位”的意识、等级的观念还比较普遍、浓厚，对级别待遇也很讲究、认真，凡事都要问“吨位”（级别的高低、官职的大小），“吨位”不同社会效应就不同，住房、乘车等待遇也不同。这种状况，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改革开放比较广泛深入的广东出现，是极不协调的。由于专业人员与“官”员“不等值”甚至“倒值”，有的青年知识分子，不是专心致志于提高专业水平，而是涌向“仕途”，奢望“官运亨通”，早日当上个什么级干部。这种状况对两个文明的建设也是不利的。

怎样处理和解决这些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和研究的问题，原则上必须注意：

一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遵循客观规律，调整和完善分配政策和分配方式；并运用社会自身调节机制，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和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体现社会公平（不是平均主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二是有超前改革任务的综合试验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应及早迈开步子，力求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上层建筑的建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认真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在各项制度中确保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运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方法，如协商对话，增强理解，疏导说服，团结、批评、团结等方法，及时调整和缓解新出现的矛盾。

三是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调解和处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和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作者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冯达才

广东九月召开大型“综合改革试验区理论与对策”研讨会

在中共广东省委的直接指导下，筹备了半年多的“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理论与对策”研讨会，定于九月下旬在广州召开。会议从提交的200余篇论文、方案的基础上，组织专门课题组，就“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市场经济与价格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科技进步与人才”等四个重点系列进行近一年的调查研究，并经过多次研讨论证，分别产生了8个总体报告，提交大会讨论。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还亲自参加了部分课题的论证活动。

这次大型研讨会是继1987年9月“广东改革开放理论研讨会”之后召开的又一次大规模理论研讨活动。它将就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为省委、省府提供决策的参考意见。

这次大型研讨会的具体筹办单位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社联、省社科院、省委党校、省委政策研究室、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省体改办、省外经贸委、省科委、省科协等。

（石 成）

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超前性

年初，中央先后公布广东省、福建省为综合改革试验区，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又一重要决策。

探讨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问题，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开始了新的飞跃。这个新的飞跃集中表现在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理论，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展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十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新时期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使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建设和改革还处于探索、试验中。设置综合改革试验区，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开拓性、探索性、试验性的要求，又是加快和深化这种开拓、探索、试验的重要的和有效的措施。

设置综合改革试验区，在各个方面都有其具体要求，这在中央给试验区的有关政策中作了规定。但是，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置，还有制约着各项具体要求的基本要求、总体要求。简单地说，就是综合改革试验区必须先行一步，必须超前发展。

对综合改革试验区超前发展的要求，根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现代化建设与实践的开拓性、探索性的特点。由于具有这样的特点，中央在指导思想强调既大胆又谨慎，在工作方式上则强调一切通过试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有过农村改革的试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现在进一步设置综合改革试验区。可见，设置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为了通过试验区的实践，具体地和深入地掌握现阶段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规律性，探索、积累深化改革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因而，综合改革试验区必须超前发展，才能完成其作为试验区的任务。

那么，什么是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超前发展呢？可以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来说明。从理论方面来看，超前发展是通过主体积极创造条件，使事物在发展现阶段具备的现实可能性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好的效率转化为现实，从而提早实现事物在现阶段的质和量的

发展要求。超前发展和超越发展阶段，二者存在根本的区别。前者是使事物现阶段所固有的在质和量方面的发展要求得以提早实现，它不脱离、不超越事物发展现阶段的规定性和度；后者是要使事物实现在发展现阶段所不包含的质和量的要求，或者说把事物在较高发展阶段才能形成的规定性和度强加于现阶段事物。同时，超前发展和急于求成也是不同的。前者从实际出发，努力创造条件去实现事物具备的现实可能性；后者则从主观出发，力求实现某种抽象的可能性，或者脱离创造条件去强制实现某种现实的可能性。超前发展和超越发展阶段与急于求成虽然存在着质的区别，但仍然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果不坚持从实际出发，不致力于条件的创造，不始终抓紧实现事物发展现阶段所固有的质、量要求和现实可能性，超前发展就会变为急于求成以至超越发展阶段。这是综合改革试验区以至改革全局必须在思想上明确认识，在实际中严格防止出现的问题。

从实际方面来看，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超前发展有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之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建立基本完整的富有生机、活力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基本实现现代化，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这是综合改革试验区超前发展的远期目标，就是说综合改革试验区必须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少的时间、较大的努力和较好的效率早于全国达到上述目标。然而，综合改革试验区当前必须致力于实现超前发展的近期目标。通过逐步实现若干近期目标，为达到远期目标作量和新质的积累。当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近期目标应该是：通过深化改革和加速开放，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经济体制框架，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以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领导体制，建立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和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教育、科技体制，进一步建设体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成果与要求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使区内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思想指导和工作部署上，一定要充分挖掘、发挥现有条件的潜能，积极创造新条件，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好的效率实现这个近期目标。如果脱离当前实际，置近期目标于不顾，而盲目追求大大超过试验区现有实力和现实可能性的目标，就势必重犯急于求成的错误。

事物发展的速度、幅度、效率绝不是纯粹人为和主观任意的，它受到事物自身的条件和所处的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现实可能性的制约。发挥主体能动性去实现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超前发展，不仅要了解超前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具体要求，还要认清试验区的现有条件和可能创造的条件，把握要求和条件之间复杂关系与将会发生的矛盾，找出试验区实现超前发展的突破口。这样才能抓住关键环节，带动、促进试验区的各个方面的超前发展。

从广东省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互相促进，使全省的发展走上了持续、协调、稳定地前进的道路，为广东省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超前发展，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还应该看到广东省实现试验区的超前发展，还有许多方面条件不足以至条件欠缺。概括起来，主要是资源欠缺，实力不足，机制不全，发展严重不平衡。所谓资源

欠缺，主要表现在煤、石油、电力、钢铁的生产和棉、麻、丝制品的原料生产以及智力的生产还不能满足现在经济建设的要求，同超前发展要求的差距更大。所谓实力不足，主要表现在资金不足、技术装备和交通运输能力不足以及劳动者和管理人员的文化科技素质不高，使生产能力、生产效率不高，成为超前发展的严重障碍。所谓机制不全，主要表现在商品经济运行机制不全，特别是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以间接管理为主的经济调控机制还很不完备、很不完善，造成了经济运行中的许多漏洞、矛盾，既影响当前的经济运作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又将给超前发展带来多方面的阻力。所谓发展严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珠江三角洲和粤东粤西两翼与广大山区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广大乡镇企业和大量大中型国营企业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的作用严重不平衡，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引进中的不平衡，它们限制了全省经济的迅速增长，也大大地影响试验区的超前发展。

在以上四个不利条件中，实力不足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因素，是限制超前发展的关键环节。首先，生产力的现存状况是实现超前发展的基本起点和根本基础。作为构成生产力要素的劳动者和管理人员的文化科技素质不高、技术装备和交通运输的水平落后与能力不足，都直接地限制生产力的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影响超前发展的实现。其次，资金投放的数量和资金使用的效率是制约生产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规模与速度的重要因素。由于资金不足，使农业、工业、教育科技、城镇建设的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再次，实力不足还限制了资源的开发和先进技术装备与原材料的引进，影响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克服发展的不平衡，也影响为加速改革和完善机制创造更好的经济环境。由此可见，超前发展的要求和实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是广东省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面临的主要矛盾。

解决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面临的主要矛盾，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努力。首先，应该着力抓住解决主要矛盾的突破口。解决主要矛盾的突破口，是指在解决这个矛盾中可以发挥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的方面或环节。具体地说，作为解决上述矛盾的突破口，既要能有效地改变实力不足的状态，又要能直接地或带动着改变其他不利条件，从而促进试验区的超前发展。从广东的实际情况来看，加速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解决上述矛盾的突破口。

近几年来，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上取得的显著成就，说明实现超前发展的上述不利条件都可以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中求得解决或得到改善。第一，通过引进外资和创汇增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第二，实行引进、消化、改革的方针，不断提高机器设备的技术水平。第三，用多类型、多形式、多渠道的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和管理人员的文化科技素质。第四，增加农业投资，发展开发性农业和创汇性农业。第五，广开门路，初步改善交通、能源、电力、信息传递的落后状态。第六，以开放促改革，建设、完善商品经济新体制、新秩序。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开始找到了超前发

展的具体途径。

为了实行以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为“龙头”，带动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超前发展，必须辩证地认识、把握、处理经济运行以至社会运作中的几个相互关系的问题。

首先，发展外向型经济和繁荣全省商品经济相结合。综合改革试验区必须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是贯彻中央关于加速改革开放方针和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也是实现试验区超前发展所必需。但是，决不能把发展外向型经济当作发展经济的全部内容。外向型经济在国际上亦称出口导向型经济，就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来带动、促进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依赖于这个国家和地区整个经济的发展。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依托，而后者又应该以前者为导向和动力。所以，我们在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带动、促进全省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决不能把发展外向型经济当作发展经济的唯一内容，不能脱离发展全省的商品经济去搞发展外向型经济。因此，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粤东粤西两翼与广大山区的内在联系，处理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前沿和依托的相互关系。

其次，开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营方式和开展外向型经济的其他多种经营方式相结合。实施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适应发达国家和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特殊要求，积极开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营方式。但是，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也必须防止模式单一化，坚持多样化的经营方式。例如，在坚持产品以出口为主的前提下，可以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开发和利用内地资源；可以引进外资，开发国内科技成果；可以利用国内集资，引进国外先进科技，开发出口新产品或进口替代产品；还可以引进外资和先进科技，改造原有出口企业和传统出口产品，等等。总之，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我们要坚持从国际和国内的实际出发，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措施，以达到提高经济效益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再次，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和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相结合。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实现试验区的超前发展，大中型国营企业具有骨干的地位和作用，但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和增强企业自身活力结合起来。完善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是增强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又是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关键环节。在当前情况下，价格体制的改革和价格机制的完善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价格不体现价值和价格没有波动，就使市场削弱以至丧失其应有的作用。而企业要在市场竞争成为真正独立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提高经济效益，还必须自身具有蓬勃的活力。这就必须对企业实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管理和把竞争机制引进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的各个环节。只有把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国营大中型企业才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实现超前发展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最后，全面改革教育科技体制和改善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条件相结合。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技术是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因素，它们的作用的发挥则直接取决于劳

动者、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文化科学素质。因此，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状况对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超前发展的实现，是具有全局性作用的重大问题。要迅速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和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一方面必须全面改革教育科技体制，把商品经济机制引进教育科技领域，使教育科技工作面向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另一方面，要大力改善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条件，除了在物质方面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条件外，还必须实行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增强知识分子的竞争意识，让杰出人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鉴于广东省教育科技事业在全国处于后进状态，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更具有迫切的重要的作用。

总之，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超前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只有依据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客观要求，处理好各要素、各层次、各环节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才能实现整个系统的良性运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达才



地主制经济不是自然经济

经君健在《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撰文认为，自然经济是指经济单位内部有自然的和专业的劳动分工，产品能够自足并以实物形态在内部直接消费和储备，成员之间有直接的劳动交换和实物交换，货币不能在内外通行。其特征“自给自足”应区分使用价值形态和价值形态，只有前者才是自然经济的特征。内部产品和消费品的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性——“自然经济平衡律”是实现自然经济的前提条件。而包

括地主经济、佃农经济以及与之并存的自耕农和各种小生产者总和的“地主制经济”，其各类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它们必然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少样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从而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因此地主制经济从本质上讲不是自然经济，它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产生的，它的发展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条件，从时空两方面考察，两者发展具有明显的同步性。
(林摘)

辩证地理解「用足政策」

马中柱

“用足政策”，不只是在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充其量而用之，更不是偷梁换柱、钻政策的空子。“用足政策”是在坚持党的政策的原则性同时，从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灵活变通，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地结合起来。

首先是要把政策的一般规定具体化。党的政策是复盖全国或某个地区的。它所反映的是带全局性、规律性的东西，因而只能是一般的、共同的规定或要求。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千差万别的情况，它是概括不了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情况不断变化。因此要用足政策解决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各特殊的问题，就要从实际出发，把政策的一般规定或要求，变成适合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特殊规定或要求，采取特殊的措施和方法，党的政策才能真正落实。这是因为“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

别而存在。”（同上书）不把一般与个别结合，不把一般的东​​西转化为特殊的东​​西，就会使一般变成贫乏的、僵死的、枯槁的东西。例如，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们党一项大政策。但是各地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如果不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一般原则，变为适合当时当地的、特殊的具体规定和要求，那末，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只能是一句空话。一旦把这个一般的、原则的政策具体化，同特殊情况结合起来了，那末，它本身也就实现了。象建公路桥梁，过去是采取产品经济方法，由国家拨款来修的。结果国家财政支出多，修建的桥少，解决不了各地交通阻塞的问题。广东省根据商品经济的原则，实行“以桥养桥”，集资或贷款建桥，桥建好了，向过往车辆收费，几年时间就修建起500多座桥梁，很快就解决了全省的公路桥梁问题。过去广东省电力紧缺，提高用电的价格，实行“以电养电”，就提高了各地办电的积极性，仅去年一年就增加了100多万瓩的电力，很快缓和了供电紧张的状况。这都是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一般原则，变为特殊的商品经营方式的成果。

还有些政策只作了定性的要求，没有做出定量的要求。可是，“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71页）所以，没有反映政策性质规定的数量界限，往往使执行者觉得笼统、模糊，不敢大胆去执行，或执行起来走了样。要用足政策，就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定出数量界限，使执行者心中有数，也使周围广大群众放心并监督政策的实施。例如，正常的

业务活动开支和利用公款请客送礼的界限，国家早有文件作了规定。但有些基层干部还是觉得不好掌握，怕有一天会“越轨”。佛山市领导感到这是一个群众敏感的问题，不能含糊，否则正常的经济交往也会受到指责。他们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明确宣布企业提取业务活动经费的具体比例，除了超过此额度，或者中饱私囊的以外，纪检部门都不得干涉。这样，基层干部执行起来，没有顾虑羁绊，群众对干部也减少了疑虑。

其次，要把看起来是互相排斥的政策，使它们互相联结、互相促进。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两面。”（《列宁全集》第6卷，第111页）对立面的同一这一普遍原则也适用于政策领域，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还存在各种社会矛盾，党的政策处理这些矛盾时，针对矛盾的不同侧面，也有不同的政策，而且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侧重点。这些不同方面或不同侧重点之间，乍看起来是互相排斥的，但实质上它们是统一的，是互相联结、互相促进的。如果把它看作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就会顾此失彼，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处理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关系时，针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政策，避免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使统一战线政策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用足政策著名的先例。今天我们在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中，也常常遇到相似的情形。例如，改革和开放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在改革和开放过程中，经济领域也不断出现一些严重的犯罪现象。1982年以前，由于改革和

开放还只刚刚开始，人们对改革和开放还不熟悉，还不敢放胆去干。这时我们党的政策自然是侧重于指导和支持改革开放。而在改革和开放发展起来以后，有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乘机进行走私贩私和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所以，1982年1至4月，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或联合发出了三个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文件和《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这时有的地方、有的领导干部注意到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忽视了改革和开放这个基本方针的贯彻。广东省委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手抓改革和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在打击犯罪分子的同时，鼓励坚持改革开放的干部和群众，保护在改革和开放中有缺点、错误的人员，继续支持他们搞好改革和开放的工作。不但使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同改革和开放并行不悖，而且通过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保证了改革和开放的健康发展。有些地方由于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统一性，放松了改革和开放的工作，虽然打击了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但造成广大干部在改革开放中缩手缩脚，这方面的政策不但没有用足，而且根本不敢去用。事实上任何客观过程中都充满了矛盾，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只有反映了客观过程的矛盾，而不是片面地去理解和掌握它，才有真正用足政策的可能。譬如，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只有坚持“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排污不排外”的全面方针，对外开放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条件。在国内文化市场上，只有坚持提倡有益的，允

许无害的，取缔非法的，打击犯罪的，才能充分用好开放文化市场的政策，使文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三，要用足政策，还要注意政策的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是不会变的，为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所规定的有关政策，总的来说也是不变的，但小的变化还是有的。因为随着改革和开放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会不断扩大和深化。因此有的政策要放开或要收一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16页）有的需要补充、完善，有的还需要由新的政策来代替。这种变化是向好的方向变的。例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边远山区，逐步扩大到贫穷地区，再到全国实行。对外开放，开始成立了四个经济特区，以后又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三个经济开发区，到现在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参加国际大循环。适应这些变化所要改变的体制和政策也是不少的。在政策的这种变化中，要用足政策，就要在政策没有变化时，抓紧时机，根据本地情况，尽可能用到政策所规定的上限。同时根据政策可能发生变化的方向，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以求捷足先登。象第一步农村改革，四川、安徽两个省就起了带头作用。这就要有开拓创新精神，不能思想僵化，也不能怕犯错误，怕担风险。邓小平同志说：“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同上书第29页）有的时候走在前面，即使做得对也可能挨

些批评，甚至被否定。但正确的东西，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作法，终究会受到肯定，会得到推广的。这几年在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先否定、后肯定，先批评、后表扬的现象还少吗？所以，“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同上书）1985年春，国家抽紧银根，佛山市农业银行根据几家新建企业只待配套少许资金便可投产、出经济效益的情况，即向外省银行拆借一笔短期的闲置资金，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可是，我国解放后的金融史上没有拆借的先例，因此招来许多非议。但这种作法是利用资金使用的“时间差”，并没有突破国家投资总额，因而不久即为国内金融界所肯定，为今天银行业通行的横向资金融通开了先河。

可见，用足政策的过程，是把政策和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是全面把握和运用政策的过程，是使政策适应客观情况变化的过程，因而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过程。外省的同志赞许广东省用足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亮了绿灯快快走，亮了红灯绕着走，没有亮灯摸着走！”这个“快”字、“绕”字、“摸”字，不都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过程吗？列宁说：“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要注意这点——这个统一正是在认识论中”。（《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6页）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可能做到用足政策，并在综合改革的试验中，做出超前发现而独步一时。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冯达才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农联盟，具有一些全新的特点：队伍不断壮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支基本力量；工农素质不断提高，其主人翁意识越来越强；农民正逐步地向工人转变，工人队伍日益扩大。现阶段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的任务，主要是提高农业的战略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注意城乡改革的配套，处理好城乡矛盾关系。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农联盟

彭佩璜

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它是人民民主专政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理论和实践之一。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农联盟问题，对于现阶段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有效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我国经济建设朝着改革开放的方向发展，保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彻底胜利，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阶段工农联盟的新特点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将来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作为这个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的工农联盟，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一、工农联盟的队伍更为扩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支基本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结构较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我国已经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随着国家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广大个体所有制已经改造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和深化，城乡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而城乡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它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集中表明了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被消灭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已经确立起来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农联盟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队伍结构上都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农民变成社会主义集体农民，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集体经济的主人。工人阶级已发展成为一支宏大规模的队伍，在国家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工人阶级内部原先相当一部分是属于资本家所有制的工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从总体上说他们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依靠力量。以工农联盟为主体，团结着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广泛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农联盟重要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担负的历史使命与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不相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担负着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我国工农联盟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标志着我国过渡时期基本结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这就决定了现阶段作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的工农联盟，担负着不同于过去任何时期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三、工农两大阶级素质不断提高，主人翁意识越来越强烈，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农联盟又一个重大特点。我国工人农民是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素质如何，不仅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而且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工农素质的提高首先表现在文化素质的提高。80年代我国职工队伍科学文化技术水平，与50年代相比，确实有了显著的提高。从1986年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情况看，职工中具有初中、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88%，小学和识字不多的仅占12%。其中具有高中、中专文化水平的职工上升了9.88%，小学文化水平的职工下降了9.98%。特别是知识分子队伍的发展和壮大，更使职工队伍充满生机和活力。这充分说明，我国当代职工的文化素质优越于老一代。在农村，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当代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主力军是二三十岁和四五十岁的人，他们大都受过高中或初中的教育，有的还受过中专或大专教育，已经成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新一代农民。

工农素质的提高还表现在政治素质方面，广大工农群众拥护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

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对改革充满必定胜利的信心。改革是一场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工人群众对这场改革持什么态度呢？根据1986年全国总工会组织的全国性的调查表明，拥护改革的占95%，拥护开放政策的占93%。这表明我国的工人不愧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同样，广大农民也是衷心拥护改革开放的。我国的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我国农民创造的。正是这种责任制的实行和广推，使得广大农村发生巨大的变化。这说明，我国农民也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广大工农群众主人翁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广大工农群众作为国家和企业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人，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前途与企业或集体经济组织和国家的命运前途紧密地结合起来，关心企业或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希望有真正参与企业或集体经济组织重大决策的民主权利。

四、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扩大，农民逐步向工人方面转变，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农联盟一个重大特点。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之后，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日益发展壮大。全国职工人数从1949年的800万增加到1985年的1.2357亿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占73%，集体所有制职工占26%。如果把近几年来发展的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的职工人数和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加进去，全国职工人数就可超过2亿。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工人阶级人数将更加明显的增长，并呈现出农民向工人阶级逐步过渡的趋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农民逐步向工人阶级方面转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国营经济的发展，决定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国营经济将会大幅度增长，随之而来的全民所有制职工队伍也必然扩大。

第二，非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决定非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改革开放的拓展和深化，除了国营经济形式之外，还有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以及私营经济等经济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带来非全民职工人数的增长。

第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决定乡镇企业职工队伍的扩大。这是农民逐步向工人阶级方面转变极其重要的因素。

加强工农联盟的措施和途径

如何巩固工农联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不仅指出了现阶段巩固工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为我们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指明了道路。

提高农业战略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这是现阶段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的关键。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在10亿人口中，8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商品化水平很不发达。把农业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全面地发展农村经济，是8亿农民切身利益所在，是调动亿万农民积极性创造性，在下一世纪中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商品化的根本途径。同时，农村又是国内工业劳动力、原料重要基地和主要市场，农业的稳定增长和农村产品结构的改善，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所谓工业化、现代化就是要把绝大多数农业人口改变为非农业人口，把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转变成发达的商品经济。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底子还很薄，生产条件还很落后，发展还很不稳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低，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尤其是山区和边远地区的农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加强农业建设，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尤为迫切和重要。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现阶段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必经途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业的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我国现阶段工农联盟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把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并且就在农村从事工业劳动，这是实现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发展我国乡镇企业，正是实现这种客观要求的一个创造。我国乡镇企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迅猛发展起来的。1986年全国乡镇企业与1977年相比，企业数从139.3万个增加到1516万个，产值从391亿元增加到3364.3亿元，职工人数从2328.4万人增加到7937.1万人。以广东省为例，全省乡镇企业从1977年企业数8.9万个、产值27.7亿元、职工197.3万人，增加到1986年企业数96.8万个、产值264.9亿元、职工506.5万人。全国乡镇企业现已初具规模，在国民经济中居于相当的地位。我们今天的一个任务，不仅要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而且要把乡镇企业的职工素质提高到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职工素质的水平。现阶段大力巩固和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的一个重要桥梁，也是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途径。

注意城乡改革的配套，处理好城乡矛盾，这是现阶段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措施。我国的改革开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经济活跃了，城乡关系更加密切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城乡改革还不配套，城乡之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例如，在城市企业，我们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较好地解决了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但是企业和职工的关系还处理得不够好，致使有的人把厂长（经理）负责制看作是凌驾于职工集体之上新的家长制。在企业中，职工代表大会本来是职工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参加企业管理、监督干部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职工主人翁地位的本质体现。但是，现在职工代表大会作用还没有很好发挥。实践证明，职工代表大会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职工对主人翁的感受

越好，对民主管理的要求就越高，这就需要在深化改革中，进一步搞好民主管理，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经营的管理权威和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相统一，形成经营者和生产者相互依靠密切合作的新型关系。

在农村，为农村服务的机构改革以及其他一些配套改革尚未很好跟上去。农村的产、供、销的渠道尚未畅通，农民需要的良种、化肥、农药、塑料薄膜、农业机械和特种配方饲料得不到满足，农民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特别是一些经济作物又往往卖不出去。农民要发展商品经济，又受到诸如资金不足、收购价格不尽合理等方面的限制，一些不法分子乘改革之机，从中插手，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直接影响了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除了国家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对农业的支援之外，还要搞好价格、流通、金融和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的改革。一些直接为农村服务的政府机构，也要以服务为中心转变行政职能，为发展城乡商品经济提供多功能的社会化服务。此外，还要搞好农村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只有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协调、配套的改革，才能破除旧体制的各种弊端，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好新出现的城乡矛盾，促进城乡商品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作者单位：广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责任编辑：范 英



现存金融体制对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四个障碍

王涛在《国际金融导刊》1988年第二期提出，目前我国金融体制，对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阻碍作用表现在：

(一)过分集中统一的对外集资政策，使我们失去了许多廉价而可广泛利用外资的机会；

(二)对外金融机构单一，功能不全，不能适应沿海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要求；

(三)外汇管理过严，汇价缺乏弹性，创汇与用汇不能在时间和空间上灵活掌握，致使地方和企业失去许多投资与营运的机会，甚至遭受损失；

(四)企业与金融业的营运机制尚未理顺，债务的良性循环及其预算的刚性约束尚未健全，不利于广泛大量利用外资。

(荣摘)

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平等关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平等关系可概括为：以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平等和占辅助地位的资本平等为基本内容，以交换平等为实现形式，以结果相对平等为补充。应当相应地在全社会确立这四种经济平等观，作为判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各种经济行为的基本道德准则。

经济平等问题，是当前社会上议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也是理论界争论较多而远没有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确立什么样的经济平等关系和经济平等观？正确回答这一问题，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清除经济伦理观上的障碍，是理论界一项紧迫的任务。

一、对“机会平等”观的反思

经济平等关系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享有相同的经济权利。它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经济平等观则是人们对社会经济平等关系的伦理认可和价值取向。它作为经济伦理思想和道德判断准则，指导人们从事和评价经济行为，从而成为影响和制约人们进行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原则之一，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

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平均主义，实际上确认了对社会财富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经济平等关系。近几年，理论界借用西方经济学中“结果平等”概念来概括这种经济平等关系，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现在，理论界绝大多数人已认识到，结果平等与按劳分配原则相对立，与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相矛盾，与社会主义效率原则相冲突，严重阻碍了并继续阻碍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道德观念的进步，应当予以否定。于是，理论界有些同志主张以“机会平等”^①观来代替“结果平等”观。但是，“机会平等”的含义是什么，它能否概括现实的经济平等关系？这是个值得冷静思考的问题。

机会平等，意味着社会为同等能力、同样志愿和同等努力的人提供同样的行事机会。资产阶级学者竭力标榜资本主义社会是机会平等的社会，但实际上机会不平等的现象比比皆是，最明显的是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机会极不平等。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经济生活中，至少在以下几方面还不可能做到机会平等或完全平等：

一是劳动者培养和发展自己能力的机会不完全平等。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人比家庭经济条件差的人得到更多的受教育、受培训的机会。城市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多于农村劳动者。同样是农村，发达地区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多于不发达地区。只要社会还不能实施免费教育，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就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受教育不同，劳动者就业前的能力和素质差别就较大。这种不平等是一种起点不平等，使人们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竞争。

二是就业机会不完全平等。就业志愿相同而能力不等的劳动者，就业机会不平等是不须赘言。就是就业志愿相同、能力相同的劳动者，就业机会也不可能都是平等的，因为劳动力的流动不可能做到完全自由。

三是占有、使用生产资料和按劳分配的机会不完全平等。首先，在全民、集体、个体、私营等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劳动者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的机会不完全平等，如农民极少有机会直接占有和使用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其次，在公有制内部，全民企业之间、全民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集体企业之间，劳动者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也有差别，甚至差别很大。以上这些占有关系上的机会不平等或不完全平等，必然要引起劳动者之间在收入分配机会上的不平等或不完全平等。在公有制企业之间，等量劳动还不能得到等量报酬，按劳分配的机会是不完全平等的。

四是政策待遇不同而造成的机会不完全平等。在现阶段国家有重点发展的省份和地区，各省市也有重点发展的片或点。在这些重点发展的地区和点上，实行一些优惠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提供了较多的先富起来的机会。这就是现在全国各地有许多人想去经济特区的基本动因。

以上这些机会不平等或不完全平等的现象，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逐步减少，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完全消除。在现阶段，机会平等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层次、一定环节和一定点上得以实现。例如，市场上的商品交换，仅就等价这一点来说，人人机会是平等的。又如，占有生产资料和按劳分配的机会，只有在同一公有制企业内部才能做到平等。即使到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由于还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劳动者家庭经济状况还会有差别，从而受教育和发展主体能力的机会就不可能完全平等。

目前，人们在议论社会经济平等、判断经济行为合理与否时，常把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平等关系混同起来，或把商品经济一般平等当作社会主义平等，或把在较远的将来有可能实现的平等当作现实的平等加以追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机会平等的舆论造得很大，把人们的胃口吊得很高，而实际生活中却存在着很多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以致机会不平等成为“现阶段公众不满的核心问题。”^②这种情况的连锁负效应是：强化了攀比和平均分配的心理，诱导人们去平分社会能够提供的有限机会；造成人们对现行政策的怀疑和不满，强化逆反心理，增加了改革的心理障碍和难度。这些情况恐怕是机会平等观的倡导者所始料不及的。因此，现阶段不宜笼统地宣扬机会平等，以其作

为判断经济体制改革中各种经济行为的道德准则。应当向人们指出：我国现阶段经济生活中的机会是紧缺的、有限的和不平衡的，存在一些机会不平等或不完全平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唤理论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平等关系的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概括，提炼出能具体指导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经济平等观。

二、我国现阶段多层次的经济平等关系

经济平等同其它任何平等一样，都是一种权利，而权利是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这种经济结构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经济还是一种不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些情况决定了社会经济平等关系不是单层次的，而是多层次的；国民收入实际上依据四种尺度，进行了四次分配。与此相对应，存在着四个层次的经济平等关系，即交换平等、资本平等、劳动平等和结果相对平等。下面按收入分配的实际顺序分析这四层中前三个层次经济平等关系。

第一层：按企业有效劳动分配——交换平等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劳动者的收入，直接受企业产品销售状况的影响。企业只有把产品销售出去，实现了价值，凝结在这些商品中的企业集群劳动，才算得到社会的承认而转化为社会有效劳动。企业实现的价值多，所得净收入就多，劳动者的收入就会增多。企业与社会总劳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按有效劳动量分配社会价值的关系，在这里，交换过程即分配过程，二者同步，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体现了商品经济一般平等关系——商品所有者平等。这种平等可简称为交换平等。

关于交换平等，马克思作了详尽的论述，并在这个意义上称“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③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交换平等有如下特点：（1）交换主体利益独立。交换双方都是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商品所有者，交换是为了谋取主体本身的经济利益。（2）交换主体平等。买卖双方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3）交换主体自愿。买卖双方一个愿买，一个愿卖，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4）交换客体等价。交换的唯一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交换双方所交换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是等价物，或者至少当作等价物。（5）交换平等是表面的平等。交换是商品流通中的行为，流通本身不会产生不平等，而只会产生平等。这种平等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平等。（6）交换平等是个中性范畴。纵观古往今来，横看世界各国，无论是简单商品交换，还是现代商品交换；无论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还是社会主义商品交换，都存在这种平等关系。

第二层：按资分配——资本平等

首先说明一下，下文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资金称作资本。这不仅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且在经济关系上也有这种范畴转换的必要：第一，资本作为能带来比自身价

值更大的价值的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而资金范畴的含义只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公有财产的货币形态，反映不了价值的增殖性。资本本身并不反映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只要有商品经济，就有资本范畴存在。第二，我们承认并努力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商品化、基层生产组织企业化、企业资金商品化，这就实际表明了资金的资本化。第三，公私合股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使同一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多元化，没有必要把属于公有的称作资金，属于私有的称作资本。我们只须把资本区分为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知道二者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就行了。

资本是商品经济的血液。资本使用的有偿性，是由资本的增殖性和紧缺性决定的。资本使用的有偿性表现为参与企业劳动者创造的净收入的分配。这在习惯上称作按资分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按资分配是众所周知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公有资本的可有偿使用，是社会经济由自然经济性质的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全民企业无偿使用国家资金，导致了投资膨胀、资金周转缓慢、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下等后果。克服这些弊病的关键，在于实行资金的商品化、资本化，承认公有资本参与企业净收入分配的合法性。改革以来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有必要实行按资分配。

在商品经济中，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收入，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一条带有一般性的经济规律。按资分配所反映的这种经济平等关系，可称之为资本平等。资本平等的特点是：（1）资本所有者利益独立，有追求资本增殖的内在冲动。（2）资本所有者地位平等。在同一资本市场上，无论资本姓“公”还是姓“私”，其所有者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3）资本借贷自愿，借方和贷方都不受任何强制。（4）资本收入平等。资本参与分配的尺度是资本的量，等量的投资，得到等量的收入。（5）资本收入是凭借积累劳动所有权参与企业活劳动创造的净收入的分配的结果。（6）资本平等是个中性范畴，它本身并不直接反映某种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

按资分配的资本平等关系，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中，体现不同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按资分配反映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这里，资本的平等权利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在一切实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都是平等的，把这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④第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作为一个通则来支配、调节资本家集团对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分配。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公有资本参与企业净收入的分配，取之于劳动者，用之于劳动者，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资本参与分配的特点是：在企业净收入分配中，按资分配在先，按劳分配在后，按劳分配的量是按资分配后的余额。因此，在企业净收入中，首先应保证国家贷款的利息或国家、企业、个人等股份的股息，然后才是企业劳动者的按劳分配。这就形成了企业内部的两次收入分配。

确认按资分配的资本平等关系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合法性，具有重

要意义：（1）有利于促使公有制企业节约使用资本，加速周转，提高公有资本的利用效率；（2）有利于促使社会资本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自由合理流动，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地配置和最有效地利用紧缺的生产资源；（3）有利于促使各类企业的纯收入向生产资本转化，鼓励个人储蓄和直接投资，控制消费基金膨胀，加速生产条件的积累。

第三层：公有制企业内部按劳分配——劳动平等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本质要求，它所体现的经济平等关系是劳动平等。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劳动平等具有如下特点：（1）劳动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完全平等，任何人不再私自拥有任何生产资料。（2）劳动者社会地位平等，都是生产资料乃至社会的主人，真正当家作主。（3）劳动者劳动权利和义务平等，谁都无权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人人都有从事劳动的义务。（4）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尺度是劳动，不存在多劳少得、少劳多得和不劳而得的情况。（5）承认劳动者之间在按劳分配基础上的收入差别和实际生活水平的差别。

但是，前面已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机会和按劳分配的机会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因此劳动平等只能在同一公有制企业内部实现，不同公有制企业之间还不能实现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的平等。在非公有制企业里，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平等是不存在的。所以，现阶段只能实现局部劳动平等。

① 有些同志又称之为“机会均等”。二者意思基本相同，故本文一律用“机会平等”。

② 《经济研究》1987年第12期第61页。

③④ 《资本论》第1卷第103、436页。

作者单位：合肥电子工程学院政教室

责任编辑：黄振荣



吴 强 王雍君

投资不足： 被掩盖的现实

由于评价方法上的差异，对当前我国投资规模究竟是膨胀还是不足，认识很不一致。笔者提出投资不足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并认为，在评价方法上应把握两个基本点：一、应从我国经济现实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投资规模，不能就投资论投资，在缺乏参照系或相对尺度的情况下讨论没有意义；二、目前的“投资规模”或“名义投资”应排除过多的“水分”。

投资膨胀，几乎成了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中压在人们心中的一个难以驱除的阴影。可是，当我们把注意力首先转向现阶段投资规模问题时，我们发现，在众口一词的投资膨胀的背后所遮蔽的竟是令人忧虑的投资不足的现实。中国的投资规模不足既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结构性不足。

投资不足一论：总量不足

我国投资总量不足可从总量的潜在不足、现实不足和有效投资总量不足三个层面予以递进分析。

1、投资总量的潜在不足，即投资供给同我国经济振兴和发展所客观要求的投资水平之间存在缺口，前者远低于后者。

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自己特色同时也鲜明地显示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一般特征。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从它取得民族独立的那天起，就不得不把振兴民族经济、把经济从一个不发达阶段推进到相对发达阶段作为压倒一切的经济目标，但又不可能走发达国家按步就班的老路。由于劳动力、自然资源一般不构成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加速资本积累便有了内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低收入水平、深刻的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金融体系的严重缺陷和落后观念却使提高储蓄水平、加速资本积累面临极大的限制条件。这样，储蓄不足（投资不足）同外汇不足构成的“双缺口”便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经济发展理论中关于“贫困恶性循环”的理论也把资本稀缺作为导致这种循环的基本原因。因为从动态看，一个时期的资本形成是下期产出增加的源泉，投资创造了未来生产增长的能力，反过来又促进了产出与收入的增长，进而为下轮进一步扩大资本形成开辟了源泉。

辽阔的国土、落后与极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庞大的人口、相对甚至绝对贫瘠的非人力资源同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从供需两端拉开了我国投资总量潜在不足的巨大缺口，我国现阶段更面临着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尤为严峻的投资总量相对不足的特殊压力。

投资总量的潜在不足迟早要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不足，这只是时间问题。但我们若能对前景和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而不是一味地空谈投资膨胀，也许可以防患于未然。

2、现实的投资总量不足。这是我国投资不足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文章都认为现实的投资“膨胀”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膨胀”的结论。

(1) 从纵向对比看。这里仅以“六五”情况为例。从历史上看，“六五”时期的积累率、全民所有制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基建投资占积累总额的比例在各时期中都居中下水平并呈下降之势（参见下表，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比 率 \ 时 期	一五	二五	1963~ 1965年	三五	四五	五五	六五
积累率	24.2	30.8	22.7	26.3	33.0	33.2	31.4
全民所有制投资/国民收入	14.3	21.5	11.8	12.5	16.0	15.6	13.0
基建投资/积累总额	58.9	69.6	52.0	47.7	48.4	46.9	41.5

资料来源：《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

“六五”比“五五”投资增长66%，略高于积累额增长64%的水平，低于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增长73%、72%和69%的幅度。投资增长幅度低于国民收入增长幅度，仅有“三五”与“六五”两个时期，而“三五”的经济恢复不同于“六五”的经济振兴。

事实上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积累率已在不断下降，“六五”后期虽有回升，但主要是以外债予以支持的。单从占国内国民收入的比重看则已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

以上分析并未考虑价格上涨因素。如考虑涨价因素，上述事实更能得到充分的证明。这在下面还将论及。

(2) 从横向对比看，这里仅以日本为例，因为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情况与我国具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积累与投资水平的对比上，许多学者常把日本的“民间设备投资率”或“投资率”直接同我国的积累率进行比较。以此比较，日本在1950~1980年的“民间设备投资率”为16.7%，低于我国同期的积累率；“投资率”为31.8%，略高于我国同期水平。

日本的“投资率”相当于我国的积累率，但二者在统计口径上存在较大差异，上面简单的直接对比正好忽略了这种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亦很不可靠。将日本的“投资率”调整为可比口径的我国积累率后，日本1956~1970年的15年高速增长期年平均积累率高达40.3%，而我国同期仅为26.8%，比日本低10个百分点；1952~1976年日本年平均积

累率为36.8%，远高于我国同期27.2%的水平(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8年第3期，第64页)，也高于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日本经济起飞固然得益于诸多因素，但高积累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

(3) 从各部门固定资本和净产出比率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现实的投资规模不足。

中国各部门固定资本和净产出比率的国际比较

	中 国 1981	印 度 1978~1979	南朝鲜 1968	日 本 1965	典 型 大 国 300 \$	1200 \$
农 业	0.46	1.30	0.49	5.03	1.19	2.13
采 矿 业	0.69	4.94	0.79		0.98	1.43
重制造业	2.12	2.57	0.73	2.11	1.69	1.72
轻制造业	1.14		0.58		1.52	1.52
基础设施	2.42	4.73	2.43	5.19	7.69	6.25
服 务	2.79	3.20	3.33	3.52	1.75	1.69
总 计	1.45	2.51	1.57	3.4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附件五)第25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版。

由上表可知，在农业、采矿业和基础设施方面，中国每单位产值使用的固定资本是最低的，在服务业方面，中国使用的固定资本也是较低的。从总体上看，中国每单位净产值使用的固定资本是最低的。

(4) 现实的投资总量不足还可从近年的消费膨胀中得以佐证。鉴于传统体制对消费尤其是个人消费的极大压抑，改革过程中消费增长作为一种“恢复性反应”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其来势过猛足以对资本积累与经济的长远发展构成现实的威胁。80年代以来我国的总消费水平呈跳跃式增长，其势甚猛(见下表)。

消费总额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一五	二五	1963~1965年	三五	四五	五五	六五
6.5	-2.0	10.9	5.0	4.9	6.9	10.6

资料来源：《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年)

发端于80年代的高消费浪潮自1984年来进入高潮，表现为个人消费与集体消费的双向膨胀。在人均收入水平刚进入300美元的低水平下，我国城镇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的普及率即已达日本人均1000美元时的水平。一些高档耐用消费品来不及更新换代，市场就已基本饱和了。大量豪华的进口小轿车、一应俱全的现代化室内设

备、众多的高级楼、堂、馆、所同企业大量的50年代甚至30年代的生产设备“正常运转”的现象居然那么“和谐”地并存。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却把留利的70~80%直接或间接用于消费，而对积累与投资的增加缺乏兴趣。而我们的“家底”又有多厚呢？

国际经验表明，在一个不发达国家中试图以高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其结果可能使居民对投资率变动区间缩小，延误经济发展时机。事实上，消费膨胀的恶果在某些方面已经显示出来了，尽管还远未全部显示出来。如果把来自“黑收入”与“灰收入”的实际收入加到一般名义收入即工资、奖金中一起考虑，那么我国城市的劳动成本同日本已相当接近。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正在逐步丧失甚至已经丧失已不再是预言了。不仅如此，消费膨胀还严重打击了人们的储蓄热情，降低了经济的投资能力与现实的投资水平，使经济的长远发展缺乏后劲。

3、有效投资总量不足。这里的分析是对上面分析的补充和深化。为行文和思路的清晰，我们设定：

Ia：名义投资，即一定时期内的实际投资额；

Ib：有效投资，即对资本物的形成真正做出贡献的投资额，是Ia中扣除各种“水分”后的余额；

Ic = Ia - Ib：无效投资或“水分”投资，即对资本物的形成不起实质作用的部分，它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无形的“投资耗减”现象。

投资膨胀的传统评价方法主要缺陷之一就在使用名义投资概念作为依据，我们知道，名义投资中或多或少总有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会被损失或浪费掉，不对资本物的形成起实质作用。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投资耗减”。名义投资概念恰恰忽略了我国投资领域中这一突出现象。由于投资耗减，即便名义投资膨胀了，有效投资仍可能不足；而名义投资如适量或不足，有效投资则肯定不足，且更加不足。因此，考察投资规模，最终必须落脚到有效投资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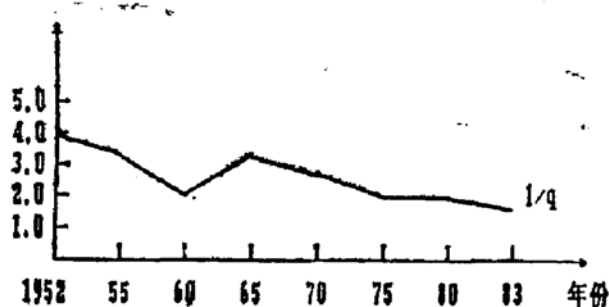
我国经济中的投资耗减现象相当普遍，也十分严重，然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我国的名义投资一般要经历三重耗减，使有效投资不足更为严重。

(1) 投资的一重耗减：价格耗减，即因价格上涨对有效投资的大量吞噬，造成投资虚胀的假象。近几年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很快，已超过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对投资影响极大。投资品中设备、建材价格以每年不低于15%的速度上涨，加上劳务费用的上涨，使规模虚增现象十分严重。“六五”全民所有制名义投资4700亿元，若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仅为3500亿元，虚增投资1200亿元，平均每年虚增240亿元。（参见《投资研究》1987年第1期，第23页）

(2) 投资的二重耗减：效益耗减，即由于投资效益恶化（下降）或投资成本上升而造成投资的实际损失。

建国以来，我国投资效率（即投资系数q的倒数： $1/q = \Delta y/I$ ，表示单位投资能带来多少国民收入增量）呈下降趋势（见下图）。

投资效率 $1/q$



1952年我国的投资效率最高，为4.11，1983年则下降为2.47。1953~1969年的18年中，除1957~1961年和1966年这6年外，其余12年投资效率全部落在3.3附近，而1970~1983年的14年中则下降为2.46左右（参见符钢战等著《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第235~236页，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

近年的投资效益继续呈恶化之势，198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新增固定资产占当年总投资的比重为71.6%。远低于“一五”平均88.7%的水平，也低于1980年76.9%的水平。“六五”计划要求有4000个大中型建设项目投产，实际仅完成一半多一点，这还不包括因缺电而不能正常生产的项目。

由投资效益恶化虽不能简单地得出必须增加投资予以抵补的结论，但至少表明它耗减了有效投资的实际规模。同时，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投资效益，而要达成同样或更高的投资规模目标，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也应该如此）增加初始投资，以形成规模效能。

（8）投资的三重耗减：消费耗减，即名义投资中相当一部分通过非正常渠道实际上变成了消费基金，使投资额发生实际漏损。一般来说，投资额中总会有一定比重转化为消费基金，这在各国都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我国这一比重偏高，前些年有人测算约为40%。从近年的情况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投资的三重耗减的实质后果是造成现实投资总量的更加不足，然而在表面上却造成了投资虚增虚胀的假象。投资的规模政策必须考虑这一点。

投资不足二论：结构性不足

投资的结构不足较之总量不足更易为人们所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得更为突出。

我国投资的结构不足表现在许多方面。

1. 贫困、落后地区投资不足，即边、少、内、穷地投资过少，这几年资金更是流向沿海发达地区。长此以往，中国经济的空间断裂会更加突出，“马太效应”也会日趋强化。

2. 生产性投资不足。“六五”时期生产性投资所占基建投资的比重已小降到建国以来最低水平，且降幅相当大（见下表）。

时期	一五	二五	1963~1965年	三五	四五	五五	六五
比重	67.0	85.4	79.4	88.8	82.5	73.9	57.3

投资结构的轻型化，生产性投资的严重不足，足以对经济的起飞与长远发展造成危害，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3. 投资的部门结构性不足。我们将重点解析十分突出的农业投资与基础产业的投资问题。

(1) 农业投资严重不足。农村改革伊始直到1984年，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生产达到建国以来最高峰，中国的农业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此后农业状况的日趋恶化尤其是1987年主要农副产品供应的全面紧张，一方面暴露出我国农业基础的极度虚弱，农业远未“过关”；另一方面清楚地表明生产关系的调整对30多年来农村积蓄的人力、物质技术潜能的释放已接近尾声，农业增长的主要矛盾已从体制方面转向农业生产力与农业投入方面。然而，这一点恰恰被忽视了。自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投资在绝对量与相对数都在逐步下降。整个农业投资占经济全部投资的比重，由“一五”~“五五”的10%左右下降为1986年的4.6%。1980年前的29年间农业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总投资平均约为12%，但“六五”仅为6%， “七五”原计划不到5%，是几个五年计划中最低的，而1986年又是建国以来农业投资占国家基建投资比例最低的一年，仅为3.3%，比1980年的9.3%下降了6%。各省的地方财政支农资金同样急速下降。农业信贷资金大量退出农业领域的现象也十分令人担忧。1981~1986年，农村存款增加额约高于农业贷款增加额120亿元，农村存款增加额中仅56%用于农业贷款，而且中长期贷款比重偏低（不达60%）。目前农业贷款仅占全部银行信贷投资的4%左右，且还在下降。人们曾将“以工补农”视为发达地区增加农业投入的重要支柱，然而“六五”全国乡镇工业利润中用于农业的资金由每年23亿元下降到9亿元。在国家、集体的农业投入都急速下降的情况下，试图把农业投资甩给农民的初衷，也被农民对农业投入比例大幅度下降这一无情的现实碾得粉碎，财力有限且热情不高的农民更乐意把钱花在建房、购买消费品上，而不是农业尤其是比较利益太低的种植业上。

另一个重要因素似乎也被大多数人忽略了。建国以来直到农村改革前，中国广大农村大量极为廉价的劳动力长期以“力役”方式从事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由此替代(节省)了相当可观的投资额。但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后，这种近乎无偿的“力役”对农业投资的大量替代的现象，大概不会再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了。从由此形成的农业投资缺失的角度看，这笔帐又该如何计算呢？

事实上，农业投资的严重不足已经使中国的农业伤痕累累，并波及到经济的诸多方面，曾被忽视为中国农业的骄傲与命脉的农村水利建设如今不仅几乎偃旗息鼓，而且连“老本”也逐渐耗竭了。投资不足，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在“六五”即减少了1287万亩。地力衰减、耕地面积缩小的现象十分严重，农业科技人员大量跳出“农门”。中国的

农业面临着严峻的危机!

几乎所有的农业发达国家或农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把农业的基建投资长期稳定在10%以上,而农业落后国家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农业缺乏足够的投入。

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决非可有可无的权宜之计,尤其在我国农业生产的投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集体和农民的情况下,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并稳定保持在足够的水平就尤为必要和重要。再考虑到农业领域的投入产出率低、生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这样做亦尤为迫切。诚然,农业问题不是单纯增加投入所能解决的,但如果这个关键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农业发展的后劲从何谈起?经济振兴与起飞的“奇迹”怎能发生?“伤痕农业”的基础又如何能支撑起现代化的经济大国?

(2) 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与基础原材料工业的投资严重不足,使其长期构成困扰中国发展的瓶颈。“六五”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的建设投资比重,始终没有达到计划要求。“七五”原计划规定这些部门比重提高到55%,但实际上1986年只完成49.6%。这些行业的大中型重点建设项目资金不足尤为严重。1986年全民所有制在建的大中型项目达960个,约需投资2000亿元,即便将每年全国的投资全用于此,亦需4年时间,发行重点建设债券筹资,问题与阻力也不少。有些地方不缺电,很不愿意买能源电力债券,有些单位则无力购买行政安排的电力债券。由于投资不足,“六五”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供应的紧张状况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有所加剧,全国能源弹性系数、发电量超荷系数、铁路货运增长系数,仅及前几个五年计划的一半,甚至更低。发电装机容量接近“五五”水平。当前全国缺电500亿度,因电力不足,全国大约有20%的生产设备不能正常运转,直接损失产值约1000亿元,由于基础产业相对于以消费品工业为代表的加工组装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六五”时期不得不大幅度进口原材料予以支撑。这种局面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

基础产业的滞后,除其价格长期偏低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不足。同样,这种被动局面要得以改观,长期来看固然有赖于价格体系的调整,但当前重要的是追加投资。

投资的部门结构性不足不仅限于农业与基础工业。科研教育事业、城市公用事业与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也十分引人注目。

当代中国所谓的投资膨胀,充其量只是表明相对于某些投资结构性不足而言的投资结构性膨胀。因此,笼统地谈投资膨胀和“控制投资规模”,说轻了是不得要领,说重了只能造成危害性影响。而从整个投资领域来说,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投资结构与投资效果方面的问题,而不在于投资规模方面的问题。有关投资政策的重心应相应地转移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更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投资结构与投资效果涉及深层的投资体制问题,这方面的进一步探讨已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

作者单位: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 黄振荣

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问题和抉择

廖建祥

在当前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推进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特区同样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

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保持低速增长的势头，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国际性的股市暴跌的震荡促进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调整产业结构，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劳动工资低廉且投资环境较好的地区；国际大量剩余资金在寻找投资场所；日元、台币和南朝鲜币的升值有利于我们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这是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难得的机遇。这是二战结束后第二次的国际性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如所周知，战后六七十年代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给“四小龙”抓住了时机实现经济起飞成为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而这次的国际性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而且大量的香港、台湾、南朝鲜等的梯度优势的转移。我们应抓住时机，有选择地大胆接受这次转移，促进我国经济振兴腾飞。

但是，应该看到，这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同六七十年代比较也有不同之处，对我有利的形势比不上上一次的调整。这主要表现在：战后六七十年代正值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时期，经济增长率高，社会需求旺盛，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有政治、社会、经济不稳定等问题，投资环境不理想。而“四小龙”捕捉了时机，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设备的转移而顺利地实现了经济起飞。现在情况则不同。虽然发达国家致力调整生产结构，大量剩余资金寻找出路，但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市场需求相对缩小，保护主义猖獗，商品出口受到阻碍；竞争对手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工资低廉能够接受产业转移的不少，如我国邻邦的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尼，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它们都在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在出口商品方面也是竞争的对手。这些都说明，外部环境还存在不利的条件和因素。

因此，必须冷静估计这种不利的国际条件，在开放沿海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注意采取不同层次的开放格局，突出特区的特殊作用，以对付更严峻的国际竞争。

(二)

经济特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它是全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我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子战略。各个经济特区情况不同，具体战略目标和步骤、措施不一样。但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市场交换和竞争，发挥“四个窗口”和“两个扇面”的作用，促进内地和全国经济的发展，则是共同的。

理论界对“外向型”还有不少争论，我认为不必再争下去，因为已经制定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和特区几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外向型”战略是正确的。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行中，经济特区的地位与作用如何区别于其他沿海地区的问题。

沿海开放地带经济的发展，从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资金循环的运动来考察，外向型经济可以分为四种形式：

第一种：生产资料在国外，进口生产资料同国内劳动力结合，生产的商品销售国外。这就是通称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最具体的方式就是来料来件加工装配以及进料加工复出口。

第二种：生产资料在国内，经过加工生产后的商品销售国外。这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沿海开放地带通过“内联”把内地农矿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增值后打入国际市场，就是这种形式。

第三种：生产资料在国外，进口生产资料（包括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元器件等）后，制成品在国内市场销售，或直接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销售，这是“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目前我们进口涤纶和电子元器件加工，产品起“进口替代”作用满足国内需要的，或直接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销售的，都属此列。

第四种：“内外结合”、“又内又外”。这是部分进口国外的生产资料，部分依靠国内互相结合，进行生产加工，产品销售国际市场（同时也满足国内市场）。目前电子和科技产品原材料和元器件的国产化过程，就是“内外结合”、“又内又外”的形式。一些制造业“以出带进”，又“以进带出”，是实现增值和扩大出口创汇的重要途径。

探讨经济特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我认为应考虑两点：

第一，经济特区在沿海开放地带中应继续发挥其最高层次（姑不议论海南岛最大的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产物，特别是深圳和珠海特区，由于它的地理条件的优势，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外贸出口等方面在沿海地区居于领先的地位。它的“扇面”辐射作用也是比较突出的。上述四种外向型的形式在沿海开放地带一般都同时存在，但从战略角度考虑，“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接受发达国家特别是“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以“来料加工装配”为主要形式，不应该是经济特区的主要任务，特别不能作为特区的外向型发展的重要的目标形式，这与沿海其他开放地带不同。沿海其他开放地带，可以把接受发达国家特别是“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

移作为重点的战略任务，而经济特区在多种形式并存的外向型发展中（按：第三种形式不是纯外向的，是内向或次级内向的形式），应该特别注意发展第四种形式。把利用外资企业（特别合资企业）的国产化水平逐步提高，增加出口创汇能力。另一方面，在不同内地争原料的条件下，采取第二种形式，即发展内联企业，利用内地农矿资源，进行深度加工生产，扩大出口创汇（也可以通过到内地投入资金、技术，利用内地资源发展外向型创汇企业）。至于第三种形式，特区应根据国内市场需求，有计划发展“进口替代”的产品以及以部分市场换先进技术的项目。这是符合特区外向型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的。

总的说来，在沿海开放地带发展外向型经济，经济特区应着眼长远打算，着手当前。在四种形式中，以第四种形式为主，其次，要注意发展第二、三种形式，并适当发展“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形式。这是现阶段特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区别于其他沿海开放地带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为重要目标的地方。

第二，特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从奠基阶段进入发展阶段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进入成熟阶段。走向成熟阶段是在特区提高经济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实现的。由于特区的经济技术基础比发达国家和“四小龙”还有较大的差距，特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凭藉较低的劳动工资成本的生产优势，因此，特区外向型经济发展还不能立即走向成熟阶段，而是要采取多种形式，有主有次去逐步实现高水平的外向型经济。如果脱离实际把特区的战略目标要求定得过高，那必然是欲速不达。

（三）

特区在对外开放中要进一步发挥其最高层次的地位与作用，重要的问题是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使之逐步优化和升级。相对沿海其它开放地带，特区在这方面应该是超前发展的。

特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其最终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通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优化组合，资金运动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紧密结合来实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表现在地理和交通的条件、资源条件、技术条件、劳动力条件以及资金条件等优势发挥。这也是生产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的问题。

我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生产力落后，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有机构成低。落后的产业结构，也相应伴随落后的出口结构。初级产品、粗加工的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主要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交换中处于劣势。许多外向型企业的出口商品的国内价值高于国际价值，出口商品的亏损问题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这是优化产业结构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特区要很好在这方面作出成绩，做出榜样，使创汇企业有较高的盈利。

上面我们阐述了战后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四小龙”捕捉了时机，接受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至实现经济起飞的问题。应该指出：“四小龙”在接受产业转移之后，对引进的

技术进行吸收、消化、创新，把劳动密集同知识密集结合起来，使产品升级换代，开发了国际市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逐步优化产业结构，才取得成功的。当前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的已经或正在加紧进行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重化工业或高科技产业，解决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问题。当前我国沿海开放地带接受发达国家和“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主要是有利于我们增加资金积累，扩大出口创汇，解决劳动就业等问题，它不能代替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重大任务。当然，接受产业转移，对于我们参加国际分工，把产品投入国际市场交换和竞争，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是很有好处的。

产业结构的优化要求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合理化。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应区别情况，实行必要的分工与协作。要加强宏观指导和协调。对于已有较好的经济技术基础的地区，主要应加强对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发展出口创汇企业。特区应注意引进档次高、质量优的项目，特别是要更多生产在国际市场有较强竞争力的名优产品。对于内地资源如国际市场高值的农业原料及矿产建材等，经济特区可以根据互利原则，进行横向联合，开发加工，增值出口。这种资源优势同特区经济技术优势的结合，是发展外向型经济技术优势的结合，是发展外向型经济优化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技术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特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长远目标和重要方针。优化和升级总的目标是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多层次技术结构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化。目前沿海开放地带的技术引进，大部分是引进“硬件”设备，装配线、组装线，技术和各种“软件”少，先进的尖端技术更少，对引进的技术进行吸收、消化、创新的微乎其微，这是一个严重缺陷。这种局面不改变，我们在新技术革命中只能步人后尘，处于落后地位。经济特区由于它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基础好，条件优越，在研究开发新技术方面，具有“内联”、“外引”的有利地位，通过引进国外的科技力量和联合国内的科技力量，开展专项研究、开发、试验，首先在特区生产上和技术结构上实现优化和升级，这对于发挥特区的“窗口”和“扇面”的作用，都是极为重要的。

特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逐步优化和升级问题，是特区走向新阶段，实现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核心问题。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

责任编辑：黄振荣



关于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

张太增 郭利平 杨晓明

“剩余价值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它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劳动。这是马克思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然而，我们则认为：剩余价值不仅是工人劳动的产物，而且也是资本家劳动的产物。对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产生和实现的全部生产经营过程的分析，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一、从筹备建厂阶段来看

工业资本家要想攫取剩余价值就必须开办工厂。开办一个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才能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呢？这是资本家首先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为了开办工厂，资本家必须对原料来源、生产程序、产品销路、市场行情等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判断，然后作出投资决策。这对于剩余价值的实现及多少至关重要，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如有的资本家决策正确，工厂兴旺发达，不但赚回了全部投资，而且还获取了高额剩余价值。但也有的资本家决策失误，导致工厂倒闭，不但没有获取剩余价值，反而还亏了本。

建厂阶段。资本家根据自己掌握市场情况和经济实力来决定办厂，他要考虑并决定，投资多少和工厂的规模大小，工厂的位置选择，购买生产工具、原料、劳动力，制定工厂法规等一整套管理生产体系，这些工作资本家已付出了大量的脑力劳动。

调试阶段。工厂建成后，资本家要对整个工厂进行全方位检查验收，进行投产调试工作，这一阶段的工作十分重要，而难度又较大，工程质量如何直接影响着生产运行。

从筹备建厂的整个过程看，一系列的工作主

要是由资本家进行的，而这些工作又多是复杂的脑力劳动。

二、从产品生产阶段来看

在这个阶段，工人与资本家的劳动是同步进行的。工人的劳动是微观的，而资本家的劳动却侧重于宏观方面。但是，不论是宏观的劳动还是微观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工人的劳动。假定资本家开办一个纱厂，雇佣工人10名，支付劳动力价值50元，而50元的价值，工人只需用6小时劳动就能创造出。又假定工人在6小时中消耗50公斤棉花，支付100元，10个纱锭支付20元，机器磨损费用5元，6小时后生产出（为了计算方便，不计棉花损耗）棉纱50公斤，价值为175元。

资本家的劳动。资本家的劳动是侧重宏观方面的脑力劳动，因为脑力劳动是复杂的、高层次的、抽象的劳动，且贯穿于生产力的产生、形成、发展的全过程，所以对它的价值也应宏观地看，只用几个简单的数字，或者几天时间，甚至几小时是很难衡量的。宏观的劳动主要表现在综合管理能力方面，尽管它可以从各个具体方面体现出来，但从资本家的应变能力强弱这一侧面，更能反映出资本家脑力劳动价值大小。据1982年的《科学》杂志报道：“10年前，福特汽车公司盖了一家工厂，计划每年生产50万吨铸铁发动机缸体。根据大规模生产就意味着低成本的原则，该厂建得高达四层，面积大得足可容纳下72个足球场。结果证明，这家原来设计来制造V型八缸发动机的工厂实在太大了，也太专门化了。当轻型发动机的新式设计继石油危机而出现时，福特公司发现，要想重新改装这样一个大厂，费用之大实在是力所难及的。于是它只好关闭了这家工厂。”这一实例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信息不灵，造成了

建厂的盲目性；二是当意识到该厂必须转产时，已无应变能力。

假定一家生产小轿车的产业资本家，年生产能力为10万辆，每辆轿车的售价为1万美元，年产值为10亿美元，倘若该资本家对市场信息掌握的准确，认定小轿车在国际市场已基于饱和，而客货两用车在大部分生产力处于中下等的国家却供不应求，所以该资本家决定转产。转产后，一是汽车生产线不需要大的更新和投资，可以保证生产的连续性；二是客货两用车无论从制造工艺要求，还是技术要求方面都不及小轿车高；三是客货两用车的材料成本低，用生产一辆小轿车的工时就可生产8辆客货两用车。所以一转产，年产能力为30万辆，每辆按5000美元出售，年产值为15亿美元。事实证明，在转产前后，工厂人数、工人工资基本稳定时，资本家的应变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剩余价值的多少。所以说，作为一名出色的企业家除必须具备综合管理能力外，还必须胸有全局，特别是在竞争、信息时代，每个环节都不能疏忽。日本之所以能成功地在世界上垄断小汽车市场，原因就在于此。马克思曾指出，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可见，脑力劳动在生产力的构成中不仅有价值，而且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从产品生产阶段看，工人付出了微观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资本家付出了宏观的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可见，在产品价值中就凝聚着工人与资本家共同的劳动。

三、结论

在全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劳动是绝对相依、相对独立的劳动；工人是以体力劳动为主，资本家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脑力

劳动与体力劳动是劳动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尽管形式不同，时间不同，程度不同，场所不同，但是，它们都参与价值从而剩余价值的创造。尤其在当今新技术革命面临竞争与挑战的时代，脑力劳动对生产力的构成和生产力的发生、发展起着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劳动力的价值是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价值。这一点不能只对工人而言，也应包括资本家。因此，剩余价值是由工人与资本家共同创造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资本家并不是剥削了全部剩余价值，而只是无偿地占有了工人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

有人说，资本家的管理职能与其剥削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列宁也说过：“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列宁选集》第3卷第395页）我们认为，管理职能与剥削活动二者有区别，前者是提高生产效益的过程，后者为掠夺剩余价值的过程，但二者又有联系，资本家为了掠夺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加强生产管理，而加强生产管理的过程就是发展生产的过程，只有加强管理，高度地发展生产，才能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尽管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但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

总之，正确地认识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不仅有理论认识上的意义，而且，对于当前实践中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也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单位：山西省供销社晋中干校
晋中地委秘书处第一科
晋中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责任编辑：黄振荣

更正

本期封面要目第4条《一代学人论得失》系制版过程误植，特作删除说明，并向读者致歉。

本刊第四期封面要目第4条《认同与融洽：闻一多的文化观》，其中“融洽”应为“融合”，特此更正。

编者按：根据最新统计资料，我国55个少数民族，约共8000万人口。已成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不含已决定撤销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111个自治县，总人口为1.3亿多，其中少数民族近6000万，地域占全国总面积的63.7%。在这些地区中，大约有50%的少数民族人口，仍然处于初步开发或等待开发状态，部分地区相当贫困落后。因此，关心和重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是刻不容缓之事。这里编发的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的两篇短文，根据其实实践的体会，对如何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提出了一些可行性措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是本刊关于山区经济发展讨论的继续。

走技工贸结合的道路 改变民族自治县面貌

龚洪永

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了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和可能，确定了技工贸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经济工作开创了“起点高，发展快，有后劲”的新局面。198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6%，相当于“六五”时期年递增率3.0%的8.6倍；其中县属工业总产值增长52%，相当于“六五”时期年递增率9.1%的5.7倍。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87年县财政收入也比上年增长30.4%，相当于“六五”时期年递增率16.3%的1.87倍。预计，近年来新增投入2000多万元所办的企业（项目），1988年可全部投产见效，年可新增产值7000多万元，仅此一项，按全县人均分

配，每人可增收400多元。形势的发展使我们更加坚定了治穷致富、彻底改变民族地区贫穷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

乳源瑶族自治县内资源丰富，劳动力价廉，但资金紧缺，技术落后，劳动力素质差。在这种情况下，有过只靠消耗大量资源来发展商品经济的现象，结果经济效益差；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不注意采用先进技术，或只限于运用传统的生产方法。这样，产品质量差，难以参加市场竞争；加上山区信息不灵，产销往往不对路，因而很难有大的发展。民族地区老是落后，要害之一就是这个问题。1986年初，我们在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乳源除发展林、农之外，要走技工贸结合的发展道

略，立足于提高技术水平，立足于创造高档次、高质量的产品，立足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概而言之，就是要使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合理组合、优化，产生最佳的经济效益。

有的同志担心，乳源技术力量薄弱，人才奇缺，资金紧张，难以走技工贸结合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首先，我们通过在本县内部大搞联合协作，把各自优势变为整体优势，从而形成了技工贸产业，发展了生产。如开发大东山稀土矿，通过县政府组织协调，以集资入股形式联合7个单位，由矿产公司出技术和一定的流动资金，由外经、外贸公司等6个单位集资购买设备、建厂房和其他工程设施，结果只用了6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设计能力为年产值700万元、税利400万元的稀土矿场；投产仅半年时间，生产混合稀土矿20多吨，产值120多万元，等于全部工程的投资。

我们还打破过去那种“生产部门管生产，供销部门管收购，外贸部门管出口”的条块分割、工贸分割的弊端，采用利润分成、产品分成、产品补偿等形式，处理好技、工、贸各方的利益关系，联合兴办企业。由于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效益甚佳。1987年已投产的8家企业，创产值992万元，实现利润150万元，创汇135万美元。其中民贸、外贸等3家共同投资125万元兴办的矿产品综合选炼厂，投资仅6个月，就实现利润60万元。

当然，乳源本身的财力、技术、基础设施等毕竟是有限的，要想有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发展是不容易的。对此，我们

采取了开放引进的办法，通过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和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先后与中央、本省、本市以及外省市和港澳地区27家企业、公司、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建立了经济技术协作关系，共引进资金1400多万元，引进技术32项，引进人才近百人，从而发展提高了技工贸产业，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一是加速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由于我们积极引进资金、技术、人员，并且沟通了购销渠道，在短期内就形成了一定资源开发能力，两年来先后开发了稀土、锑、锡、硅铁、金属硅等27种产品，资源利用率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如我们通过与冶金部的一个稀土研究院联合办的稀土材料厂，使原来单纯出卖混合稀土氧化物变为分离17种元素出口，而且可生产稀土金属和磁性材料等，资源的利用效益提高了21倍，年产值可达5000多万元，利润可达1000多万元。

二是使工业的发展建立在较高的技术起点上。我们从省有关部门的两个公司、一个实验室，引进湿法冶炼新技术、新工艺，办起了一间年产800吨锑锭、产值1000万元的锑冶炼厂，产品的档次和质量都达到了部颁标准，产品纯度为99.985%的I号锑锭达80%，比火法冶炼提高20—30%，1987年底，该厂又从西南一所大学引进新技术，直接生产超细锑铂粉，使生产技术达到国内同行业中较先进的水平，经济效益提高了1/3。

三是开发了一批名、优、特、新产品。我们从广州的一间食品研究所引进技术，生产出来的猕猴桃软糖获得省优质产品奖，生产的矿泉饮料、金银花软糖获得市

优质产品奖。其它如高岭土填充料、锡锭、单一氧化物、稀土金属等产品都填补了市内空白。

四是改造了一批老企业。县水泥厂于1971年建厂，设计能力为3.2万吨，由于企业管理不善，产量长期达不到设计能力，质量也不稳定，1986年初，得到韶关水泥厂的技术指导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帮助后，原生产能力扩大到6万吨，质量稳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87年实现产值226万元，税利120万元，均比上年增长57%，还荣获省1987年二级标准计量单位称号。县农机厂从广州的一间设计院引进技术，增设了一个耐磨铸铁球生产车间，年产值相当于原厂的5倍。此外，县造纸厂通过引进技术人员，救活了一个“死火”厂；县服装厂引进人才后，产值、产量、利润得到

了成倍增长，其中设计的民族服装还被评为国家民族服装银质奖。

五是沟通了流通渠道，许多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我们与省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联营生产的I、II号梯锭，与市外贸公司挂钩生产的“公园凳”，以及稀土、硅铁等产品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港澳等国家和地区。

一个经济落后的自治县，如何走好技工贸结合的路子，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的过程，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总结，也希望所有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志，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指导。

作者单位：中共乳源瑶族自治县委
责任编辑：范英

扬长补短抓重点

李贤锋

乳源瑶族自治县于1963年建立至今，已经25年了。她的经济建设，总的是向前

发展的。但在新的形势下与先进县相比，差距很大，主要是步子不快，发展缓慢。要

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做许多切实的工作。

一、把战略眼光放在矿产、森林和水电三个基本点上

因地制宜，把振兴乳源经济的战略眼光放在矿产、森林、水电这三个基本点上，是其中重要的环节。

首先，乳源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查明有锑、锡、稀土等30多种矿藏。但分布相对分散，国家很难大量投资与开发，这就给地方开办小型矿山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从目前的经济信息来看，无论是锑、锡还是稀土，国内外市场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前已建成的和正在建设中的矿产开发、冶炼企业，成为我们的希望所在。同时，乳源的矿产业不应停留在出口资源的水平上，而应向产品的深加工发展，从半成品向成品过渡，从粗加工向精加工过渡，才能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使这些矿产企业成为乳源的创汇基地，并将成为支撑本县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柱，冲破单一的经济形式和封闭的经济循环局面。

其次，森林资源丰富是乳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一大优势。它曾经为乳源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但值得高度重视的是，由于多年来“重开发、轻种植”，致使森林覆盖面积大幅度下降。这不但有可能使木材加工业成为无源之水，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导致生态平衡的严重失控，致使环境恶化，殃及农业，所以必须尽早恢复森林的再生功能。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森林业也不能停留在出口资源方面，同样存在着一个产品深加工问题。就是说，要在森林资源的系列产品开发问题上搞活。

再次，小水电同样是乳源的一大优势。目前，本县的小水电初具规模，已建

成水电站42座，年发电量11159万度。现有的要巩固，有条件的还要开办。小水电从眼前或长远看都具有很大的价值。眼前，它可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地方的财政经济。从长远看，它将为乳源的经济起飞准备能源的基础。本县的水电业是依靠着森林业而生存着的。因此，对恢复森林再生功能重要性的认识，直接关系到水电业的发展问题。

二、多渠道筹集资金

要建立起一批骨干企业，投资大，周期长，技术要求高，回收成本慢，这同乳源财政实力的十分薄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广东四小虎”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他们宁可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搞来料加工，搞轻工业，搞短线产品，从而快速地完成了投资的第一个循环，成了建立起骨干企业和支撑地方财政的有力支柱，即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乳源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搞些短线产品和小型企业的。这些企业投资小，技术要求低，上马快，收回资金周期短，为骨干企业的兴建提供雄厚的资金，是可以办到的。这是发展乳源经济的第一条资金筹集渠道。

资金的筹集，除了第一条渠道以外，我们还必须充分利用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充分争取国家对本县地方财政的支持。不过，这不是根本办法，但作为资金筹集的第二条渠道是可行的。

此外，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在实际工作中执行“能外则外，能内则内；着眼于外，着手于内”。当然，能积极争取到外资更好。但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在这方面我们是不能与沿海地区

相比的。所以，这个“对外”是指乳源以外的内陆广大地区。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承包已逐步深入。韶关是广东的重工业基地，国家已建立不少大、中型的企业。这些企业有着雄厚的资金，有着强大的工程技术队伍。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和明天，这些企业正在寻求贸易的合作伙伴，正在注视着投资的目标，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开拓领域。而且，当我们到了需要建立起自己的骨干企业和发展到矿产深加工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寻找这些伙伴来合作了。同时，还应看到，珠江三角洲一带，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劳动力价格日趋上升，企业的投资风险日益加剧，因而转向山区，利用那里廉价的劳动力，以减少投资风险的趋向，已清晰可见。乳源也应抓住这个机遇，创造条件，争取把这种“外资”引进来。这是筹集资金的第三条渠道。

三、放手借助知识、科技和人才

广东“四小虎”之所以上得快，极其重要的一条就是特别识才、爱才、用才、引才、育才。那里借助于“星期六工程师”活动和许多外来科技人员的大力支持，使一个个技术难题得到解决；一个个新产品设计方案付诸实施；一间间“死火”企业得以复活。如顺德县18家最大的乡镇企业，有

11家是靠广州的技术人才发家的。乳源的经济建设也应以精明的眼光，灵活的办法，争取同广州、韶关等地的科技人员，达成一笔笔共同富裕的“交易”，逐步做到产品开发找名牌，积极发展拳头产品；骨干企业找帮手，努力发展集团式企业群体；新上项目找靠山，积极发展技术合作与补偿贸易；技术开发找专家，大力发展科技生产联合体。在不断地搞好投资环境硬件的同时，一要有计划地将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中学，要办自己的工商业专科学校；二要大规模地开展企业职工和农村知识青年的培训，培养大批发展商品经济的农村知识青年；三要大批引进各类适用专业人才，甚至舍弃一些新建项目，也要舍得花钱引进人才。

乳源瑶族自治县既是贫穷山区，又是石炭岩地区，她的经济底子薄，文化科技落后，决定了我们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任何“急功近利”，“速战速决”的作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扬长补短抓重点，一步一个脚印，就一定能够实现乳源经济的起飞，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乳源。

作者单位：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责任编辑：范英



山区劣势中的优势

——乐昌县北乡镇外向型企业发展的启示

欧世有

山区的乡镇企业基础差，起步晚，要搞外向型经济，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有很多条件都不如沿海或平原地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山区也有其劣势中的优势。

一是资源丰富，只要对口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某些乡镇企业便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并可在国际市场上发挥其重要的作用。事物的存在总是相对的。优势和劣势也是相对的。一般来说，山区的资源要比沿海、平原地区丰富，这就是山区的优势所在。问题在于要对这些优势作出科学的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然后针对这些潜在资源开发的可行性，做出切合实际的规划，并逐步地付诸行动。这就需要对口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要引进这些东西，决非易事。但只要有可行的办法，千方百计地去争取，去创造一些条件，“三引”的问题也是可以逐步做好的。当然，有了丰富的潜在的资源，如果不在“三引”上做文章，山区乡镇企业的优势还是无法发挥出来的。因此，要正确处理好潜在的资源优势与做好“三引”工作的关系，这是山区乡镇外向型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是有众多廉价的劳动力，可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来料加工，以替代沿海或平原地区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的空档，从而促进山区某些乡镇企业朝外向型方面发展，在国际市场上扮演一个角色。目前日本、台湾、南朝鲜货币升值，香港又受制于劳动力不足和地皮昂贵等，地处沿海的广东，其对外的吸引力已有明显的增强，因而在外经外贸方面，我省的发展情况是好的。总的说来，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转移出来的产业、企业或技术，一般经过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三级转移。而在发展中国家的范围内，我国又是个重要地区，在这个地区中，广东又得天独厚。就目前而论，那些资金充裕而求劳力价廉的外商、港商，他们不仅注意广东沿海、平原地区，也开始把眼光投向广东的山区，尤其是资源丰富、交通等较为方便的粤北山区的一些县份，便自然地成了他们角逐的宝地之一。这个总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我们山区乡镇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但要抓住这个关键，则是需要花大力气的。因此，在这方面，要处理好许多关系，这是山区乡镇发展外向型企业又一重

要条件。

我们北乡镇1987年的乡镇企业总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0%。这说明，眼下我镇的乡镇企业，基础确实很差，同珠江三角洲比，同一些先进的山区比，都大大地落后。要在这样落后的地区搞外向型经济，搞外向型企业，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镇有山林面积11万亩，成材林4.5万亩，中幼林3万亩。其中成材林多以松杂树为主，是制作家私的好材料。目前世界市场上对家私的新的追求，大有“返朴归真”的趋势，木具家私逐步紧俏。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北乡镇便抓住了关键——想方设法搞起了家私厂，并经县级政府批准为对外加工企业。该厂按设计要求，年加工木材量达2000立方米，创产值达150万元以上。产品主要出口到法国，1988年下半年便可投产。此外，北乡镇四周多山，中间有块小平地，原是种水稻的好地方。但从近年来却划出500多亩种“黑米”，因而建立起“黑米生产基地”。这是有原因的。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落实，许多人已从食饱——食好——食疗方面发展。而“黑米”不仅饭味清香，且有壮阳、补肾、明目、活血、藜胃、养肝、乌发、养颜、延年、益寿等健身疗效，千百年来为我国农民不断种植，并作为各级统治者敬奉皇上的“贡品”，因此又称“贡米”。但过去的“黑米”，都是黑糯，其健身疗效有一定的局限性。为此，广东省农科院经过多年的试验，终于把黑糯培育成黑占。我们便决计引入这个新品种，并取得亩产270公斤的产量。同时，还办起了加工黑米的酒厂和饮料厂，当年为酒厂提供了2700多担黑米原料，使产值增加了100

万元。目前，我们正争取扩大黑米生产基地，准备同广州某酒厂联合办黑米加工系列产品，在提高加工产品的质量和包装之后，便要瞄准国际市场，向外销售其独具特色的产品。再者，经过前三年的努力，北乡镇在制衣的来料加工方面，也初见成效。现在已有6条生产线，158人就业，年加工各种服装3万打，取得加工费45万元，税收2万多元。今后拟扩大到10条生产线，吸收300个就业人员，年加工数为5万打，创值70万元以上。

山区外向型的乡镇企业要搞得起来，关键的问题是：

一要发挥本地的资源优势，选取最宜开发的项目下手。任何山区的乡镇，大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首先要认识它，了解它，要把它放在商品经济的范围来考虑它的出路；其次是这种优势资源究竟适合搞内向型经济还是外向型经济，要把它放在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的比较中来决定它的去向；再就是，这种优势资源能否持续地保持优势，需要做许多人为的工作。这三个方面都把握住了，就可以说是发挥了本地资源的优势。北乡镇在资源方面，仅矿产就有20多种，其中石灰石，白云石，硫铁矿、花岗岩的贮藏量不少。再就是木材贮藏量也很丰富。从商品经济角度看，山区对乡镇企业的投资不多，更不能分得太散，也即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资源都加以开发，这就需要选取最宜开发的项目，使有限的资金集中到这些项目上来。在北乡镇，最宜开发的项目如石灰石和木材等，其市场走向又很不一样。把石灰石搞成石灰、水泥，主要是国内市场所需。而木材加工除国内市场外，它还有可能打进

国际市场。看准了这一点，我们则在确保石灰、水泥生产的基础上，把木材加工业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并与县有关部门挂钩，终于取得了50多万元的投资，再加上自筹的20多万元，共为70多万元，建起了一定规模的家私厂，专门为东欧，主要是法国等生产木制家具。从而打开了闯荡国际市场的大门。但像木材一类的自然资源，如果只管砍伐加工而不加强人工方面的育林造林，这种眼前的资源优势是会渐次衰竭的。所以，要真正发挥好本地资源的优势，使所选取的最宜开发的外向型项目能够保持比较长期的兴旺势头，就必须对后续资源作适量的投资繁殖。

二要千方百计地吸引投资，吸引技术和人才上山下乡。没有资金、技术和人才，要办好山区乡镇的外向型企业就是一句空话。就目前较长一个时期看，山区还不是外资投入的热点。在不是热点的情况下争取外资的投入，困难很多，也很难办。北乡镇的做法是，一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就下决心追踪，碰它几十次，几百次，就有一些希望。当然，这叫做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有一条，我们某些资源适宜开发加工的优势，可以引起国内一些联营者的兴趣。前述兴办木材加工业的投资，就是这样引来的。眼下黑米酒系列产品的

开发，也主要是寻求广州等地联营者的合作资金。至于吸引技术和人才方面，对山区的乡镇企业来说也是个难题。北乡镇籍的学者、专家、教授，有30多人分布在国内，通过他们可以引进一些技术，是一条路子，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另一条路子是靠镇委自身的各种关系，引进一些急需的技术和人才。如黑优占品种的引进和大面积试种的成功，及黑米酒的生产，就是靠了镇委中当年在华南农学院就读时的老师的技术指导，而打开了初步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开发优势资源，我们镇最近还制定了一系列引进资金、人才和技术的优惠政策。

总而言之，山区外向型的乡镇企业要搞得起来，既要发挥本地的资源优势，选取最宜开发的项目下手，又要千方百计地吸引投资，吸引技术和人才，两者缺一不可。此外希望省级有关部门，要为山区乡镇外向型企业的起步给予更多一点的关注，创造更多一点的条件，这样，全省40多个山区县中多数乡镇的外向型企业，就有可能上得更快更好一些。

作者单位：乐昌县北乡镇委
责任编辑：范英





波兰经济学家谈社会主义国家改革 进程中的“风险”与对策

本刊记者 张硕城

今年6月下旬，以波兰议会专家组组长、波兰经济协会副主席、华沙大学经济学系一级教授、高级博士亚历山大·乌卡舍维兹（A·LUKASZEWICZ）为团长的波兰高级经济专家访华团一行4人，访问广东，同广东经济学会、中山大学经济系的有关负责人和学者进行了交流座谈。座谈中，热门话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本刊记者就物价、工资、政治民主化等改革中“风险度”较大、敏感性较强的问题，采访了波兰学者。由于采访是采取集体讨论方式，尊重他们的愿望，这篇采访录不逐一列出具体答问人，统称波兰学者，并略有删节。

记者：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的时代课题。中国与波兰尽管国情差异很大，但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均出现或可能出现一些相似的、为大家所共同关注的曲折，尤其是物价、工资、社会政治民主等问题，一些舆论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的“难关”，请你们就此谈谈见解。

波兰学者：这些问题确实很重要。在社会主义的改革过程中，它们既不可回避，又十分棘手。就波兰的情况来说，1982年以来，政府确认了物价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因为在僵化的价格体系下，整个经济是无法灵活地依市场规律运转的。当然，我们的改革不仅仅是物价一项，而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运作方式和运作机制。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偏差，认为它只能有一种生产方式或一种单一的经济成份。这一认识现在改变了。我们现在承认并允许甚至鼓励发展一些个体、私人的经济成份，也引进外资等等。但这些还不是根本。改革的根本的目标是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经

经济发展的活力，增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以赶上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主义，按我们的理解，它的经济发展起点低于西方资本主义，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起码在发展的速度上，在效益上不应长期低于资本主义，这就需要改革。社会主义是个不断变革的过程，改革是加速我们向好的方向变革的动力。

改革，当然有很大难度，也会有“风险”，特别是您所提到的物价、工资问题。经济市场化的客观趋势，要求价格结构不断调整，这同生产结构需要不断调整是一个道理。这些调整过程又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一天之内就可以改过来的，其间必然会有波动和困难，可以说，每一步的迈出都是艰难的，付出的代价一定是很大的。我们觉得，如果说生产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是大量资金的投入，那么，价格改革这个涉及全国人民的问题所需要的恐怕更多的是全社会的理解和配合。资金不足，可以借，现在波兰外债压力也很大，这是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沉重包袱；但价格改革引来的社会上的各种压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比外债压力更重，更难处理。直率地说，80年代初起至今，波兰的政局时起时伏，一直不太平静，政治、经济的不稳定状态持续了较长一段时期，今年5月，又发生了工人的罢工，这都同物价、工资问题上人们的适应力不足、认识不一致有关系，当然，还有其它政治因素。但我们认为，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上，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对策，建立了一些适应新经济发展的法规、制度，花费了相当大的力气，人们的适应性比起前些年是有所加强了。

记者：请问波兰党和政府在物价等问题上采取过哪些对策？

波兰学者：首先，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很注意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十分重要的。改革政策的出台，一定要由党和政府通盘研究，加强统一的指导。其次，要努力争取同盟者的支持和广大人民的谅解。波兰的情况是，知识分子是党和政府推行改革政策的一支重要的同盟力量；此外，部分企业家、青年人也支持改革；还有许多个体农民也对改革同情、好感，起码不妨碍。实质上这是由改革中利益分配状况所决定的。在波兰，虽然一方面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但另一方面，劳动机会和劳动分配上也相应提供了一些新的条件，有知识、有技术、劳动积极的人，收入一般较高，他们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较多。相反，一些文化低、技术能力低、不勤劳的工人，包括一些没有机会的人，得益少。不满和闹事的主要是这类群众，还有一些是什么理想、信仰、责任感都没有的青年。造成一度社会危机的责任当然主要还在于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如教会和团结工会中的少数人，他们是政治反对派，希望社会主义垮台。经过党和政府的反复做工作，这些政治反对派的势力影响也已缩小了很多，他们在分化，波兰统一工人党对他们也采取缓和、争取的态度，以最大地减少改革对立面。再次，改革政治体制，加强民主将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根本的保障条件。经济改革所牵动的各阶层利益矛盾冲突具有必然性，但实践表明，民主法制加强了，解决各种矛盾也就容易一些。我们不仅通过议会，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的沟通，还通过学校、企业中的自治组织，通过做工会和教会的工作，号召大家共同关心、参与国家的改革，这样，矛盾就缓和一些。本来，推进民

主化就是社会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奋斗目标之一。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的施舍，而是人民自觉参政，当家作主。在波兰，有一些省份民主搞得好些，各项工作的改革就顺利一些，反之，有些省份的麻烦就多些。第四，应该重视加强对改革的研究，充分发挥高级知识分子在决策中的作用。不是夸口，如果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不经常与专家对话、商量，他们是很难进行决策的。我们波兰经济学会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力量，主动对改革施加影响。而国家议会政府中，也有许多重要职位是由高级经济专家担任的，如我们的总理原来就是波兰经济协会的副主席，还有一位副总理现在仍担任经济协会的副主席，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也有一位是波兰大学经济学教授。我们在座的也都分别参与了各级的决策层的工作。我们有一种说法，病人越多，越需要更多的好医生，波兰经济很长一段时间是处于病态，现在仍未完全摆脱，需要经济学“医生”来帮忙治疗。第五，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好社会公平的问题。各级政府要关心全体工人的利益，是无疑义的。实行按劳分配会暂时打破平衡，物价、工资等改革也会带来暂时的一些不公平。但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认为社会是永远绝对公平的。由于对公平的看法不同，所以难免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想借口“公平”而消除矛盾，只能牺牲社会的效率。从长远看，根本途径是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来适当弥补一部分人如老弱病残者的利益，这样或许会将矛盾控制在尽量小的范围内。但要想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完全不产生利益冲突，是一种梦想。波兰政府为度过危机，付出了很大决心和代价。但还存在很多问题。只举一个例子，波兰人多数信教，党和教会之间的矛盾就很难短期内处理妥善。虽然我们有信心，但还不能说问题已解决得很好了。

记者：我们两国的改革遇到的一些问题既相似，又不全似。即以所谓“不公平”现象来说，就大不一样。这次你们在中国走了好几个城市，请谈谈你们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观感好吗？

波兰学者：波兰经济目前还不太平衡，还未转入稳定高速发展，原因你们也许知道。相比之下，中国的改革应该说比波兰要顺利一些，成绩也很明显。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近几年所取得的改革成就，很受我们的关注，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例如，物价改革你们也开始了，上涨的幅度也不算小，但社会经济和政治比我们稳定。你们的搞对外开放，办起了经济特区，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过去也搞对外开放，但还可以更开放一些，我们希望也能办个经济特区，搞合资企业，不仅同资本主义合资，也可以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合资。所以，明天我们将专程去深圳考察。我们真诚地感到互相学习的重要，这样，我们或许会在改革的“风险”之中少犯一点错误。借此，我们向中国同志们表示感谢。

记者：谢谢。

1988年6月28日

我省乡镇外向型企业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欧阳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乡镇外向型企业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到1987年止,我省已有“三来一补”和合资合作生产及外贸出口创汇的企业14422个,从业人员107万人,占全省乡镇企业人员的17.5%。1987年,全省乡镇企业总共创汇10亿美元,占全国乡镇企业创汇总额的20%,占全省出口创汇总额的18%。

从总的趋势看,我省乡镇外向型企业的发展是鼓舞人心的。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我省乡镇外向型企业面临着许多困难,制约其发展的因素还不少。因此,分析这些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当的对策,乃是本文的宗旨。

当前制约着乡镇外向型企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现行外汇管理体制的制约。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弊端较多,不利于乡镇外向型企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汇留成少,二是结汇率低,三

是变通余地小。在外汇留成方面,国家拿大头,企业得小头,而企业还要包汇差,换汇成本高,导致出口实际结汇率低。出口越多,亏得越多,影响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至于结汇率低,还与我国的汇价制度不合理有关。我国从1981年1月开始,调整了人民币的汇价实行了内部结算价制度。当时人民币公开牌价是1美元等于1.5元人民币,而内部结算价则定为1美元等于2.8元人民币。1985年1月1日,我国人民币的对外公开牌价又进一步调整为1美元兑2.8元人民币,同内部结算价持平,从而事实上取消了内部结算价。而后,再经过连续调整,至1986年7月5日,人民币汇价再次滑动,调整为1美元兑3.69元人民币。直到现在,人民币汇价基本上维持在这一水平上。然而,目前出口产品的平均换汇成本已大大超过这一水平。换汇成本超过人民币汇价,就必然产生出口“高亏”的现象。长此以往,既会加

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又会打击生产经营企业的积极性。上面说的变通余地小，乃是指外汇留成是一种额度留成，而不是现汇留成，不利于企业之间的外汇调剂。

要消除外汇问题上的制约因素，最根本的就是要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要深化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首先，要改革外汇留成制，保证企业留成比例不低于50%，同时把额度留成改为现汇留成。其次，要改革人民币汇价制度，采取以对外贸易出口换汇成本为中心的单一浮动汇率，并积极创造条件，使人民币逐步变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再次，要放开外汇市场，让企业之间本着互利的原则自由买卖外汇。

第二，国际市场信息方面的制约。中国有句古话，“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发展外向型经济，首先必须了解国际经济的变动趋势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必须随时掌握各国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数量及其价格指数。只有这样，产品才能适销对路，才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目前，我省乡镇企业没有驻外机构，主要是通过一些间接的途径去了解国际市场的行情。诚然，间接了解到的信息有一定的价值，但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一是信息的时间滞后性。从间接渠道获取信息，一般要经过较多的环节，信息传递速度慢。我们知道，信息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信息在时间上的滞后，就失去了其作为决策依据的作用。二是信息的虚假性。从间接渠道获得的信息，常常有部分失真。信息的虚假性，必然会导致决策的失误。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不少。

为了消除信息不灵的制约因素，应让乡镇企业自派驻港澳或驻外业务人员，并

优先办理企业人员经常往返港澳(或国外)证件与港澳、广东直通汽车牌证。乡镇企业有自己的驻外人员，对国际市场信息反应的灵敏度就可以大大地提高，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盲目性。当然，要让每个外向型企业都自派驻外人员，这是不现实的，是难以办到的。可以考虑让那些创汇水平高的企业首先涉足海外。比如说，可让那些年出口产品创汇100万美元以上的乡镇企业或年创汇5000万美元以上的镇自派驻外人员。总而言之，要把乡镇企业推上国际舞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就必须给它们创造获取国际市场信息的便利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乡镇外向型企业就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

第三，货币资金紧缺的制约。目前，我省各地乡镇企业要加快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普遍感到资金不足，主要是人民币配套资金不足。如顺德县某镇，现在建、扩建项目尚缺1亿元人民币配套资金。又如东莞市某镇，今年规划发展的外向型项目总投资为11075万元，现尚缺人民币配套资金9075万元。其他地方的乡镇企业也有类似的情况。资金短缺，是当前乡镇外向型企业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的制约因素。

我省乡镇企业到1990年要达到创汇25亿美元。如果按照投入1元人民币创汇0.7美元计，要达到上述目标，应总投资21亿元人民币。由于国家紧缩信贷，资金缺口很大。怎么办？可考虑采取下列对策：

(1) 提高乡镇企业自身的积累。但目前乡镇企业税收和各种摊派款项负担很重，提高积累恐非易事。因此，需要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制止各种名目的非法摊派，对出口企业税后利润留给企业的必须保证

在60%以上，并要保证主要用于发展生产。(2)地方财政要给予适当支持。银行、信用社要根据择优扶持的原则，对那些投资少、见效快，换汇成本低的出口项目给予支持。(3)乡镇企业本身积极发展社会集资。可以以就业为条件，采取“以资带劳”或“以劳带资”的形式，向农民集资；可以发动职工、群众入股聚集游资；可以通过发展民间信贷组织来筹集资金；可以开展横向联营，吸引外省、外单位的资金；可以预收货款或进行国内的“补偿贸易”；可以向社会发行股票、债券；可以引进利用外资；可以到外省、外地拆借资金；可以利用国家招标和“拨改贷”办法，创造条件，争取中标，获得资金。鉴于目前国家财政困难和银行信贷紧缩，发展社会集资是解决乡镇企业资金短缺问题的主要途径。

第四，原材料、能源供应不足的制约。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缺乏保障，是目前乡镇企业生产出口产品的又一个严重的制约因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物资体制改革的深入，由市场供应的能源和原材料将逐步增加，情况会有所好转。但在目前生产资料双轨制的条件下，为了保证出口商品的质量和交货期，生产出口产品所需的统配物资，希望能得到各级地方政府和物资部门的支持。同时，“贸工农”联合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企业要逐步建立和大力发展自己的原料基地。

第五，企业素质不高的制约。我省乡镇外向型企业素质不高，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①管理制度不健全；②管理人员素

质差；③职工素质差；④企业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企业素质低下，是乡镇企业的薄弱环节，也是乡镇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要障碍。因此，要下功夫抓好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素质，以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当前，首先应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基础工作。外向型企业要加强标准和计量工作，完善各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搞好质量目标管理，加强财务管理，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健全统计制度。二是加强管理人员和职工的培训。建议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应有计划地对“贸工农”出口基地的厂长、经理实行培训制，分期分批地进行外贸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培训。企业本身要抓好岗位培训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明确规定不经过培训的职工不准上岗，不合格的要重新培训，并把实际操作水平作为职工升级和劳动报酬的主要依据。三是要加快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积极引进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管理方法，彻底改造企业的技术设备落后的面貌，普遍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

制约我省乡镇外向型企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才能消除这些制约因素。一旦这些制约因素得以克服，我省乡镇外向型企业将会有一个大发展。乡镇外向型企业的大发展，对于实现我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目标，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黄振荣

理论 梁启超的「新民」 论人的近代化与

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在器物、政治近代化失败之后，人的近代化则成了先进知识分子探讨的新课题。在这一条件下产生的梁启超的“新民”理论，通过塑造一个具有近代人意识、特征的“新民”形象来推动人的近代化，因而对青年一代从传统中蜕变出来，向近代人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梁启超的“新民”理论，时人或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分析，认为它是典型的改良主义思想；或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分析，认为它对民族的弱点作了尖锐的揭露。这些论述自有其道理。本文试图将它置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序列中考察，从人的近代化理论的角度去作一分析。

一、从近代化的进程论《新民说》产生的必然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的国门，古老的封建帝国开始了步履艰难的近代化历程。

鸦片战争的失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使一部分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很值得学习，于是先是提出“师夷长技”，继而引进西方的科技，创办工厂，制造机器，生产枪炮，开山采矿，兴起了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但这一步并没有解救中国的危局，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它的破产。维新志士从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中国不仅科技不如人，政治制度更不如人，而且科技的不能顺利发展，也正是制度障碍所致。因而一些人提倡限制君权，开设议院，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力图使中国的政治方面走上近代化的轨道，这是在近代化历程中迈出的第二步。但戊戌变法也很快失败了，政治体制的近代化同样受到巨大的阻碍。中国近代化行程的累遭挫折，很自然地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更深刻的反思、求索。

美人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在他的《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提出：“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而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是现代化制度、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

的先决条件。^①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正是如此，它在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近代化历程后，通过对比中西民族及历史，终于认识到人的近代化在整个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这样，人的近代化问题就自然地成了先进知识分子们探讨的新课题。

在这一探讨中，严复可算是第一人，他在戊戌变法之前就提出了“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主张。但对这一课题进行较全面、系统阐述的则是梁启超。他在检讨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时深切地感到，“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既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务，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绣于粪墙，饕龙出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焉”。^②后来他在《新民说》中更明确地指出：“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观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这表明，梁启超已充分认识到国民的落后心理已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要推行新法，加速近代化的进程，必须改造国民心理，重铸“新民”。因而他疾呼铸造“新民”应成为当今中国之第一急务，并以“新民”为号创办《新民丛报》，大张旗鼓地宣扬新民之道，形成了他的系统的新民理论。

二、从近代人的角度论“新民”形象

梁启超的新民理论主要是通过塑造一个具有近代人的意识、特征的“新民”形象来推动人的近代化。他所塑造的近代“新民”形象，如从近代人的角度分析，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1. 自由与平等——近代人的核心特征

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对人性摧残的历史，在这个社会中，有的只是对人性的蔑视、践踏，丝毫谈不上人的自由与平等权利、人的价值与尊严。梁启超揭露了专制制度对人性摧残的罪恶，疾呼要拯救中国，必须给人民以自由、平等的权利。这在《新民说》中的许多章节里均有充分的阐述。

在《论权利思想》一节中，梁启超认为权利思想是人的品格的关键，没有权利思想，人就会麻木不仁，对任何事情都熟视无睹。中国人正缺乏这种权利思想。究其原因，则是“昔之待其民也，鞭之，撻之，敲之，削之，戮之，辱之，积千数百年霸者之余威以振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弥既夷”，使国民对国事漠不关心，因而“一旦敌国之饕餮集于海疆，寇仇之貔貅迫临于城下而后欲藉人民之力以捍卫是，而纲维是，是何异不胎而求子、蒸沙而求饭。”所以，要拯救国家，必“欲使吾国之权与他国之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若是者，国庶有瘳。”这里所说的国民权利就是国民作为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法律上的平等权利，给了国民这种平等权利——人权，国家就有挽救的希望。这同梁启超在变法期间提倡的以民权策中国的思想是相通的。

梁启超在强调人的平等权利的同时，亦极其强调人的自由。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③可见他已洞察到奴隶性于中国危害之大。而他所说的“自

由”，“正使人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④“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⑤他把“自由”当作人的本性，看作人的资格，这正揭示了近代人的基本特征。在后来发表的《新民说·论自由》中，梁启超对“自由”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把“自由”分为3个方面，即“政治上之自由”，“宗教上之自由”，“生计上之自由。”也就是人在政治、经济、宗教信仰上享有充分自主权，把近代人的“自由”的基本含义表达出来了。他还论述了争取“自由”的途径，指出，要争“自由”，关键要去“心中之奴隶”，具体言之，“一曰勿为古人之奴隶”；“二曰勿为世俗之奴隶”；“三曰勿为境遇之奴隶”；“四曰勿为情欲之奴隶。”

“自由”、“平等”权利，是近代人的核心特征，它是区别于封建人的根本所在。梁启超鲜明地赋予了“新民”以“自由”、“平等”的权利，反映了其新民思想的近代意义。

2. 进取、冒险——近代人鲜明的性格特征

进取、冒险精神是近代人从传统人中蜕变出来的一个极明显的特征，它在推动人类近代化的历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对此，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作了阐述。他在对比中西民族后认识到，欧洲民族之所以优强于中国，原因在于“其富于进取冒险精神，殆为尤要者。”而在中国，“他事或不如人，至于规行矩步，绳尺束缚，正中国人受用最惯，受病最深之处，数千年来，霸者絜之，儒者坊之，人奄奄无生气久矣。”惯于规行矩步、一步一趋的国民是不可能具有进取冒险精神的，要学习西洋民族的进取冒险精神，首先就要反对保守思想，改变那种规行矩步的陋习。梁启超还分析了产生进取冒险精神的原因，认为有4个因素，“一曰生于希望”；“二曰生于热诚”；“三曰生于智慧”；“四曰生于胆力”。

梁启超还从社会风俗的角度追究了中国为何产生不出如克伦威尔、华盛顿那样富于进取冒险精神的伟人。他认为，在中国，一个人稍有作为，稍事进取，便被斥责为“好大喜功”，或被骂为“忘身及亲”；另一方面，儒教“以冒险为轻躁，以任侠为大戒，以柔弱为善人，惟以‘忍’为无上法门。”国民受这种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浸润，结果“鬼脉阴阴，病质阴阴，女性纤纤，暮色沉沉”，毫无朝气，因此难以产生卓绝一世的英豪，即使有一二英雄出现，也会被窒息在这种陈腐的社会习俗中。所以他倡导以“改良社会群俗”为致国之源；提倡冒险、进取、竞争、尚武精神，以广开新的民风，孕育伟人的诞生。这里，梁启超已经认识到改造国民这一棘手的问题，看到中华民族性格特征中的消极面，并企望通过借鉴西洋民族的优点，铸造新的国民性格。

3. 自治能力——近代人政治上的突出特征

自治能力，关心、参与时政，是近代人区别于传统人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梁启超通过研究西洋民族、历史，看到西洋民族的政治能力远远强于中国人，认定这是造成中西强弱差异的又一重要原因。因而中国要强盛，国民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能力。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施行的是愚民政策，人民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意识，不可能去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所以梁启超把解决人民的参政问题看作中国当时最急迫的事件之一，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一人能自治，则一群自然易治，而后地

方能自治，而后国家也能自治，中国便能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

4. “公德”、“私德”——“新民”的伦理道德观

社会的变动，必然导致人们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的变化。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也给中国近代道德的更新与发展带来了新的转机，传统的旧道德已经败落了，适应近代社会的“新道德”正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这样，提倡“新道德”成了梁启超塑造“新民”的另一重要内容。

梁启超的“新道德”是本着“采中西道德”为原则而形成的，它以“私德”、“公德”、“义务”、“合群”、“爱国”等等一系列的伦理范畴为内容。总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以“公德”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梁启超在对比中西伦理后，发觉中国的纲常旧伦理诸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都是个人对个人，讲的是“私”；而西方的新伦理如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则是个人对团体，讲的是“公”，无疑这又是造成中西强弱差异的根源。所以他提倡“公德”。“公德者，诸德之源也，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显而易见，他所说的“公德”，即“利群”，“为公。”为此，他进一步提倡“合群”、“国家思想”，国民要对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要尽义务。这表明梁启超的“新伦理”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其次，强调个人修养即“私德”的重要性。梁启超认为“公德”的基础是“私德”，“公德者私德之推也。”而当时中国之民德为最低下之第六级，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究其原因，在政治上因专制政体之陶铸，“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经济上生计憔悴的逼迫，再加上战乱频仍，时局动荡不安。所以，他认为“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者，必须以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即要彻底改造国民心性，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从启蒙的角度看，这是有见地的，说明他试图从人的思想深层结构来改造国民，拯救中国。

梁启超以20节10余万字的篇幅，详细地论述了他的“新民”构想。作为开拓性的工作，它免不了粗浅、生硬，甚至纯然错误。例如他所说的“自由”是通过服从来体现，并没有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权利；关于自治问题，提不出一条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培养国民自治能力的途径，只是泛泛地谈论国民的自身修养；至于他后来提倡中国的旧道德，则显然是错误的。但从总体上看，梁启超用“自由、平等、进取、冒险、尚武、竞争、自治、公德”等等这些富于近代意义的概念，确乎给我们勾勒出一个全新的生气勃勃的近代人的“新民”形象，这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是从来未有过的。

三、《新民说》对近代人的影响

梁启超的《新民说》通过塑造一个近代人的“新民”形象，倡导新民理论，在20世纪初的中国，对促进青年一代从传统中蜕变出来，向近代人转变，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新政基本废除，唯独废科举一项仍然保留下来。因而新式学堂纷纷创办，学生人数也激剧增加，全国公私立小学生在1902年约895人，1903年达22866

人，至1904年增到85213人。^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规模群体聚结的酝酿应溯源于此。这些人或受传统思想的濡染较少，思想束缚也少；或是本已受过维新思想洗礼，思想比较解放，因而容易接受新思想。所以，梁启超以他通俗的文字，常带感情的笔调，一方面揭露了中华民族性格中的种种缺点，象一副清醒剂，促使这一代学人从传统的迷雾中觉醒过来；另一方面它描绘了一个“自由、平等、进取、冒险、自治”的全新的近代人格形象，引导人们去追求新的生活、新的理想人格，并从信古、盲从、务虚的传统人格形象中转向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并勇于思考、创造，进而反叛传统。

关于梁氏这一思想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讲的很详细、真切，颇具代表性：“这一年之中（即1904年——作者注），我们都经历了思想上一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二哥给我的一大篮子的‘新书’，其中很多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这时代是梁先生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胡适还称《新民说》诸篇是“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胡适作为新文化的开拓者，是一个对现代文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早期受梁启超如此深远的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民理论。同样，青年毛泽东也深受梁氏的影响，不但爱读《新民丛报》，后来还师法梁氏新民理论组织“新民学会。”可见，梁氏这一思想的影响是普遍的，正如郭沫若所云：“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的洗礼。”^⑦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深刻变化，有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代新人的崛起，并对以后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转向革命，并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制度、建立近代国家体制——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尔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或接受了更全面、深刻、广泛的启蒙洗礼，从而与封建传统进行了更彻底的决裂；或成为这次启蒙运动的巨匠，为推动国民从传统中蜕变出来起了重要的向导作用。这些都表明了《新民说》在促进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地位。

①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中译本，第3、8页。

② 《中国积弱溯源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

③④⑤ 《梁启超选集·致康有为书》，李华兴编。

⑥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383页。

⑦ 郭沫若《少年时代》。

其他引文均见梁启超《新民说》各有关章节。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对康有为早期思想的影响

何志慧

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的条件下已注入了新的内容，它成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桥梁，是近代思想家、政治家从古代迈向近代的思想动因。康有为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转向“西学”寻求“经世”的途径，最后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

人们在探讨鸦片战争以来的各种社会思潮时，对源于西方的新思潮给予了足够的注意，而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思潮则缺乏应有的重视。其实，经世致用思潮在中国从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的门槛中，在各种新旧思想观念的急剧变换更替中，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在许多思想家、政治家身上留下过鲜明的印记，是他们迈出从古代到近代这一沉重步履的重要思想动因。比如，康有为就是一位颇有代表性的人物。

康有为出身于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名门望族，从小就接受了正统的封建教育。但他后来却成了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根本原因，无疑是时代的影响，西学的熏陶。但是，当我们追寻康有为摆脱传统思想重重束缚，转向西学的动因时，就不难发现经世致用思想对他的深远影响。

经世致用思想是儒学悠久的传统。儒学与社会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身已包含了学术文化面向社会、切近社会生活实际这一积极的精神。所以，每当社会面临危机之时，进步的思想家们总是以经世致用为号召，提倡学术要面向现实，强调其服务于现实政治、社会改革的功利要求。兴起于明末清初的考据学派开始时就是以经世致用为旗帜的，他们提倡儒学“以经世为宗”，以考据学为方法，探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实学，以达到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清初诸大学者的经世致用，正是体现了疑经求实，反传统、倡革新的现实主义积极精神。但是，当考据学派从民间上升到正统学术地位时，在清政府大兴文字狱的专制主义高压和笼络政策下，逐渐陷入烦琐考证的歧途，经世致用精神丧失殆尽。与此同时，程朱理学又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被置于统治思想的主导地

位。这就使当时的思想界里，绝少有人对现实问题予以正视或研究。

到了鸦片战争前后，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动荡和变化，严重的社会危机迫使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去思考、去探索，他们对封建社会的某些腐败现象进行了揭露，希望进行改革；而救世除弊的愿望，又使他们痛感考据学的烦琐，宋学的空疏，力求研讨更加切于实际的学问。于是“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重新抬头，成为道光年间社会思潮转变的标志。这时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危机感，都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统治着文化思想界的学术——考据学和宋学上，它们造成了学术与政事（或学问与经济）相分离，败坏了人心。所以他们主张从中国的文化学术改革和振兴着手，以经世致用为学术思想的宗旨，提倡“实学”。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传统经世之学之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想的进步。诚如梁启超指出的：“鸦片战争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濡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智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帜，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①

梁启超正确地指出了近代史上这种客观现象：经世致用为西学的导入铺平了道路。但需进一步探究的是，它为什么能起如此的作用。有学者指出，经世致用思想的复兴，正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力”的表现，鸦片战争前夕的社会危机正促使“当时中国的思想层面正经历着痛苦的蜕变，向着脚踏实地的方向踱进。而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流行，恰好为民族之应变于外来变故，埋伏了思想准备，并在外来变故的激荡下，飞快地成熟起来，在两种不同文化兵戎相见时，提供了决策的根据”。②这样分析似乎还未能更深入地揭示经世致用思想正好成为导引西学的桥梁的原因。本文认为，以经世致用思潮表现的中国“思想层面”的蜕变，正是儒学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蜕变”。儒学体系有两大价值观念：一是“重义理轻艺事”，一是“贵义贱利”。这些价值观与小农经济结构和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相呼应，而具有鲜明的非功利主义的特征，是阻碍中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因素。而经世致用思想强调的正是义与利、道德与事功的结合，以实用反对无用，以功利主义反对空洞的道德伦理中心主义，提倡学政结合、学以致用，讲求功利。正是这样，魏源和林则徐承认了西学的实用价值，从而提出了“师夷长技”，在器物科技的层次上接纳了西学，一直到洋务运动的全面展开，正是这种经世致用思想实践的产物。在80、90年代以后出版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出现了“洋务”一专章，西学成了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内容，反映了把“中学”的某些部分与“西学”的科技器用之学结合、把传统经世精神与西方科学讲求实用的精神相结合的“经世之学”，恰好成为沟通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桥梁。

康有为正是近代以来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之所以能够超越

前辈，在于他独立地向西方寻找真理中，改变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世界观；在于他接过了经世致用的传统，又把它创造和上升到变法维新的高度。

康有为的经世致用思想是直接受岭南儒学大师朱次琦的影响而形成的。朱次琦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尤其厌恶脱离现实的纯粹考据学。康有为从19岁开始拜师朱次琦。正是在朱次琦的影响下，他在学术上摆脱了“考据帖括之学”的束缚，继承了朱次琦求实的学风和面向现实的积极精神，以“救世”为自己的大志，向传统学问中寻找“救世之道”，博览了有关经世致用的书。他离开朱次琦后，“退而独居西樵山者两年，专为深沉之思，穷极天人之故，欲自创一学派，而归于经世之用。”^④从康有为早年的著述论文中，可以看到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容。

首先，康有为经世致用思想包蕴着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大志。康有为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变动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危机四伏。而恰在这时，康有为的父亲和祖父相继病逝和遇难，家道骤然败落，使青年康有为对生活的艰辛、世道的黑暗有了更直接的体验，对人民大众的苦难产生了更多的共鸣，寄予更大的关切和同情。他在《不忍篇》中指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父子而不相养也，兄弟而不相恤也，穷民终岁勤动而无以为食也。僻乡之中，老翁无衣，孺子无裳，牛宫马磨，蓬首垢面，服勤至死，而曾不饱糠粃也”，生活过得比牛马都不如，而这是由于“政事有未修，地利有未辟，教化有未至”，根源则在“民上者之过也”。所以他要“竭吾力之所能为，愿吾性之所得为”，^④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实，“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⑤正是国弱民困的现状，成了他改革社会政治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现实基础。

在康有为早期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上，表现了他继承了经世致用论讲功利、重视国计民生、主张发展社会物质经济、反对“贵义贱利”的传统义利观思想。他认为，现在国家贫弱的原因，在于秦汉以后，“天下学士大夫时与立一义其上者，砥节行，讲义理，以虚名扶名义而已”，造成了“民生之用益寡”，^⑥所以，致强之道不在于提倡仁义道德，而是讲求“智”、发挥“智”的作用。他说：“人惟有智，能造作饮食官室衣服，饰之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皆智也”，“上古之时以智为重”，“前圣开物成务，制器尚象，利物前民，又以为不足，精其饮饌，美其衣服，饰其官室，华以礼乐，昼夜竭其耳目心思以为便民”，这样推崇“智”，就是最高的“仁”（“仁之至也”）。^⑦可见，康有为讲求“智”也就是讲求发展社会生产，追求物质利益，满足民生需要。

从这一立论出发，推广到社会政治上，则形成了康氏《民功篇》的基本思想，即为民制作，以造福于民是君主至高无上的使命与义务的功利主义思想。在康有为看来，上古帝王之所以被后世传颂，关键在于他们“有功于民”，“上世贵智齐类，熙熙无所雄卑，能制作则民推戴之。”只有那些为人民建功立业的人，才可以称作“民主”（民之主）。君主的成就、威望以至存亡，都无不以“民功”的大小为转移。“民功”思想成为康有为展开社会批判的根据。他认为上古从伏羲氏、神农氏到尧舜禹百余年间，制作极盛，文明美善，是所谓“民功”社会，而三代以后，特别是秦以后，华夏文明未曾有新的重大发展，

社会人生日趋恶劣，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功利原则逐渐衰绝，失去支配社会政治的作用，“民功”为“军功”所替代。“从秦既笃既久，以为时制之宜，只知君国为重乃大，以民为轻，于是二千年来，民功遂绝息于天下”。所谓“军功”，就是指残暴而野蛮的专制统治。“若变法图治，可以驾乎三代之上。”但是有清以来，社会人生的处境却每况愈下，民族与国家出现了空前危机，原因就在于承袭了秦汉以来军功社会的弊病。因此，他呼吁要变革现状，使社会恢复民功的原则，使社会政治适应于民生的需要，使追求幸福快乐的自然人性需求得到满足。

《民功篇》所提出的比较明确和完整的功利主义理论，正是康有为早期以经世致用的立场，用古史研究为工具，探索社会政治改革问题的思想成果。

经世致用思想在康有为早期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还表现在它是导引康有为转向西学的内在思想因素。

康有为遍读传统的经世致用的书籍，在其中寻找治世救国的方法，但是面对已经发生了巨变的现实，他又深深地感到了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学问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慢慢地从传统思想转向西学，以寻求新的“经世”途径和方法。1879年，他初次读到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数种西书，开始注意西方的文物制度和政俗习惯，这一年他游历香港，看到“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已开始动摇了旧有的观念，认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独视之。”^⑧1882年他上京应试经上海，更使他感到“别开一境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为神往，觉得西人的“治术”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从而在思想上发生重大转折，开始抛弃了旧有观念，坚定地 toward 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从改革自己国家的需要出发，潜心西方自然科学，而更着重考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因为他研究西学为的是经世致用。他经常说：“吾性好穷理，不能为无用之学。”^⑨因此，他在可搜罗到的极有限的西学政书中，如饥似渴地进行研究，探讨中外社会制度和政教学术的得失，在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认识到传统儒家所美化的“三代”美政并不是理想世界，古代的诸侯就如现在落后民族的土司，“三代旧事旧制犹未文明”。^⑩他在这时所产生的大同世界理想的蓝图不是远古，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他在这个时期写作的《实理公法全书》就是探索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最初成果，表现出新的理想追求。

他在该书中，从西方的“天赋人权”和近代人性论出发，认为“人各合天地原质以为人”，凡人皆不例外，人的这一本质决定了“人类平等”，同时因“人各具一魂”，也不例外地决定了“人有自主之权”。根据这条“实理”，他认为封建的家族宗法制度完全违背了实理与公法，违背了人的真正本质，违背了平等与自立两大原则；他主张政府官员应由人民选举，君臣之间应做到“权归于公”，“以平等之意立人立之法”，君主不过是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和社会纠纷的仲裁者；书中还参照西方的社会制度，设想出许多具体的机构，法律来实现这些思想。总之，该书接受了西方关于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观念，表现了康有为受西学影响后思想上出现的一个突变，说明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知识结构

和思想方法，已经和传统的封建士大夫有了明显的差别，向资产阶级维新派转变。

从上可见，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本身并不能产生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因为它本质上属于封建儒学的旧体系，是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但它却引导康有为冲破传统的藩篱转向西学，从而使其经世致用思想发生质的变化，有了新的内容。他这时的“经世”就是“改制”，改封建君主制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进行资产阶级性的变法维新；其“致用”，就是梁启超所讲的“一曰定宪法以出政治，二曰明格致以兴艺学。”^⑩也就是说，要实行君主立宪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

但是，康有为的转化，并不等于他同时抛弃了传统的旧学了。相反，在康有为同期的另一重要论著《康子内外篇》中，表达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思想观点，其中的《闾辟篇》就是赞赏君主专制的，他写道：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是“积于二帝三王之仁，汉唐宋明之义，先圣群贤百千万人，百千万年讲求崇奖激励而成之”，所以具有无比的威力，如果以君主“独尊之权”加上“闾辟之术”，“则人才之乏不足患，风俗之失不足患，兵力之弱不足患，一二人谋之，以中国治强，犹反掌也。”^⑪他的“闾辟之术”就是要软硬兼施，宽威并济，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以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再加上善用人才，整顿吏治，“刑乱国、用重典”等等，实际上就是传统的儒法互补、王霸相行的帝王统治之术。在《性学篇》中认为，中国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士农工商之业，鬼神巫祝之俗，诗书礼乐之教，蔬果鱼肉之食，皆孔氏之教也，伏羲神农皇帝尧舜所传也”，而“孔子之伦学民俗，天理自然者也。”^⑫在《地势篇》中甚至从地理环境的特点来证明，中国的政俗制度、伦理道德是天经地义的。^⑬

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在康有为的早期思想中表现得如此鲜明、突出，其实有其原因。康有为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一代进步人们，以经世致用思想为主导，跨出了从地主阶级旧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维新派转化的一大步，但因为新思想影响尚浅，为时尚短，而儒学旧思想则从小就浸润熏陶着他们，在思想世界观中根深蒂固，新的还未消化，而旧的烂熟于耳，所以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新与旧之间的摇摆、选择和消化取舍的过程。一只脚走进了新世界，另一脚仍拖在旧时代，这就是康有为早期思想一个重要特点。

①③ 《清代学术概论》第20、24节。

② 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5。

④ 《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4页。

⑤⑧⑩ 《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12、118、115、119页。

⑥⑦⑫⑬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篇》上册。

⑨ 《广艺舟双楫》卷五，万有文库本第90页。

⑪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34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统战部研究室

责任编辑：林有能

汉代中西交往与社会开放

(一)

在上古时期，旷远的亚欧大陆（包括西亚毗邻的非洲东北角）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几个古代文明。但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之限制，这些古典文明几乎是相对独立地发生、发展着，尤其是分处于大陆东西两端的古代希腊、罗马和秦汉以前的中国，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之中。

到了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在欧洲的意大利、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和北印度，还是在中国的西北部地区，都发生了较大的社会动荡。回顾当时，可以看到罗马军团对北方蛮族的洗劫和镇压，帕西亚骑兵的东征和西进，中亚希腊人王国的崩溃及月氏部族的南迁称雄，匈奴与汉朝的连年交战。但正是在这些战争的缝隙之中，在中亚、西亚到东欧之间，出现了颇具规模的陆路交通和国际贸易，从中国南海到印度的海上交通也进入初创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战争动荡与和平交往之中，中国社会开始由相对的封闭走向比较全面的开放，使东西古代文明有了日渐频繁的接触。

汉代中西文明之交流，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特别是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系列变化有密切关系。首先，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对于中外交通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文景治后，“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①这是当时保障社会安定，民生富足的一项基本国策。农业的发展也促进纺织业取得卓越的成就。汉代丝绸不仅产量大、质量高，其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扩大，它不但基本满足了中国市场之需，还成为国内外贸易中地位最显赫的一种商品，甚至成为政府外交的特殊手段。^②与此同时，汉代商业亦打破了以往封闭社会的平静和重农主义的风尚，形成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逐利图景。汉武帝时期，政府对于交通事业予以着力经营，取得卓著成绩，这为中原与外界的交往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这一切使汉帝国终于突破了四周的地理屏障，迅速地开辟疆域，并为进一步扩大多民族的统一，为中西文明的互相交流、融合，促进社会的发展奠下了基础。

汉代对西域开拓的一个重要契机是抗击匈奴。它反映了汉代社会系统由内部稳定走向对外开拓的重大演变。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外向性。主要可见于以下几方面。

(一) 外族人员来汉频度、数量激增。首当其冲的是匈奴人开始大批南下居住。武帝时匈奴休屠王金日磾附汉，甚得皇帝亲信，其宗世子孙亦贵显建功，影响极大。塔里木盆地周邻地区各少数部族及中亚北部之塞种民族，也在此时纷纷来到中原，或通聘纳贡，或入朝为质，或经商贸易，或修习汉文。此外，又有许多中亚西部和印度的僧侣，步着商旅之后尘，相继东来，从事传译梵典的工作。他们到一处辄止，成为移民，留下后裔，并与汉族渐渐同化。汉政府对于来华人员，一律采取欢迎态度。长安城内薰街有“蛮夷邸”，专为外国人居住而设，类似今世之使馆区。一些西亚和欧洲国家的客人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交易万物，诣阙朝贺，献乐玩艺，增进友好。

汉代来中国的西方人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涉及的国家与地区上，都是前世无可比拟的。至于到西域去作战、驻屯、出使、经商、旅行的中国人，则是更不可胜数。此种情况，说明中外社会交往在汉代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二) 西方“宝物”大量传入中原。在春秋战国之前，虽有昆仑之玉闻名遐迩，但其他西方物产极少传入内地。西汉以后，交通畅达，藏山隐海之灵物，湜沙栖陆之瑰宝，莫不流向中原，给商贾带来了巨利，更为皇室豪门增添了前代不曾见闻的稀世之珍。除了珊瑚、琉璃、象牙之类奢侈品外，许多动植物新品种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并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明显的效益。如原产于大宛以西的苜蓿，是很好的绿肥，又是营养丰富的饲料，传入汉朝后，“离宫别馆旁”种植极望，并迅速普及于各地。葡萄也是出使西域的商人携回其种苗，始在中原推广，又学习了西方果酒酿造技术，制出甘醇的葡萄美酒。此外，石榴、芝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萝卜、菠菜等，皆为汉代以后由西方传入，是当时中西交往的重要收获。畜产品方面，则有良种马匹（如乌孙马、大宛汗血马）、驴、③骡、④罽宾封牛（水牛）的引进，各种西方的观赏动物如狮子、犀牛、大雀（鸵鸟）、桃拔等也随使臣商旅输入内地，为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 在汉代，中国科技水平一般稍高于外国，但在与西方各国的阻隔打开以后，中国也吸收了外国科技方面的许多先进成份。例如，毛纺织技术素为西方游牧民族所擅长，汉代由于大量输进西胡毳布、氍毹氍毹等产品，也学习纺造出辫扣织金银毯、栽绒毯及丝、毛、棉混纺毯等，使中西纺织工艺之精华得以结合并提高。佛教传入后，中国传统医学受到冲击，印度古代医疗思想开始植根中国本土，对东汉魏晋时代的解剖学、外科术、金针针灸法及切脉法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汉魏医术中还开始使用不少西域传入的药物，如胡麻、姜活、红花、蒜、酒杯藤等。

汉代染料化工之业的发展也与异域植物、矿产的引进不无关系。生长于漠北的染料植物燕脂是匈奴人传入的，⑤藤黄、淀蓝均来自西亚之地。汉朝史籍还记述了用“胡粉”（即铅粉）作化妆品及壁画颜料，也是当时一种重要的化学实验用品。

(四) 西方各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染极为显著，影响深远。西汉中期中西交通进入繁盛阶段之后，各类人员往来频繁，语言交流自然密切，不仅因之产生了“胡化”的汉字辞语，而且出现外来宗教的辞汇和梵文、佉卢文等音译的许

多专门术语。特别是西方拼音文字的介入，促进了汉语音韵学中反切之法的形成和发展。印度佛教典籍中广泛采用的譬喻法亦为中国文人乐于吸收并加以广泛运用，这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来说，无疑是灌输了新鲜血液。许多西域民族的乐器如琵琶、箜篌、羯鼓、笛、胡角之类，也在此时纷纷加入中国民间的乐队，西部的民间歌舞音乐也传至中原，经中西结合改造而成新舞新乐。近年发现的汉代裸体俑则生动地表现出欧洲典型的雕刻风格，汉代画像石上还大量采用狮子、骆驼、大象、鸵鸟、长颈鹿等域外动物作素材，这些都表明汉代艺术家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大胆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开拓精神。

（五）两汉时期的西域交通线上，另一项交往活动便是佛教之东渐。公元前二世纪，佛学已在中亚盛行，并紧随中西交通的发展而向东渗透。“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⑥。这表明佛学在西汉末年已受到中国士大夫的注重。东汉初年，楚王英正式皈依佛门，并得到明帝的褒奖。明帝还派人赴西域求经，又在洛阳修寺以安置来华僧侣，兼作译经传教之所，为佛教扩大影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汉代，佛教传播最主要的任务是典籍的翻译，因为这毕竟是一种外来思潮，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许多教义玄秘深奥，晦涩难懂，经文则皆为古梵文、吐火罗文等写成，若不经翻译注解，是无人能够接受的。来华僧人，必须先研习汉文，方能从事翻译。而佛教三藏之经，卷秩浩繁，远非一人一世所能完成。所以自西汉末年起，译经是来华僧人最艰巨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佛教在中国进入大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准备阶段。

这个阶段的译经，在中国翻译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这是中国最早的官方和民间并行的规模文献翻译活动。此时涌现的翻译大师极多，较有代表性的是安清和支娄迦谶。安清的文体偏重意译，其风格比后世玄奘的译经影响还大。支谶译文则“审得本旨，了不加饰”，是典型的直译风格，代表了中国翻译文体上的一大进步。

如果说汉代西域文明对中国本土产生了一次思想和文化的冲击的话，那么汉代社会对于这样的冲击采取的不是封锁抵制，而是开放兼容的态度。一种本体文化能够充分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正是这种本体文化获得发展的促进因素。表现出一个冲击—开放—交流—进步的社会发展规律。

（二）

相对而言，汉朝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经济体系比其他西方国家都更为稳固和完善，科学文化达到更高的水平。西方史家希特威尔坦率地指出：“古代中国的文明是无与伦比的，这个国家的人们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国土走出极远，才能见得到可以与之相比的其他文明。……在古代远东，中国同时发展了罗马一般强大的军事优势和希腊同样发达的高度文化。”^⑦正因如此，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才可能发挥出独到的作用，其中最重要者，就是发生在两汉时代中国文明西渐和对西方社会产生的许多重要影响。

汉军追逐匈奴的兵锋，远达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张骞西使一举凿开西域交通南北

干道上的历史帷幕，使中原文化通过古代新疆地区第一次直接与印度和中亚的希腊化社会发生接触。以汉朝使臣为领导的庞大商业团队，往往“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他们穿过塔里木盆地和中亚山岭谷地，直达伊朗高原，东汉甘英甚至足至地中海东岸。“丝绸之路”就是这一时期联络东西的主要渠道。

中亚地区首先受到中国文明西渐潮流的冲击。丝路开通之后，大月氏、乌孙等大部族在政治和文化上受中国影响最甚。贵霜帝国发行的铜币重量与汉代铜币全同（8.5克和2.1克），班超经营西域时贵霜曾“求汉公主”，并“岁奉贡献”。^⑧在科技生产上也直接受惠于中原文化的传播，如农耕技术、穿井灌溉术的推广改变了这里的经济结构。纸是汉代一项伟大发明，造纸技术很快由中原传入中亚地区，斯坦因在《亚洲极中部》中记录的汉代法卢文、婆罗迷文、粟特文的纸片，即为例证。

贵霜之西是安息帝国。这是个以游牧业为主的国家，其领土广阔，民族复杂，经济落后。“安息国家财富全靠控制和盘剥经过其国内的商路而来，贸易交往所引起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致于由阿姆河到幼发拉底河一线的安宁完全依赖于中亚商路的正常经营；反之，这条道路上发生的任何骚乱和阻滞，却会导至足以动摇安息王位的大动荡”，^⑨足见当时中国对西亚政局及经济结构起到多么大的作用。除此之外，来到安息的“汉使亡卒”还将中原铸铁之法传入西亚地方，教铸兵器用具，这对于其生产力的进步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原一些植物品种也在此时被介绍到西亚，如桃和杏。中国的姜、黄连、大黄等药用植物，也皆成为西亚商人的热门货物。

西汉初年以前，中国与欧洲几乎无直接交往。丝路的开通终于揭开了中国与罗马关系史上的第一章。自奥古斯都时代起，“赛里斯”（意“中国”）在罗马就成了中国丝绸和与东方开展贸易的象征，尽管这种贸易往往经过印度或安息的中介，而且到达罗马的丝绸多半经过西亚织造商的再加工，成为丝麻混纺的“胡绌”。古罗马史家也特别提到中国铁是“质量最佳的”，还有中国的大黄、桂皮等药物也是罗马人着力追求的商品。^⑩据普林尼记载，罗马每年因东方贸易而流入印度、中国和阿拉伯的货币至少达一亿赛斯特斯（sesterces），^⑪约合十万盎司黄金。赫德森认为，“罗马人因大量购买丝绸而失去外贸平衡”。^⑫由以上观之，中国对于欧洲的影响，往往表现在宏观的政治和经济的局势上，因为双方的交往一般不对中国社会产生反馈，反之中国（特别是西域）的重大变化或动荡，则常会通过商路传递到西亚、欧洲。

总之，公元前一世纪以后，中亚、西亚地方发生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是以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往来空前繁荣为直接先导的。汉代社会之开放，对于亚欧世界的政治影响，为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

（三）

中国文明历史悠久，独立发展，未见中断。但独立发展并非孤立发展，至少在公元前二世纪后，中国就不是一个孤立于世的国家。在它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社

会特点，就是对外接触和交流，乐于吸收和善于消化中原以外异质文化的优秀成份。中国古代几次较大规模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除了汉代的中西交往外，主要的还有唐代国际交流的兴盛和宋元时期对外交通的发达，亦有人认为明末清初之“西学东渐”也是一次重要的中西文明交流，以整体上看，唐代的中西交通规模较之汉代更大，文化交流硕果累累，有丝绸、陶瓷、纸张、茶叶、钢铁等物品的大量外传，使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在西方世界大放异彩，同时也兼收并蓄西方各种宗教、文化、艺术及殊方宝物、奇兽珍禽之属。唐朝的开放，在主要的陆路交通线上与汉代接近（唯其海路已显示出重要性，因而加强了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国家的接触），交流的主要方面也与汉时相仿（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已有更大进步，故在具体内容上唐代较之汉代要广泛得多）。如是观之，唐代的开放，基本上是汉代中西关系的继续和发展。宋代对外交通以海路为主，陆路则无甚可观，虽然当时沿海港口城市与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有一定规模，但对于内地的影响不大，因而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也较为有限。及至蒙元时期，地跨亚欧，东西陆路交通横亘万里，网罗密布，人员往来频繁，其鼎盛之状，可想而知。但由于其国家崇尚武功，尤重发展军威，又在国内实行种族主义统治，工商各业均以贵族消费为主旨，文化交流也多在上层进行，故元代社会在形式上虽是开放，却表现出某种畸型状态，其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反不如前代。至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固然导致一些西方新技术新思想的传入，中国儒学亦藉此被介绍到欧洲，但这次的中西交流与汉唐时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因为明清时代西方文化东渐的主要媒介是少数欧洲教士，其宗旨在于宣扬教义，其对象是上层统治者和士大夫，范围十分狭隘，内容相当陈旧，学科支离破碎，理论不成体系，正因如此，这时的文化交往未能持久。以后的年代，未见中国出现科技的飞跃和文化的繁荣，相反只是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封闭，国家经济的衰退和学术思想的沉寂。

经以上简单的比较可见，汉代的社会开放及中西文明的广泛接触和交融，非但规模宏伟，历时长久，而且对后代的影响极为深远。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系统思想看，这次中外交往在形式上也十分典型：它起于北方游牧民族对定居帝国的入侵，产生于落后的生产关系与进步社会力量展开的激烈斗争之中，完成于交通网络的开通与扩大，发展于国际贸易的繁荣、东西文化的互补、思想交流的活跃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之中。汉代中西关系得以如此深入地展开，归纳起来可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即中国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众是中西交通的开拓者，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参与者，并且直接地从中受惠。此二方面，互为辅佐，不可缺一。这也正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对外开放和交往的一个基本特点。由此基点出发，便可更明确地观察中国古代社会究竟是封闭还是开放的问题。

在汉唐两代（及宋元的某些时期、某些地区），中外之间的文明交往不仅有其社会性的规模和历史性的效果，而且就历朝统治者对此方面的政策而言，也是明确的、积极的。认为中国数千年始终隔绝于世，或者只有交往现象而无开放政策的论点，显然不符

合史实。明末清初之际，虽然不乏中外交往、海上贸易的一些具体例证，但与汉唐时期气势宏大的中外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相比，却显得极为狭隘、肤浅，甚至表现出衰落不振。因为明清时的中外贸易，几乎全为市舶司、十三行等少数官方机构所垄断，限制极严，民间不得进行。在有关史料记载中也难以发现当时的外贸有繁荣、发达的势头，更缺少开展于广泛领域、各个层次的中外文化交流。既然如此，“社会开放”又从何谈起？此外，明清政府之禁海限商，诚有防止外侵的动机，但在实施中却更多地表现出经济、文化上的与世隔绝，这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不能不成为一大阻碍，更与开放社会的基本特征无相符之处。

关于这一问题，还应该注意区分以下两种情况。首先，我们所说明清时代的闭关自守，只是与前代，特别是汉唐时期的开放社会相较而言，而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封锁国界。因为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定会在不同程度上与外界有所接触往来，不可能不透丝毫气息，反言之，也不能仅仅因为某个国家与外界发生过一些交往，就简单地断定这是个开放性的国家。

其次，根据历史的经验，衡量中国社会是否开放的标准，不仅在于当届政府官方的涉外频度，更重要的应在于是否有广大民众主动而积极的参与，以及中外交往是否影响并深入到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及传统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之中。这两条标准，前者是表象的，后者是本质的。纵观古今之中国，在几个为期不大长久，但十分黑暗、愚昧的动乱岁月里，虽然政府的外交活动或官方的对外经济联系并未终止，甚至还取得某些较为显赫的成就，但从全局来看，却是将整个中国关闭于一个与世界文明进步脱离的圈子里，实行的是自欺欺人的愚民政策，其结果，不是遭受外强的残酷入侵，就是把国家经济文化推向崩溃的边缘。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拙作：“关于汉代丝绸国际贸易的几个问题”载《新疆社会科学》1987.2。

③ 顾亭林《日知录》：“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为汉代传入无疑；陆贾《新语》中则将驴与“琥珀、珊瑚、翠玉、珠玉”等西方物产并列为宝。

④ 《匈奴奇畜杂俎》：“羸（骡也），不见于三代，汉时才有。”

⑤ 《古今注》：“燕支，中国人谓之红蓝花”；张华《博物志》：“红蓝花乃张骞得种于西域。”

⑥ 《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⑦ N.H.H.Sitwell, *The world of the Romans Knew*(London, 1984), P.151.

⑧ 《后汉书·班超传》。

⑨ F.J.Teggart, *Rome and China*(California, 1939), P.120.

⑩ Warmington,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 PP.190, 207—208.

⑪ Pliny, *Natural History*, 12; 84.

⑫ G.F.Hudson, *Europe and China*(London, 1931)P.95.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峰

论严羽的审美理想与时代的关系

清代以来就有人说严羽的《沧浪诗话》“论诗虽归宗李、杜，……亦是王（维）、孟（浩然）家数”（黄宗羲《张心友诗序》），名为学盛唐，准李（白）、杜（甫），实则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故论诗唯在兴趣，于古人通讽喻、尽忠孝、因美刺、寓劝惩之本意全不理睬”（许印芳《〈沧浪诗话〉跋》）。这些说法在当代学界中颇有影响，如敏泽言：严羽尽管极力推尊李、杜，“但他实际上并不能够真正理解李、杜诗歌创作的思想艺术的长处，他在诗话中总结、并加以着力提倡的，正是王孟诗派的特点。”①朱东润则说：“沧浪之说，内崇王、孟，阴抑少陵，论及杜诗，往往为惆怅之谈，盖意本不在杜而不敢昌说，则故为此词耳。”②但是，这些说法不管如何雄辩，却无法解释这么一事实：《沧浪诗话》中谈及李、杜的地方有二十多处，其中明显推崇的占其大半，没有一处贬义，赞语的数量和实质均居首位，非他人可比。反之，没有一处谈及王维，（除了“诗体”之王摩诘体）对孟浩然也是从诗才胜过韩愈、诗歌具有音韵节奏之美方面给以赞扬。因此，要说严羽“准李、杜”是名，“偏嗜王、孟”是实，是很难自圆的。这方面的问题，只要是不抱先入之见的人，认真去翻一翻严羽的著述，都可明白，故不具论。

这里想加以论辩的，是李泽厚的意见。

李先生也是认为严羽在对待李、杜和王、孟问题上主客观是不一致的。他说：严羽“主观上是更推崇提倡李、杜的”，但“晚唐北宋以来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风会，却使他实际更着重去讲求韵味，更重视艺术作品中的空灵、含蓄、平淡、自然的美”；“这样，也就使他在客观上更倾向和吻合于王、孟。正如司空图二十四品中虽首列‘雄浑’，其客观趋向却更倾心于‘冲淡’、‘含蓄’之类一样。”③这里除了上述所说的严羽主客观的矛盾问题，又提出了严羽的审美理想与时代的关系的问题。显然，探讨这个问题是颇有价值的。

李先生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审美理想的发展趋势作过这样的论述：

“战国秦汉的艺术，表现的是人对世界的铺陈和征服；魏晋六朝的艺术突出的是人的风神和思辨；盛唐是人的意气和功业；那末，这里（指山水画、爱情诗、宋词和宋瓷——引者）呈现的则是人的心境和意绪。与大而化之的唐诗相对立的是纤细柔媚的花间体和北宋词。而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的诗则正是过渡的开始，……

“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

则以其对日常狭小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

“在词里面，中、晚唐以来这种时代心理终于找到了它的最合适的归宿。……诗常一句一意或一境，整首含义阔大，形象众多；词则常一首（或一阙）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细腻，含意微妙，从而也就使所描绘的对象、事物、情节更为具体、细致、新巧，并涂有更浓厚更细腻的主观感情色调，而不同于较为笼统、浑厚、宽大的‘诗境’。”④

如果笔者理解没有错的话，这些议论也就是上述所谓“晚唐北宋以来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风会”的具体注脚，它的总趋向是由侧重壮美转向侧重优美。就这些议论的本身来看，那确是很精彩的，问题在于：即使如此，这一趋势也不是直线的，不能搞一刀切。就拿山水画来说，李泽厚先生就指出：“北宋浑厚的、整体的、全景的山水，变而为南宋精巧的、诗意的、特写的山水，前者以雄浑、辽阔、崇高胜，后者以秀丽、工致、优美胜。两美并峙，各领千秋。”⑤也就是说，其审美理想的趋势是由北宋的壮美转向南宋的优美了。以词来说，如果纤细柔媚代表了花间体和北宋词的主要风格，那么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则是南宋词坛的主流。这就说明：对审美理想的历史发展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严羽的情况正是这样，为什么到了南宋的严羽要推崇盛唐和“截然以盛唐为法”呢？这的确是与他所处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风会”分不开的。只不过我们的结论与李先生的不同罢了。我们知道，南宋诗坛提倡晚唐和盛唐，都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的，而江西诗派的盛行又是和北宋末年以来宋朝国力不够强大、统治阶级对北方异族统治者退让苟安分不开的。江西派祖师黄庭坚政治上明哲保身，为人处世鼓吹与世无争、万事随缘，正是这种精神状态使他沉缅于琢磨诗法、锤炼文字。他写诗反对讽刺，反对怨忿怒骂，主张限于“呻吟调笑”；江西派的宗师陈师道政治上也是主张妥协退让的，诗则多写他自己的清苦生活；另一位宗师陈与义反对赵鼎主战，倡言“若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宋史·陈与义传》）江西派著名诗人吕居仁更有“忍穷有味知诗进，处世无心觉累轻”之句，那是近于公开宣扬苟且偷安了。难怪他们那些粉饰太平的诗句和一套苟安哲学很合偏安一隅的宋高宗赵构的胃口。可见江西诗派一味推敲句法、章法，讲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题材狭小，内容贫乏，正反映了北宋以来的积弱之势和南宋统治阶级的苟安心境。⑥赵构死后，有所作为的宋孝宗即位。经过几十年的整治和发展，国力有所增强。在这种形势下，南宋士大夫也就渐萌恢复故土之心。一些诗人如杨万里、陆游也由初学江西随后跳出江西、批评江西。陆游就提倡雄浑，反对清寒，推崇李杜。如云：“袖手哦新诗，清寒愧雄浑。屈宋死千载，谁能起九原？中间李与杜，独招湘水魂。自此竞摹拟，几人望其藩？兰茗看翡翠，烟雨啼清猿。岂知云海中，九万击鹏鷖？”（《白鹤馆夜坐》）针对当时有人提倡宗法晚唐，他大声疾呼：“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宗晚唐。欧、曾不生二苏死，我欲痛哭天茫茫。”（《追怀往事》之四）到宋宁宗时，金人势力逐渐衰弱，主战的人也就多起来。诗坛也就由学晚唐的四灵发展为江湖派，江湖派诗人可分两类：一类是姜夔那样的“狷者”，对政治形势不那么关心，只求诗艺的

精工；另一类则较为关心国家大事，好高谈阔论，其诗也较有爱国热忱。刘克庄、戴复古便是其中的有成就者。戴与严羽不仅是同乡，且尝共同研讨诗文，其诗有“举世吟哦推李杜”和“诗家气象贵雄浑”之句，可见推崇李杜、追摹盛唐的雄浑气象，乃是当时诗坛的风尚，而不是严羽的个人现象。又如刘克庄，他说：“翡翠鲸鱼并归摹写，大鹏尺鷃咸入把玩，则格力雄而体统全矣。”（《姚镛县尉文稿》）翡翠、尺鷃指优美，鲸鱼、大鹏指壮美。刘氏对二者主张兼容并蓄，但更推崇“格力雄”的作品。所以，于唐人他尊李杜，于宋人他尊梅尧臣、陆游，尤其是陆游：“学杜而不本李、杜，学本朝而不由梅、陆，是犹蓬户之容膝而不知有建章千门之巨丽，爱叶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龙骧万斛之负载也。”（《李贾县尉诗卷》）“陆游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大家。”（《后村诗话》）很清楚，这一推崇与他的审美理想是一致的。以上说明，无论陆游、戴复古、刘克庄也好，严羽也好，他们都不约而同在“历史潮流和时代风会”的驱使下推崇李、杜，追摹盛唐，倾心壮美。

我们再来看看李先生的所谓司空图和严羽一样：“虽看到‘雄浑’，其客观趋向却更倾心于‘冲淡’‘含蓄’。”其实，对司空图来说，无论从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实际来看，都是实实在在的“倾心于‘冲淡’、‘含蓄’”，根本不存在什么主观意愿与客观趋向的矛盾，首列雄浑不过是个排列顺序而已。司空图生活在天下大乱的晚唐，在农民起义风暴冲击之下，唐王朝摇摇欲坠，并最终灭亡。他出生于庄园地主的家庭，年青时生活惬意，三十三岁中进士，几番受到当权者的赏识，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这样就形成了贯穿司空图一生的“退隐”与“报国”的矛盾。尤其是在弃官归隐之后，他徜徉于山林之间，不时写些清闲自在的诗句以安慰自己，但内心却又思念朝廷。请看他的诗句：“身病时亦危，逢秋多恸哭。风波一摇荡，天地几翻覆！”（《秋思》）他对唐王朝的行将灭亡是多么的哀伤！可以说：退隐山林，消极避世，以苟存性命于乱世是他后半生的主导思想。①农民起义的风暴，藩镇割据的动乱，使他深感悲惧。他有这样一首小诗：“小蝶尔何竞，追飞不惮劳。远教群雀见，宁悟祸梯高。”（《漫书二首》之一）深恐小蝶被群雀看见招致杀身，这正是诗人心理的真实写照。西方文论有“愤怒出诗人”之说，中国古代文论也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钟嵘的“诗可以怨”、韩愈的“不平则鸣”等等说法，但司空图对这些均不赞成，他公开声称：“自古诗人少显荣，逃名何用更题名？诗中有虑犹须戒，莫向诗中著不平！”（《白菊三首》），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阶级地位、生活道路、思想状态决定了他赞赏王维的“证谈精致”的艺术趣味。王维中年以后厌倦政治生涯，晚年退隐。司空图把他引为同调是毫不奇怪的，他也是带着个人的偏见去品评唐代诗坛的。他看不起富有批判性和现实性的“新乐府”，把元稹、白居易视为平庸之辈；对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只略为赞许，但并不欣赏；对贾岛等一些佛教徒赞美山林隐逸、闲居独处之作则誉为“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十分倾心。至于严羽则不然。如前所说，他生活在虽然国难深重却发愤收复失土的时代，凡血性男儿均跃跃欲试，严羽自己就在诗中称“年少尚奇节”，他的理想是象刘备那样“高视蔑袁曹，气已盖宸宇”（《梦中作》），并反复抒发了效命疆场的报国热忱，如《剑歌行》：

“我亦摧藏江海客，重气轻生无所惜，关河飘荡一身存，宇宙茫茫双鬓白。到处犹吟然诺心，平生错负纵横策。……”；《送吴会卿再往淮南》：“荆楚奇材多剑客，感慨相逢思报国。男儿事业早致身，青鬓须防霜边白”；最能说明问题的要算高亢激越的《促刺行》：

促刺复促刺，男儿蹭蹬真可惜。三年走南复走北，岁暮归来空四壁，
邻翁为我长叹息。人生四十未为老，我已白头色枯槁。海内伶俜独一身，
裘马摧藏愁欲倒。今日饮君数杯酒，座间颇觉颜色好。忽忆当年快意时，
与君笑傲长相期。大杯倒瓮作牛饮，脱巾袒跣惟嫌迟。君不见，昨夜谁为
烈士歌，听得仰空泪零落。”

类似诗作还有不少。此外还有许多仿古摹唐之作，都寄托了收复中原的豪情壮志。如“弯弓随汉月，拂剑倚胡天。说与单于道，今秋莫近边”（《从军行》）；“连营当太白，吹角动胡天。何日匈奴灭，中原得晏然”（《出塞行》），等等。《邵武府志》载云“羽既不仕，其忧国忧民之意每见于诗。”正指出了他的诗歌包含了深厚的爱国热忱，与他同时代又同是福建邵武人的著名江湖派诗人戴复古用“长歌激古风，自立一门户”（《祝二严》）来形容他的诗作和诗论，是恰当的。这些都说明，司空图 and 严羽在生活道路和审美意趣上都是大不相同的：严羽虽不仕却不消极避世，他无时无刻都在忧时伤国，梦想恢复中原，再现封建社会的“盛唐之音”；而司空图虽仕却最终归隐，由害怕、恐惧到逃避现实斗争，并力图在淡雅精致的诗歌艺术境界中安慰自己的灵魂。对严羽来说，由于当时南宋国力稍强而令人觉得尚有希望，故向往壮美，追慕盛唐；而在司空图之时，唐王朝已行将覆灭，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因此，说司空图与严羽“一脉相承”、“若合符契”，显然是与事实不相符的。

① 敏泽：《〈沧浪诗话〉述评》，《美学论丛》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84页

② 《王士禛诗论述略》，朱东润著《中国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99页）

③④⑤ 李泽厚：《美的历程》

⑥ 参看王达津《论〈沧浪诗话〉》，《文学评论》丛刊第16辑

⑦ 参看祖保泉：《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刘斯翰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 时空观科学基础的思考

傅诗济

近年来，在对哲学时空观的变革问题的研究中，有些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同绝对时空观混同起来，而与相对论时空观对立起来。笔者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赖以产生的科学基础缺乏完整的认识。因此，为了使哲学时空概念的变革的研究能够坚持正确的前提和原则，我们必须对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的科学基础作出理论上的说明。

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建立在19世纪自然科学总体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当时的一系列自然科学新发现，特别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进化论三大发现，描绘了自然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清晰图景，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在时空理论方面，当时的自然科学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展（外欧几何虽已产生，但其物理原型尚未显示出来，人们并没有普遍认识其意义，毫不奇怪，恩格斯也没有对它加以吸收），三大发现等最新科学成果也没有揭示出时间与空间与物质运动不可分离的辩证性质，作为经典力学的基本概念的绝对时空理论仍然在自然科学领域占统治地位。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的科学基础是什么？这是直接关系到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问题。有些同志正是由于对这个问题的片面理解，因而断言恩格斯对时空问题的论述，“充满着经典物理（就时空理论而言，实指经典力学——引者）和经典哲学之间的和谐美”，而与外欧几何和相对论不相容。（参阅方励之：《哲学和物理》，《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年第5期。）

如果把哲学时空观的科学基础仅仅归结为自然科学时空理论，那确是难以说明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产生的科学依据，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把它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绝对时空理论联系起来。但是，作为一种哲学范畴的时空观，当然是不能和整个哲学体系割裂开来的，其科学基础，当然也就不能仅仅从它同自然科学时空理论的联系上进行分析，而必须同时从这个哲学体系与自然科学总体发展的联系上作出说明。

从哲学时空范畴本身的特点来看，它同自然科学总体发展的关系是很明显的。我们知道，时间与空间是一种最普遍、最基本的客观存在，它同物质和运动一样，是人类自然观中最基本的范畴，相互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哲学时空观的任务，就是从认识论

和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上，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上，对时间空间的一般本质，如时空的客观性问题，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关系问题，以及时空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说明。显然，哲学时空观的这些基本问题，同哲学对世界本原、世界普遍本质的认识，以及对物质和运动本质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在科学基础方面，也必然是互相联系的。当着自然科学的总体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本质或根本规律，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唯物论哲学形态的时候，与这种哲学相联系的时空观，就将不依赖于自然科学时空理论的发展状况，而随其母体一同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对时空普遍本质的正确认识。这个时候，如果自然科学时空理论没有为哲学时空观提供科学依据，则哲学时空观的科学基础就将从母体赖以产生的自然科学发展的整体特征中得到说明，从而使哲学时空观表现出对自然科学时空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和一定的超越性。在人类认识史上，一些哲学家能够对时空的本质提出比当时自然科学更具有真理性的见解，固然与哲学具有的特殊功能有关，但从其科学基础来说，都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由此可见，对于一种哲学时空观的科学基础的考察，必须从自然科学的总体发展和自然科学对时空研究的状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把哲学时空观的科学基础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科学时空理论，不承认自然科学总体发展对哲学时空观发展的影响，是不符合认识规律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考察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的科学基础时，就必须在全面分析19世纪自然科学总体发展的基础上，从最新科学成果的整体特征及其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总体联系上作出说明。问题很清楚，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总结概括19世纪最新科学成果的。它的每一个原理、概念和范畴，都是作为这个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着这些科学成果所揭示的自然图景和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时空观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无疑也同这种自然图景和思维方式联系着。它对时空本质的理解，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自然界普遍本质的一个侧面的理解。它关于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不可分离的原理，虽然不能直接从当时最新科学成果中作出说明，但同这些科学成果所揭示的自然界普遍联系的总图景，却是融洽的，“充满着和谐美”。而从这些最新科学成果的内涵中抽象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原则，更是为认识时空的普遍本质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恩格斯正是借助于事物的相互联系，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抽象，揭示了时间空间与物质不可分离的本质。当耐格里断言他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时，恩格斯说：“这是老生常谈。先从可以感觉到的事物造成抽象，然后又希望从感觉上去认识这些抽象的东西，希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根本不是小时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空间根本不是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13页）

让我们把恩格斯这段论述同牛顿的时空概念作个比较。在牛顿那里，一小时、一米这

些可感知的量度，就是所谓相对的时间和相对的空间，而绝对的时间空间是与具体的事物无关，独立于具体的时间空间而存在的。在恩格斯这里，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时间空间，则是对小时、立方米这些具体的时间空间的抽象，是同具体的物质形态相联系，并依赖于运动物质而存在的。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同绝对时空观的根本区别，不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吗？

总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时空本质的认识，如同它对世界普遍本质认识一样，是立足于19世纪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之上的。正是从这些科学成果所提供的自然图景和思维方式出发，正是基于对自然界各种物质的普遍联系的深刻理解，使它能够揭示出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的不可分离性，从而在对时空本质的认识上超越了绝对时空观，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相对论时空观的哲学先导。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哲学对时空的认识，毕竟不能离开自然科学时空理论。这是哲学时空观发展的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基础，并且具有最终的制约作用。以自然科学的总体发展为基础，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出对时空普遍本质的正确认识。但是，缺乏自然科学对时空研究的成果为依据，没有对时空具体特性的确切了解，则对其普遍本质的认识，在确定程度、明白程度以及完善程度方面，必然受到限制。因此，我们在肯定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同时，还必须看到由于19世纪自然科学总体发展中因对时空方面的研究不够充分而带来的认识上的局限，以及由于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新发展而形成的时代差距。不承认这种局限和差距，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原有的理论框架已足以容纳现代自然科学对时空认识的成果，无需作任何修正和发展，同样是违反认识规律的。

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越来越明确，有些同志已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时空概念的变革问题。这是当前哲学时空观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不应当满足于用新的科学事实去充实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而应当在全面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的科学内涵的前提下，对其理论框架的固有局限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然后通过深入研究现代自然科学有关时空方面的认识成果，对时空的普遍本质作出新的概括，只有这样，才能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时空概念实现新的变革。

如前所述，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的核心，它与绝对时空观的根本区别，就是关于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不可分离的思想。然而，从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看，他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却显得不如他对时空的无限性等问题的阐述那样具体、充分。这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尚未获得这方面的认识，因而使得恩格斯只能借助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仅仅从时间空间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以及作为对具体事物的抽象方面作出概括，至于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的直接联系，则未能作出具体的说明。事实上，作为一个辩证法大师，恩格斯对这个问题已有所认识。在《自然辩证法》“片断和札记”中，恩格斯原文摘录了黑格尔的一段话：运动“的本质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空间和时间都属于运动；速度，

运动的量，是和某一特定的流过的时间成比例的空间。”（《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8页）黑格尔的这段话，已经思辨地猜测到了时间空间对物质运动的依赖性以及时空和空间的统一性。恩格斯把它作为阐述物质运动形式的素材，表明他并不满意把时间空间看作物质的存在形式，而是试图从时间空间同物质运动的直接联系上作出概括。只是由于缺乏具体的科学依据，加之《自然辩证法》一书没有最后完成，因而未能实现这一步。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使我们对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之间的直接联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狭义相对论表明，在速度接近光速的物理运动中，空间时间的特性具有根本不同于低速运动的情况，即发生所谓尺缩钟慢效应和同时性的相对性效应。在狭义相对论的范围内，闵可夫斯基将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统一成一个四维时空，从而揭示了时间和空间的内在统一性。广义相对论则进一步指出，在引力场中，时钟将变慢，空间将弯曲，而引力场本身又是由物质的分布所决定的。这些科学事实清楚地表明，时间空间的性质直接取决于物质的运动状态和物质的分布状态。因此，我们对时空本质的哲学概括，必须从它与物质运动或物质分布的直接联系上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它与物质存在的关系上去认识。

现在通行的各种哲学教科书，几乎都把时间空间定义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即把时间空间和物质运动的关系理解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这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时间空间对物质运动的依赖性，但却不足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因为形式作为事物本质的外部表现方式，它和内容的关系具有某种外在性和独立性。时间空间和物质运动的关系却不同。现代自然科学证明，作为普遍的空间形式的“场”（电磁场、引力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物质，不存在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从时空性状的状态化来看，在狭义相对论中，尺缩钟慢总是随着物质运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二者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即物体运动的速度愈大，则物体长度收缩愈甚，时钟走得愈慢，不存在象形式对于内容那样的相对独立性。在广义相对论中，时空弯曲和物质分布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科学事实表明，时间空间并不是以物质运动为内容的外在形式，而是物质运动或物质结构的某种更为直接的内在规定性。

总之，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使现行的哲学时空概念显得不适应了。重新对它作出定义，已显得十分必要的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现代自然科学所揭示的时空特性是丰富的、多方面的，要从哲学上定出准确的概念，必须经过全面深入的研究。上述一鳞半爪，仅作引玉之砖。我们期待着人们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取得新的进展。

作者单位：广州中医学院自然辩证法教研室

责任编辑：冯达才

不论是佛洛伊德的“原欲升华”还是利维一史陀的“大脑创造文化”都反映了人本能性是“文化”的首要本质。而文化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的矛盾，各表层结构之间的矛盾，整个文化各层次“结构”与自然、人的生命创造力以及外来文化的挑战之间的矛盾等等的总和，决定着某一文化的演变。

文化的人本能动性性与结构规律性

〔香港〕鲁凡之

（一）人本能动性

德国文化形态学家斯本格勒曾经提出：“人类历史乃是强有力的生命历程的总和”。^①这“总和”包括了已逝的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仍活着的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其他次文化、原始性文化的总和，而从古代到当代的中国文化只是这“总和”里的一部份。与此同时，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利维一史陀亦指出：“由于所有文化都是人类大脑的产物，在表面之下的某处，那里一定有着对所有文化共同的特征”，^②“因此，在对文化现象的基本结构的研究中，我们亦同时发现关于人的本质（the nature of man）。”^③这里已引导出关于“文化”的人本能动论。

人类所有发展形态的文化，都是“人”自身的产物——从生物学角度说，是人脑的产物；从哲学角度说，是人的能动性的产物。“文化”体现着“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创造出“文化”。从这根本的层次来说，中国文化只不过是“人的本质”在特定情况下的特殊的自我塑造形式；而这所谓“人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以大脑作生理枢纽的人的创造力。从一个角度来说，这大脑的创造力或能动性是人类普同的“人的本质”，不同的文化形态只是这同一本质在不同具体条件下的不同显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创造了不同的文化，作了不同内容的自我塑造，于是这种人类所共有的自我塑造能力、创造文化的能力——即“人的本质”又成为人类文化所共有的形式，而不同条件下形成的不同文化才造就不同具体内容的人。由此可知，所谓本质与现象，或内容

与形式，也都是相对的范畴。就人类文化的共相来说，文化属人脑的产物，与“人的本质”相关连，因为不管哪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都是人脑的产物；若进一步就特定文化的殊相来说，如中国文化属中国人的人脑的产物，与“中国人的本质”相关连，因为只有中国人才创造中国文化，这中国文化或任何一种特定文化既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形式，但就其自身的本体发展来说，每一种特定文化却又都具有一种本质。中国文化是立足于中国人与其他文化形态之下的人在生理意义上、在人类的物种意义上并不存在“质”的区别的前提上的，也因此是与承认人脑创造文化这一“人的本质”的观点不相悖的。

利维·史陀所谓“人脑创造文化”，实际上是说“人创造文化”，只不过他强调了大脑是人的创造力的器官而已，他“发现自然存在的关系是由人类大脑所理解的，应用到文化产品，也引伸出这样相同的关系。”^④在“人创造文化”的范畴内，从佛洛伊德到马尔库塞（Hebert Marcuse），强调所谓“原欲”（Libido）的“升华”，认为文明与文化是本能压抑的结果，^⑤将性冲动“升华至更高之目的。”^⑥此说并不排斥大脑的创造性，只不过他们将人的这种创造力解说成性欲受挫折（抑制）后的转化形态。“原欲”既可通过生殖器来表现，通过大脑来表现。由性本能的“愉悦原则”（Pleasure Principle）提升为创造力发挥的“愉悦原则”，这种理论虽经过“性化”，但就其本质来说，仍是一种人本论的文化论。

至于“文化”一词的中文，最早可追溯至二千多年前的《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⑦那里有着“人文之化”——“人化”的含义。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⑧这“道”是人所“弘”之“道”，也有着人的能动性结合自然而成就“人之道”的意思；而这“人之道”亦即“人文之化”；“文化”即“人化”，人在回应环境挑战而反过来将环境“人化”——不仅将外在于人的客观环境“人化”（所谓“改造世界”的本质），而且将人自身的主体“人化”，即人由“自存体”（Being in-itself）向“自为体”（Being for-itself）的转化或提升。^⑨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⑩在这个意义上，“文”（人为）与“质”（本性）的结合，是人对人自身主体的“人化”，也就是“文化”的体现。由此可知，中国文化对“文化”的传统理解，其第一特征是可以界定为人本能动论的，即肯定“人创造文化”（是为“人化”）。

在西方，“文化”——英文与法文是Culture，德文是Kultur——一词的语根虽源自古希腊文，而最早对这个词给予较确切的界定的，是19世纪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他曾提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综合整体（complex whole）”，而自原始文化的泛灵论（animism）时代以来，所有的人都由“生活与幻影”这两种因素“明白地紧密连接起来。”^⑪而这种“生活与幻影”的“紧密连接”，实质上就是一种综合整体。可以说，人的生命力所创造的一切，就是“文化”。

综上所述，从古代中国的“人文之化”、“文能弘道”的界定，到现代西方的“原欲升华”、“大脑创造文化”的界定，都客观地反映了“文化”的首要本质——人本能动的性质，这种性质是人类文化的共性之一。

（二）结构规律性

斯本格勒将世界区分为七大文化形态，汤恩比将由古迄今的人类历史区分为三十四个文明，鲍亚士、潘乃德、利维一史陀等历史主义取向的文化人类学派，亦视每一文化各有其自身的“模式”或“结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是多线发展而非单线发展，这种将文化所具有的结构规律性质与多线发展性质结合起来的前提，是我们讨论文化问题所必须肯定的。

斯本格勒提出：“每一文化，皆有他自己的文明。……在本书中（按：指斯本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这两个词眼，第一次具有了周期性的意味（period sense），用来表达一个严格而必然的有机发展过程。‘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最终命运’，……文明是一种人性发展到所达到的最外在、最不自然的状态。文明，即是文化的结论。文明到来时，已经生成的事物，替代了原来的扩张。……文明即是终局，不可避免的终局，文化，由于其内在的必然，皆一一会走到这一终局。”^⑩

斯本格勒认为，文化象生物有机体一样，有生长及死亡的过程，他称之为“命运的必然”及“时间的逻辑”（logic of time）。^⑪在他的理论架构里，任何“文化”都象生命体一样有生必有死，而“文明”正是“文化”死亡的表象。“文化”（culture）的概念与“文明”（civilisation）的概念，往往被许多论者混淆。斯本格勒的划分法，只不过是这些纷纭意见中的一种。他对“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处理得较为辩证，并从中揭示出文化的一些带有基本性质的发展规律。如：

第一，“文化”有生命，是特定人群的生命集体，是人的创造力的生命本体。

第二，“文化”有死亡，有生必有死。当集体生命的创造力衰竭，或反过来被文化创造物的“建制”（Establishment）所窒息，或因不能回应过份强大严酷的挑战而崩溃，人类历史上的这些“文化死亡”的例子是足够说明问题的。

第三，“文化”有萌生、成长、死亡的发展规律，这是很客观的提法。“文化死亡”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文化覆灭或崩解只是其中的一些可能形式。面临死亡的文化也可能通过文化改造而再生，通过文化因子的再配置、再组合而重新唤起生命集体的创造力。当然，最基本的构成因子，还是个体生命的创造力，它们在客观上受集体条件的制约，因而只能在集体制约中求取个体突破，从而掀引起和汇聚成集体创造力。所谓“凤凰在火浴中再生”的古埃及神话故事，很能说明某些文化的“死亡”和“再生”的辩证关系。而最终，个别“文化死亡”的出路，却很可能是通往“大同之世”的世界文化。迄今为止，不同文化的发展不管怎样“多线”，文化由人脑创造的“人化”普遍性，使“大同之世”的世界文化成为可能。可以说，当世界各主要文化“死亡”之日，就是世界文化“诞生”之时。这所谓“死亡”与“诞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种既在“死亡”中孕育“诞生”、又在“诞生”中扬弃“死亡”的漫长而交错的过程。与此同时，世界文化统一性的形式，亦不排斥区域文化多样性的并存。

第四，斯本格勒关于“文化”有生有死的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在一般意义上是对的。但他对某些个别文化的生死的判断——例如认为中国文化早在东汉时期便已疆死的说法，则显然是错误的，显示出他在比较具体的层次上对“文化死亡”的理解有比较机械和简化的倾向。

第五，“文化”的生命集体在基本表现形态上是有规范性的，“文明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向文化基本规范进行“整合”的结果。而这“整合”则形成一个“建制”体系，那是由人的生命力创造而反过来支配人的“异化”物，或即由文化所衍生而反过来窒息文化的“异化”物。也就是说，“文明”是对于“文化”的“物化”（thingified）或“异化”（alienation），“文化”必然发展出“文明”——这是文化的一种带基本性质的发展规律。形成“文明”既是该“文化”的成长趋于成熟的表象，也是该“文化”可能面临死亡的征兆。

第六，假如我们将斯本格勒那悲观色调的“文化死亡”论调整合为较具理性色彩的“文化死亡”/“文化再生”的辩证论，便会承认在一个“文化延续体”的不断更生再造过程中，可能形成多个“文明”，从而在“文化”的创造生命力与“文明的物化建制”之间，形成促进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动力，并在二者的互动中，揭示出不同文化被某种结构所制约的发展规律。有些文化在一次严重的文明崩溃之下便实质上死亡了（例如古埃及文化及为数众多的已覆亡的文化），有些文化则可以多次经历文明崩溃而重复原来的文化基本规范（例如中国文化），有些文化则可以在文明崩溃中使文化规范更生再造（例如西方文化）。由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结构和构造，因而便有着不同结构性质的发展规律，包括“文明”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同互动形式和演进形态，“文明崩溃”与“文化死亡”、“文化再生”之间的不同辩证关系等，这都是斯本格勒所没有能够看到的。

“文化”的基本规范将特定人群的生活各方面整合成“文明”。这种提法，也可与较近期发展的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关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的互动理论有所呼应。结构主义肯定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结构，因而亦有不同的文化整合规律与历史发展规律。利维——史陀有言：所谓“历史”，在“透视之下或许有两种模型：追本溯源的（retrospective），回到遥远的过去以建立起一个传统秩序；或者是展望前景的（prospective），将这种过去作为开始塑造未来的起点。”^④过去、现在、前景，都是在同一基本规范的“结构”运动之下，但从结构主义观点来看，从语言结构到文化结构，都有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区别。种种文化现象的细节均可理解为某种密码（code），这些密码本身孤立地看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通过对这些密码的安排法则的分析，才可以在一种“整体性”的网络连系里，将在密码的深层起作用的“架构”（framework）呈现出来。^⑤这种架构与密码的关系，也就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关系。深层结构是文化“整体性”的所在，而“密码组合”——包括种种从制度到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可以说，每一个制度因子、每一个意识形态因子都是一个密码——则是“整体性”在深层将之联系起来并赋以特定文化意义的表层结构。一方面，文化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间存在着矛盾，前者以自己为

基本规范，通过“整合”作用（将矛盾相对地统一起来）而形成后者；后者亦经常通过形式式的“脱序”以冲击前者（在相对统一中不断爆发矛盾以变更统一形态），从而形成推动文化发展的矛盾动力。另一方面，这种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矛盾统一规律，亦表现为文化的发展规律；不同的文化由于有着不同的深层结构，因而有不同的发展规律。

利维一史陀的理论架构，在某种意义上，其文化的深层结构实可相应于斯本格勒的“文化”，其表层结构则相应于斯本格勒的“文明”。“文化”以自己为基本规范整合成建制化、物化的“文明”，“文明”则既可能通过矛盾脱序来冲击“文化”，使“文化”得到发展或达成“文化改造”，也可能因过度整合而窒息“文化”，以至造成“文化死亡”。

正如在一个“文化”的土壤上可以形成多个“文明”的更替，在一种深层结构的运动规范上也可以有多种表层结构的更替，这种更替的发展，客观上便表现为一种受着深层结构制约的文化发展规律。这深层结构不是不可改变的，正如“文化”的基本规范不是不可改变一样，但却只能在既存文化结构条件制约下逐步改变。文化制约与文化改造之间也是一种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各个方面表层结构之间的矛盾，整个文化各层次“结构”与自然挑战、外来文化挑战之间的矛盾，以及人的生命创造力之间的矛盾……这些纵横交错的矛盾总合起来，才决定着某一文化的演变。而当我们讨论文化的其他一些性质——例如整体综合性质、矛盾动力性质、结构规律性质等的时候，象第二节所揭示的，人之于文化创造的能动地位，即文化的人本能动性质，是不能抹杀的。可以说，“文化”即“人化”，这始终是“文化”的最根本的发展规律。

- ① 斯本格勒 (Oswald Spengler): 《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台北桂冠图书公司中译本1975年版, 第1页。
- ②③ 里奇 (Edmund Leach): 《利维一史陀》(《Lévi Strauss》) 英国Fontana/Collins 1979年版, 第26页。
- ④ 同上, 第25页。
- ⑤ 佛洛姆 (Erich Fromm): 《西蒙特·佛洛伊德的使命》(《Sigmund Freud's Missi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57年版, 第30页。
- ⑥ 同上, 第34页。
- ⑦ 《易》
- ⑧ 孔子《论语·卫灵公》。
- ⑨ 萨特 (Jean-Paul Sartre): 《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 对这两个概念范畴及其转化有专门的讨论。
- ⑩ 孔子《论语·雍也》。
- ⑪ 泰勒 (Edward Tylor): 《原始文化里的宗教》(《Religion in Primitive Culture》), 美国Harpers & Row 1970年版, 第Ⅳ页。
- ⑫ 同注①, 第27页。
- ⑬ 同注①, 第4—5页。
- ⑭ 利维一史陀《结构神话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 第2卷, 美国Basic Books英译本1976年版, 第268页。
- ⑮ 同上, 第14章《神话怎样死亡?》对此问题有讨论。

责任编辑：陶原珂

我们如何借鉴陈先生

——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学术上提倡锲而不舍的坚毅精神和独立不移的坚贞品格，反对随波逐流的学术风气；

不能把学术上不同见解上纲到政治上来批判；

学术是非只能通过讨论、争鸣来解决，不能搞围攻，以势压人；

学者要关心现实，接近群众，力图与时代同步前进；

培养专家学者，必须重视基础教学和科研组织的建设。

我从40年代初期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讲授中国文学史时开始，就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报上读到陈先生论《长恨歌》、《莺莺传》、论韩愈与唐代古文运动等文章，震惊于其学问的渊博与考证的严密。50年代初期，经过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我曾至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上听陈先生讲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课。又过了一年多，我移住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下，这时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已出版，我从这部著作里不仅接受了先生关于唐诗、唐小说、唐古文运动论点，还初步学习了先生从考证入手，确认历史事实，然后加以推论、概括的治学方法。然而不

久，古典文学领域掀起对胡适唯心史观的批判，我对胡适的历史考证方法引起怀疑，而转其兴趣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辩证唯物史观的探索。后来又接受高教部的任务，主编《中国文学史》的宋元部分，长期寄居北京。先生此时则致力于柳如是生平及李端生著作的考证，后来又因骨折卧床。因此虽同住一座楼的上下层，向先生请教的机会却越来越少。这次为纪念陈先生，我重读了《元白诗笺证稿》，又新读了先生的《论再生缘》、《寒柳堂记梦》等论稿及《寅恪先生存诗》，回顾40多年来我们这一代人从先生著作里得到的益处，还考虑到比我们晚一代的人怎样从先生的著作里得到借鉴，初步理出了一个发言提纲。

我这次研读陈先生著作的初步印象是：

1. 考核精严，论证周密，而不免有些琐；
2. 识解超卓，迥异时流，而不免偏于保守；
3. 缅怀身世，感情深沉，而不免流于感伤。

先生读书，每能于一般学者漫不经心之处发现问题，然后提出多种可能的答案，

逐一加以论证，排除其不能成立的答案，剩下最后一个答案，又广引史例加以证明。这最后一个答案就成为确然无疑的历史事实。然后进一步从这个历史事实出发，加以比较、分析、推论、概括，确认它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先生论《再生缘》，先广引史料，论定作者陈端生写作《再生缘》的时间、地点，以及她的家庭环境、亲友交游。进一步考明她丈夫范萋是因科场案犯罪长期遣戍边疆的。这些历史事实都得到确认，然后从《再生缘》本身的文学成就，评价“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籍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再生缘》结构的精密非吾国著名长篇小说《水浒传》、《石头记》、《儒林外史》所能及，而可以跟希腊、印度的古史诗相提并论。”这是何等精严的历史科学方法，何等宏阔的文学评论眼光。它跟当时以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词句为能事，任意引申，大言欺人，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学风。

但先生的考证文章也确有一些过于繁琐的，如《论〈再生缘〉》中为了证明“乐志堂主人野苹”即是陈端生的丈夫范萋，连举《毛诗正义》、《植物名实图考》等七条史料来证明；《韦庄〈秦妇吟〉校笺》中为证明“一斗粟”应作“一升粟”的一字之差，连举《旧唐书》、《唐会要》等二十条史料来证明。这就未免贪多鹜博，也影响了文笔的清畅。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里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这话是确有见地的。

再说他识解的超卓。我读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时，比较注意他有关文学史的论述，现摘引三条如下：

寅恪于论《长恨歌》篇时，曾标举“文人之关系”一目，其大旨为乐天当日之文雄诗杰，各出其作品互事观摩，各竭其才智竞求超胜。故今世之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瞭。否则模糊影响，任意批评，恐终不能有真知灼见也。

《元白诗笺证稿》19页

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子昂）李（白）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所谓古文运动，其初实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寅恪曾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论证之，而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此点似尚未见有言及之者。

《元白诗笺证稿》52页

自古文人尊古卑今、是古非今之论多矣，实则对外之宣传未必合于其衷心之底蕴也。沈休文取当时善声沙门之说创为四声，而其论文则袭用自昔相传宫商五音之说；韩退之酷喜当时俗讲，以古文改为小说，而自言

“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此乃我国文学史上二大事，而其运动之成功，实皆为以古为体，以今为用者也。……韩白二公同属古文运动之中心人物，其诗文议论外表内在冲突之点，复相类似。读此《华原磬》篇者，苟能通知吾国文学史上改革关键之所在，当不以诗语与《策林》之说互相矛盾为怪也。

《元白诗笺证稿》70页

上引第一条从正反两方面指明治文学史者的两种不同途径：一种是通过对不同作家作品的比较分析，获得真知灼见；一种是模糊影响，任意批评。它对今天文史领域的研究工作者有普遍指导意义。第二条就陈子昂、李白的改革齐梁诗风，与白居易的改良民间俗曲作比较，指出他们的不同价值和影响。又就韩愈的以古文试写小说而成功，与白居易的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民间俗文学相比较，指出他们的相同意旨和方法，为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的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提供成功的范例。第三条根据白居易在新乐府《华原磬》中意主崇古乐，贱今乐，与他在《策林》中关于古今乐的议论自相矛盾，从而推论到沈约的创四声说，韩愈的提倡古文，都有议论和实际的矛盾。从而提出吾国文学史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不但要看他们的议论，听他们的宣言，更重要的是看他们的创作实践。这些见解，今天的学者可能习以为常，在先生当时是经过艰苦探索、严密论证后提出来的创见。

然而先生在诗文议论中，不时流露旧社会比新社会好，改良比改革好的看法，从而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形势是逆转

的。它集中表现在下面一段话里：

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指梁启超）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歿，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飙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指王安石）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指司马光）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治学，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

《读吴其昌撰〈启超传〉书后》

历史有回流，但总是曲折前进的；革命有破坏，也带来新的生机。不能认为从戊戌政变到抗日战争的历史形势是退化的。先生还有点相信讖语，好象自己晚年的双目失明、南来广州、为陈端生的《再生缘》作考证，都是讖语注定的。从先生身世的艰危看，我们可以理解，但不能认为它是合理的。

缅怀身世，感情深沉，而不免流于感伤，主要就先生的诗歌创作说，在论文中也偶有表现。先生幼承家学，后治唐史，熟于中晚唐诗，诗笔颇有唐音，与散原老人之导源宋贤者有别。他诗歌中的深沉感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把晚清衰世看作全盛的时代，为张勋、康有为的复辟辩护，而不满于段祺瑞、梁启超的马厂誓师和冯玉祥的把溥仪赶出清官。它集中表现在《王观堂先生挽词》这首长诗里。总之一句话，是带有满清遗老的气息。二是深切怀念他在北京清华园时的学术生涯，它散见于先生南来广州后的近体短章，如“南渡

饱看新世局，北归难觅旧巢痕”，“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照影育长空脉脉，兴亡遗恨向谁论”，都表现他南来广州后满腔哀怨无可告语的孤寂之感。《世说新语》说任育长少年时“甚有令名”，“神明可爱”“过江后便失志”。先生以东晋时渡江南来，处处感到失志的任育长自比，除地理环境、社会习俗的不同外，对学术上的讨论无人感到孤寂，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在50年代前期高校秩序渐趋稳定和三年经济困难过后的60年代初期，市场渐趋繁荣，先生的情绪有所好转，间亦见之诗歌；并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著作，跟那些以逊清或民国的遗老自居的学者是有明显区别的。

从形成陈先生在文史研究和诗歌创作的上列特征看，有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因素。从他取得卓越成就的主观因素看，可概括为5个方面：

1. 惊人的记忆力和掌握外语的能力。

2. 深厚的家庭文化素养。他出身于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家庭，父亲散原先生是近现代著名爱国诗人，母亲出身名门，从小就教他读姜白石词。我大学时期的中文系著名教授王伯沆先生，一度是他的家庭教师。

3. 充分的读书、写作的时间。他除出国留学外，大部分个人生活不用自理，结婚后陈师母对他生活的关心又无微不至，使他有可能充分掌握时间来读书、写作。这是今天高校许多双职工家庭的知识分子们所望尘莫及的。

4. 丰富的图书资料。

5. 高层次的师友交游。他在清华的交游，如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吴宓，以及北大的胡适、冯友兰，都是国内第一流的学者；他结识的伯希和、高本汉，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他接近高层次师友的同时，在学术上不免鄙视一般学者，滋长了孤芳自赏的习气。

至于形成他文风和诗笔上的某些偏向，更多的属于客观因素，条列如下：

1. 革命形势的多次反复，内乱外患引起他的深忧，也影响他的生活、学习和工作；

2. 家世的兴衰，使他对晚清的形势有怀恋，戊戌政变的挫折，又使他对政治运动有戒心；

3. 岭南的学术气氛（文史资料缺乏，同道师友难寻），使他感到孤寂；

4. 晚年的失明、骨折，加深他对人生的失望心情。

最后谈谈我们怎样借鉴陈先生的经验、教训，提供我们晚一代的同志参考。初步想到的有下列几点：

1. 在学术上要提倡锲而不舍的坚毅精神和独立不移的坚贞品格，纠正历次政治运动中随波逐流的学术风气。从这种精神、品格看，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而当时许多中上层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往往不免随波逐流，左右摇摆。

2. 分清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看到它们的有区别、有联系，不能混为一谈，特别是不能把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无限上纲到政治上来批判。

3. 学术上的是非要通过同行讨论，百家争鸣来解决，不能采取群众围攻，以势压人的方式。

4. 学者也应关心现实，接近群众，力图跟时代同步前进，不能脱离群众，以“独醒”“先觉”自居，更不能留恋过去，以“遗民”“遗老”自处。

5. 家庭教育对培养专家学者在今后一段时间仍将起作用，但毫无疑问，培养后学的任务必将愈来愈转向教学组织，科

研组织，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些组织的逐步充实和完善。

6. 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史研究工作上轻视资料轻视考证，这点必须及时改变，尤其是在华南及其他边远地区。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货币供应量过多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王海丰在《广东农村金融研究》1988年第三期撰文认为，当前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当然可以归结为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但货币发行过多应视为主要原因之一。近几年物价上涨率以今年涨幅最大，除今年的因素外，同前历年货币供应过多所积累的压力总爆发有关。货币供应过多的原因，可以从这三年中国国民收入的超分配数字里得出答案。从1984年到1986年积累和消费基金之和超过国民收入是国民收

入超分配造成的。由于这些年来经济单位增多，市场商品供应量增加，可以增加一些货币量，但是过多的增加，不为市场交易所需要，超过了容纳量的部分，这些年货币贬值的绝对数。这就是贬值了的货币流通量自然与市场需要量相适应，年年累积，持续物价上涨。使经济单位和人民在经济上遭受了损失，党和国家在政治上遭受了损害。

（成摘）



读史使人明智

——《简明广东史》读后

张 磊

由蒋祖缘、方志钦同志主编的《简明广东史》出版了，我由衷地感到喜悦和兴奋。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愿望终于实现，还由于这部60万字的著作是建国以来的第一部广东通史。可以确信本书将拥有广泛的读者，并将产生多层次、多方面的社会影响。

地方史志的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近几年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把这桩事业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十分清楚，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祖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各个地区显示出不平衡状态，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和特色。全国性的通史，势难尽述。地方史志的研究，也就应运而生，既可补全国性通史之不足，又能充实和丰富其内容。以广东而言，这个地区在其自身——作为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发展过程中固然有其共性，但是，也具有鲜明的个性。在一定意义上，广东历史以其独具的面貌、规律和经验赋予全国性通史新内容。因此，简要地反映广东历史进程的《简明广东史》的出版就是我省史学界的重要实绩。

当然，地方史志的编写还有社会的需求。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包括地方史研究在内的历史科学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和功能。一般说来，读史能给予人们的认识以规律感。而坚定的信仰、理想和使命感，只能建立在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之上。我们确信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必由之路并非基于“朴素的感情”或善良的愿望，乃是由于这个结论申引自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规律。至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是较低层次的规律），则是可资借鉴的。“左图右史”，自古已然。广东的社会经济在明清时期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趋势，走在全国的前列，主要原因在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和对外开放，即梁启超所概括的“富而通”。对于当前的改革、开放的国策说来，这当然是历史的借鉴。其次，地方史志还是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乡土教材。在广东的土地上曾经涌现出一批伟大的人们，他们为祖国的独立、统一、进步和富强而奋斗不息。近代时期更是英雄辈出，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宛如群星灿烂，辉耀青史。试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遗书，堪可警顽克懦。优秀的历史传统人物——特别是杰出人物——的思想与活动之中，能否继承和发扬关系到民族素质的提高。再次，地方史志的研究有助于省情

(■情的一部分)的了解。认识了省区的昨天和前天,必然会加深认识省区的今天和明天。地方史志内容广泛,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乃至风习诸方面,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应当成为各条战线同志们的常备手册。省情的了解大有裨益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贯彻,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

在我省史志的研究中,《简明广东史》是一部优秀的成果。本书具有许多优点,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则居于首位。主编之一的方志钦多次强调了这一原则,我个人深表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依然具有科学性和活力。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我们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优势。在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引进一切有益的方法论是必要的,但马克思主义应当在多元的状态中居于主元的地位。盲目崇拜当代西方哲学是没有根据的。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揭示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群众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社会历史的动因,从宏观上加以科学的把握。本书的论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无论是关于历史进程和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还是关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都能作出较为科学的论断,符合历史的真实。同时,作者们也力求避免以僵化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例如,本书充分注意了地理条件对广东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南岭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状态下曾经成为广东与中原的阻隔,“影响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直到唐代,岭南还被看作化外之地。”然而,绵长的海岸和星罗棋布的岛屿又使广东愈益成为通向域外的主要门户,广州逐渐形成外贸中心,这种条件“给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濒江沿海地区的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好处。”显然,这种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本书的另一个优点是全面性和系统性,广东历史的概况和轨迹得以展示。建国以来,关于广东历史的研究大多限于断代、专史、专题和人物等方面。简明扼要的通史,终付阙如。对广东历史作出宏观的纵横考察,乃是一桩开拓性的科研任务。本书构筑起历史的框架和体系,展示出发展变化的线索:以马坝人及其代表的原始社会为发端,经过不发达的奴隶制,至秦汉时期发展了封建经济和文化,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而趋于高峰。鸦片战争后,则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心地区之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广东历史跨入了划时代的新阶段。书中对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少数民族等方面的论述较为充分,力求兼顾而免偏枯。

本书的又一个优点是对广东历史的重大课题作了认真的考察和阐述,从而提高了自身的学术价值。广东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若干转折点,不能迴避或掉以轻心。广东在上古时期开发较迟,作者们把原因归结为“境内土旷人稀,又多密林、深谷和水泽,加上五岭的阻隔。”秦朝统一岭南和首置南海诸郡,“揭开了广东古代史上的重要篇章。”正是土著的越人和南下定居的“中原人”,“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岭南文化。”而后,“当广东人民不断地吸收中原地区的文化和外来的文化而发展自身的物质力量,并开始较好地利用地域优势的时候,广东的经济文化的面貌迅速改观,并在明清时期曾呈现过后来居上的发展趋势。”迄于近代,由于广东成为外国资本主义首先从海上入侵的前沿目标,加

以广东的社会条件，更堪称“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革命策源地。”本书对这些广东历史上的重大课题深入探究，大有裨益于揭示不同层次的规律。

此外，本书对于史料的征引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地方史志的编写当然要充分利用有关的志书、文集、野史、杂著等文献，但这类著述大都出于私家，就其内容而言，往往真伪掺杂。为了史实的可靠性，引用史料时必须认真鉴别。例如，屠雎在公元前228年秦灭楚后率先统领大军跨越南岭。他的这支队伍数量如何？一些著作据《淮南子·人间训》判断为50万之众。本书则以为只有数万人，因为秦朝“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此地投入这么庞大的兵力。”显然，作者们的这种判断是令人信服的。

作者们在“前言”中把本书视为“一次摸索性的尝试”，认为“免不了粗疏和失误。”语虽自谦，却也反映了一些实况。做为一部开拓性的成果，难免存在若干有待改进之处。有些重大的课题（如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等）的探究，尚需深化。少量史料的引用，也有舛误。部分近代的史实，可以求诸当事人的忆述——例如，关于香港达德学院。但是，瑕不掩瑜。况且这个科研群体（全由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史学家组成）正在着手编写多卷本的广东通史，继续攀登高峰。

我谨竭诚向各界同志们推荐这部著作。

我期待着多卷本的广东通史早日问世。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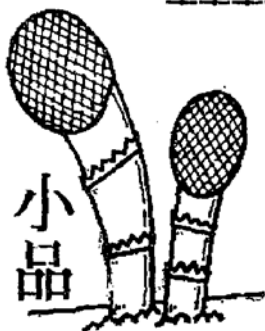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凌峰



能否“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

《深圳特区报》1988年7月8日发表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纪要，提出在内地造几个香港的新构想。纪要中谈到，所谓“内地香港”的内涵，是指深圳这类特区，在某些政府机构设置、经济体制、管理、立法等各方面更大规模地学习和吸取香港的成功经验，使这些内地城市在经济体制上与国际经济秩序更接近、更相适应。成为真正国际化的内地城市。纪要援引了邓小平6月3日接见外宾的谈话：“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指出要从如下方面吸取香港经验：①发展外向型经济，特别是自由港政策；②按国际惯例进行

经济运转；③体制和管理方面的完备性，包括完备的法律、完备的决策系统、完备的咨询机构和制度、素质较高的公务员队伍和管理阶层。纪要说，深圳朝“内地香港”发展有五大优势：①地缘人缘的紧密联系；②深圳1400家外商投资企业中，港资约占80%；③目前深圳已经移植了许多香港的经验；④与香港的全面交流、合作有了较好的基础和较成熟的经验；⑤深圳人民对建造“内地香港”有较强的承受力。纪要也对“内地香港”和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一些根本区别。这场讨论正待进一步深入。（成摘）



一 二 三 四

老 烈

今夏苦热，中午尤甚，饮罢两杯龙啤，高卧北窗竹榻，小睡朦胧。忽有客人来访，赶紧沏茶相敬，“砍大山”。一时又不知从何谈起，于是便由“数之始”的一二三四“砍”了起来。正自信口开河，滚滚滔滔，“蓬”地一声蓦然惊醒——孙子放学归来，原来竟是黄粱一梦。回想一下，颇为有趣，连忙追而记之，以志某年某月某日之“不忘”。虽云“可乐”，但不“可口”，聊以解嘲罢了。

舆论一律

舆论这个东西恐怕难得一律。不是说“人多热气大、议论多”吗？十亿人总不能一个脑袋一张口。就算是人民利益一致，有的爱吃咸，有的爱吃甜，也并不一律。有道是七嘴八舌，众口难调。但这又有甚么，只要多数人说好，生意一定兴旺。开一言堂，言不二价，免开尊口，咸了还是甜了也听不到，难免不折本。

我们的老祖宗很喜欢舆论一律，“嗚呼者弃市”，甚至“腹诽者诛”。一律了吗？还是办不到。若然，那就连这九个字的两则故事也流传不下来。可见从古至今舆论总是不一律的。虽然官书官报上可以做到这一点，一纸通令，天下遵行，但那不过是

官样文章，而非舆论。若知舆论，请到茶楼酒肆、街头巷尾、饭桌厨房去听听平头百姓怎么说，恐怕就大不一样了。

况且这一律也不合辩证法，古人尚且懂得“不有两则无一”，今人怎么可以不知道没有不一律便没有一律？一旦离开了辩证法，可就等于丢了指南车，其不走瞎路碰钉子也几希！世界上倘若只有一只曲子，那该有多么单调寂寞，那管是贝多芬的《月光曲》，无从比较你也难说它到底好不好听。

量词二面

现在说说作文章，凡属带点贬义的，总得加上“个别”、“少数”、“一定范围内”、“某种程度上”这类限制性的量词，这自然是相对另一面的“一般”、“多数”、“全局”、“整体”而言。但有些人事，例如强盗小偷、贪污分子、官僚主义、奢侈浪费等等人类毒瘤、社会霉菌，本来就是“个别”、“少数”，不言而喻，无须罗嗦。如果那班东西成了“所有”、“一切”、“普遍”而又“全面”，焉有今日中国！可是不行。倘不加上那些限制量词，左氏神经官能症马上发难：难道中国人都成了强盗小偷吗？难道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听说要改称公务员了）

都是官僚主义吗？再上一层楼给你加上个“居心叵测”、“蓄意抹黑”，那就够喝一壶的了。“右派”、“右倾”、“三反分子”已经退位，“自由化”可又影影绰绰地走来了。怎么办？只得仍其旧贯“个别”、“少数”下去。

可是马克思讲究质量互变，“个别”、“少数”也许其质颇高，能量不小。“二王”不就闹腾得上、下、南、北几个月不得消停吗？一个“人妖”王守信几乎把那么大的煤矿攥在她的手心里，渤海二号冤沉海底的“殷鉴不远”，几百上千万美元照样无影无踪。有人说过，一个指头如果肿得比棒锤还粗，也会致人死命。湘资沅渚都是长江支流，一旦发起洪水湖南还是受不住。不管你怎样喊“个别”、“少数”，天下并未太平，五谷尚待丰登，它不过是两颗“眼尔通”，请你垫高枕头睡大觉罢了。

难怪人们开始警觉起来，你说这一面，他就想着那一面，你强调“个别”，他就认为是“一般”，你说是“少数”，他就看成“多数”，“一定程度”、“某种范围”，那可能就是“全局”或“整体”喽。事情做绝了就走到它自己的反面，此之谓“物极必反”。

牢骚三等

古时候牢骚二字并非贬义，倒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善词。牢者劳也，骚者忧也，无非是忧国忧民之意。所以屈原的作品称为“离骚”，他也被尊崇为伟大的爱国诗人。不知道从哪朝哪代哪位皇帝老儿起，听厌了聒聒噪噪的牢骚，龙颜大怒，一声断喝：朕乃天下圣明君，何须尔等发牢骚。从此牢骚贬值变质，成了讥刺朝庭的忤逆，犯上作乱的先声。虽有御史中丞、谏议大夫之设，其实是“天子耳目风

纪之司”，专治牢骚的；倘若他竟信以为真，大发牢骚来，保不定要被杀头。这牢骚发得吗？

按理说，革命胜利了，应当给牢骚平反，尤其在拨乱反正中，更应当“必也正名”，惜乎哉“要改，也难”，牢骚还是被看成不同心、不老实、不是个好东西。即便不再打棍子、戴帽子，却也还是一条想抓便抓、“一抓就灵”的辫子。“乍暖还寒时候正难将息”，还是不牢骚也罢。

然而，真也没有法子可想，牢骚越积越多，以至于满腹，肚子装不下，能不泄出来？于是聪明人发明了“牢骚三等”：第一等是气体的，无形无色，只是味道不大好闻。三五朋友，斗室闲聊，看不见，摸不到，抓不着，“事虽有因，查无实据”。这是“最佳选择”的上品。第二等是液体的，淡茶一杯，尚属可饮，回味发涩。在不大不小的会上，用不紧不慢的语调，说上几句不三不四的意见。听起来不太顺耳，却又奈何他不得。这是“等而下之”的中品。第三等是固体的，形诸笔墨，写成文章。知识分子常干这种蠢事，赤膊上阵，慷慨激昂，弄了“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一时或可放行，秋后算起账来就吃勿消。这就是“送货上门”的下品了。

若照我看，为防肠梗阻而不准牢骚，大家都当没咀儿的葫芦，到富春江去钓鱼，未必是形势大好。听听盛世危言实为大明大智之举。现在提倡“对话”、“透明度”，极好。但愿“对话”不是“训话”，“透明”也不要“有度”，那光明正大的牢骚又何须分作三等！

帮闲四句

帮闲之辈自古有之。战国时候孟尝

平原、信陵諸君所养的士、或曰食客那伙人便都是帮闲。有的当说客，有的当刺客，有的出馊主意，或焚烧债券为主子收买人心，或鸡鸣狗盗帮主子偷渡过关。后来的各朝各代也都不缺这种人，大小文武衙门里随处可见。戏曲舞台上，鼻梁上一块三角白、戴方巾、挂“吊搭”、哈腰弯腿的三花脸就是此辈的活形象。现在可是正儿八经地打扮起来了，穿干部服的，穿西服的，新潮一点的上茄克下牛仔，仪表堂堂，气度非凡，做起事来显得“博学多才”、“能言善辩”，最拿手的当然是祖传的老谱：“善于体会领导意图。”

有人给帮闲们送了一首打油：“诗词歌赋文，琴棋书画拳，山医话卜讼，嫖赌酒茶烟。”“诗”如何不论，五言四句，倒也全

面，但还须做点说明，不然颇费猜详。这二十个字，并不是说帮闲们十八般武器件件精通，倒不妨说是件件稀松；只是形象概括，说他们拳也猜得，令也行得，下几着棋，写两笔字，开会设宴，行礼如仪，阴晴冷暖，报信吹风，巧言令色，八面玲珑。而最最大的本事则是能够给领导上“写”出工作成绩大大的报告或蒙混过关的检查。

不过，他们也有“不足”，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方诸今日，似还应当再加一句，那便是：有了“气候”也一定要“反戈一击”。

杂感二题

石成

一、论文命题秘诀——

兼论怎样提高投稿的命中率

(一)

人看衣冠，物看包装。先看题目，后读文章。故投稿之要，首在命题。内容不论新旧，所论不管高低，一概名之“新探”、“新证”、“新论”、“新析”、“新考”……，以期在稿子成堆的编辑案头，盎然“新”意夺目。此类命题，命中率一般大大高于命题不“新”者。此谓“新”声夺人法。

(二)

瞄准名人文章，挑其一点，不管全文，放胆质疑，提出商榷。事关“百家争鸣”，涉及“小人物向权威挑战”，后生可畏，不可掉以轻心。此类选题，命中率一般亦属可观。此谓借梯上爬法。

(三)

钻进学科间的空隙，大胆假设，纵情构想，东拉西扯，言之凿凿；貌似“边缘”，标以“刍议”。首创精神可贵，不宜责备求

全。此类选题，命中率一般不低。此谓出奇制胜法。

(四)

抓住新颁政策，及时摘引一二，加以铺陈演绎，归纳“三个要点”，挖掘“四大意义”。紧密配合中心，恰解应时之急。此类选题，命中率一般接近百分之百。此谓兵贵神速法。

……

“做医生的有秘方，做厨子的有秘法，开点心铺子的有秘传……”就是没有“作文秘诀”，如果有，一定是骗人的。迷信“秘诀”者，切记鲁迅之言。

二、论文写作精义——谈怎样的论文才有价值

(一)

定职称，以字数计成果；科研评奖，五千字“入围”；付稿费，称铅粒算丰菲。

历来如此，天经地义。故为文精义，尚鸿篇巨制；写作秘诀，贵避“短”扬“长”。不长不足以成宏论，不长不足以显学问，不长不足以立足学术之林，不长不足以补偿脑力劳动。君不见，大学里规定：学士论文——10000字以上，硕士论文——30000字以上，博士论文——非一本书不可！君不见，纸张越来越贵，文章越写越长。

(二)

“书到用时方恨少”。故名人名句，应时时留意；注脚之类，切不可小看。用典愈多，愈有份量；注释越多，越见功力。全篇一万字，引文七千七，圆圈一百一。这样的文章有着头，一遍读不懂，三遍才出味。难不住读者，先吓死编辑！

……

以上论文写作基本功二例，仅供编者、作者、读者参考。

闲话“人之初”

岑 桑

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挟了一叠稿子上门来，想听听我的意见：这书稿是否应该出版？

这是一叠诗歌稿，作者是某地一所中学的十五岁学生。据说这少年有“神童”之誉，写过一些诗在报刊上发表，在当地引起注意，上过电视，某青年报还刊登过他的访问记。“神童”的父母都是某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与文艺界有点关系。他们为

了力求儿子的诗集能顺利出版，托人央请某著名诗评家为之作序。真是煞费苦心了。

我看了那些诗稿，有的还是写得不错的。小小年纪，能有这样的水平，可喜可贺。不过，将之与时下能达到出版水平的青年诗人的作品比，还是差一大截的。“神童”的父母为了向出版社证明自己儿子的社会影响，特地将某青年报刊登的那篇访问记

复印附来。从访问记中看来，“神童”的口气很大，真可谓不同凡响。他用鄙夷的口吻把两位著名老作家奚落了一番，又对当今的诗坛大摇其头，那神气，那态度，哪里像个才十五岁的孩子！读着那访问记，想象着“神童”接见记者时口出大言，俨然以诗家自居的神态，我忽然感到恶心起来。

我反问那位编辑同志：“你的意见认为这书稿该不该出呢？”

他有点含糊其词，但从他的言谈中可以听得出来，倾向性还是有的。原来“神童”的父母为这出版社编写过两本教育类读物，其中一本印数颇大，为出版社赚了点钱。对于这样的作者，能不给点照顾吗？向我征求意见的编辑同志闪烁其词：“所以……最好……还是……”

轮到我表态了：我不赞成！

我说，我承认这孩子的诗作有一小部分写得不错，在同龄人中，应该说是相当突出的。但是对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用为他出版专书的方式予以鼓励和奖赏，并不可取；何况他的诗作还远未达到一般的出版水平；更何况这“神童”已露骄矜之态，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他的诗集，未必是件好事。我向这位编辑建议，不妨把我的意见转告“神童”的家长，请他们斟酌斟酌。我说，若是我也有这样一个“小时了了”的儿女，我是决不会早早就让他得到此等殊荣的。中外古今，还找不出一个十几岁就出版专书，后来终能成大器的诗人或作家。

王安石的《伤仲永》早已收进中学语文课本，这篇很有意思的短文应该是家喻户晓的了。这个“小时了了”的“神童”，看来是

实有其人的。他才五岁就能写诗，做父母的高兴得把他的诗作“传一乡秀才观之”，此后人们命题请他作诗，都写得不错，“邑人奇之”。“神童”的父母因之尝到不少甜头，于是时常拉着他们的宝贝儿子“环谒于邑人，不使学”。到了十二三岁时，已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至弱冠之年，更是“泯然众人矣”！这与仲永的浮沉，是完全合乎规律的。问题在于这“神童”的双亲望子成龙之心过于迫切，倘若他们不热衷于拉着儿子“环谒于邑人”，而是让天资聪颖的儿子少一点抛头露面，多一点勤学苦练，其结果必定很不一样。

为人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须知在学术上“成龙”并无捷径（“成官”又当别论）可循，为自己的儿女奔走呼号，不惮辛劳地“环谒于邑人”，唱赞歌，造声势，往往只能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对自己的儿女，尤其是对“小时了了”的儿女，还是严格一点要求，少让他们吃甜的，多让他们吃苦的辣的为好。窃以为“人之初”，天资并不最关紧要，“教之道”才是第一位的事情。晋代有个皇甫谧，少年时代目不识丁，毫无书卷之气，在人们眼中是个庸才。到了二十多岁时才受到别人的启迪，“感激就学”，终于“博综典籍百家之言”，得成大器。这位自号玄晏先生的大学者，就是一个实例。

我想，王安石笔下的“神童”方仲永，未必曾以鄙夷的口吻奚落过同时代的欧阳修、苏东坡之辈，其父母即便曾经为之奔走出诗集，显然也未见成功，否则，王安石所“伤”的“仲永”悲剧，岂止是“泯然众人”而已矣！



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锡冶炼厂

地址：广东乳源县城鹰峰一路

电话：828 电挂：6982

一 稀土氧化物



岭南稀土材料厂
地址：中国广东乳源
电话：七四一

單一稀土金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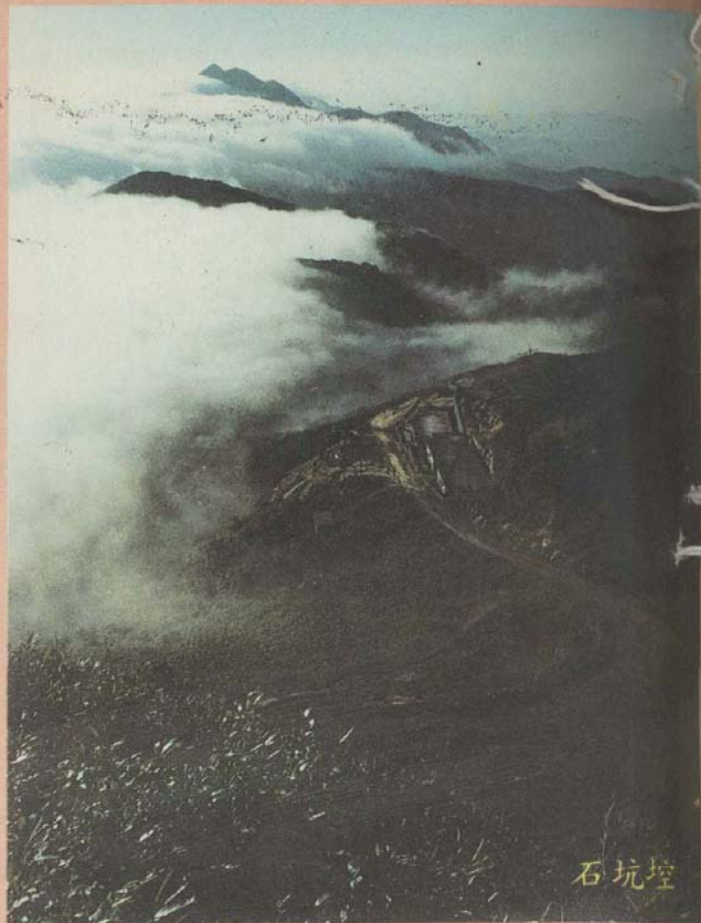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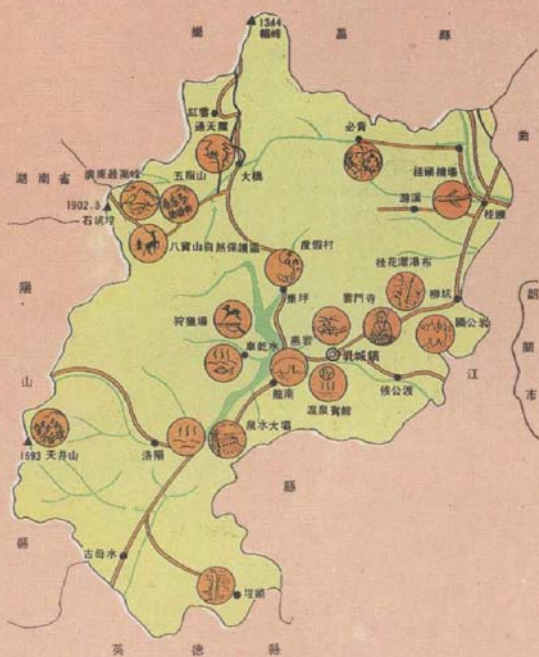


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华昌造纸厂

地址：广东乳源县城 电话：247 电挂：4786



乳源旅游简图



石坑埕

乳源有中国南方第一家天然狩猎场，千年古刹云门寺，风光秀美的必背瑶寨，南粤最高峰石坑埕，人迹罕至的地下森林，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旅游系列。乳源靠近韶关市，交通便利。欢迎中外游客光临，领略粤北瑶山的绮丽风光和民族风情。



桂花潭



瑶寨

乳源瑶族自治县中国旅行社

电话：旅游部529 狩猎中心263 客房部：296 餐厅部：939 电挂：3266

摄影：冯冬生 王运风 撰文：黄意章

国内定价：0.50元